

第一章 乡情故里改顽劣苦读书

拔小刀，小文虎反抗塾师。大过年，“首领”未得一文压岁钱，好没面子，大哭一场。逃学儿，一夜间把书背得烂熟，令先生刮目相看，特留文虎一道吃“饭袋饭”。

胡文虎 1882 年出生于缅甸仰光。

当时，作为缅甸最大商埠的都市仰光，土著的缅甸人只占该城人口的 1/3，其余 2/3，一大半是印度人，一小半是中国人。

伊洛瓦底江自北向南流过这个古老的国度，稻田和竹林构筑着一派小农经济的田园风光。在那些大村落间，时常触目可见一个大大的“当”字，那是客家人或福州人开的当铺。当铺挨着杂货店，杂货店挨着酒店。缅甸人在当铺当东西借钱，然后到杂货店买东西，或到酒店饮酒。

19 世纪是中国“苦力”出国的高潮，但在缅甸充当“苦力”

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人，中国人多做生意。

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开当铺的中国生意人，他是个替人把脉抓药、悬壶济世的中医，是留洋在外的极少数靠知识和文化谋生的中国知识分子。

胡子钦来自福建永定金丰里一个叫中川的小乡村。出走南洋前，他已是四乡闻名的年青郎中，在中川拥有一间生意不薄的药铺。

胡子钦的生父胡积家也是承袭父业行医。胡积家用行医攒得的 200 银元购下金丰里下洋墟镇的一所房产，意欲改行经商。商行正待开张，却有县上富豪伪造房契强占商行，反诬赖胡积家拐骗家产。胡积家状告县官，泥牛入海；一年后再告，受富豪贿赂的县官开庭审理，胡积家败诉，含冤入狱。

离中川不远的科坪里，有个秀才叫胡宗裕，善写状子。胡积家家人便求胡秀才帮忙，许诺事成愿将后代送他做嗣子，客家人叫“过房子”。

由于胡秀才帮忙，官司终于反败为胜，那受贿枉法的县官也丢了乌纱帽。胡积家重酬胡秀才，并把刚刚出世的三子送给胡秀才做“过房子”。这个“过房子”便是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

胡秀才在乡间任私塾先生，胡子钦七八岁便跟嗣父往在学堂里；待读完私塾，又回到生父身边学习医道。因此他受到良好的教育。

如果不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胡子钦也许就守着他的中川药铺渡过安稳清静的一生。那时，永定人出洋成风，据《永定县志》记载：“侨居南洋群岛之永定人已达 15000 有奇，每岁辈金回国不下 200 万元。”亲友劝胡子钦出国去，胡子钦不为所动。风险大，故土难离，并且胡秀才只有他这唯一的“过房子”。

然而胡子钦安居乐业的痴梦只一夜间便被击了个粉碎。时值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加倍地向中国进行掠夺，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更加残酷地压迫和搜刮百姓，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时间，农田荒芜，城市萧条，流民泛滥，盗匪横行。这天夜里，一群蒙面贼闯进胡子钦的药铺，把他多年的心血所构筑的家业财产洗劫一空。

胡子钦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叫人怎么活下去？”

胡子钦就这样带着一颗悲愤的心，两手空空去了南洋。

一连数日，他都在仰光码头的候船室过夜，等待着同船而来的乡亲去仰

光城打探熟人的情况。然而接二连三都是坏消息，熟人或是外出做生意去了，或是破了产远走他乡另谋出路。胡子钦举目无亲，一片茫然。

掉头回去？这不是客家人的性格，客家人素有坚韧顽强的精神，何况胡子钦从汕头启程往南航行3个多月才抵达仰光埠，回去谈何容易？胡子钦横下一条心，在仰光城替人看病。他医术高明，按脉认真，为人友善，很快就在仰光城站住了脚，侨胞和当地缅甸人都愿找他看病。

几年下来，胡子钦行医所得，小有积蓄，在仰光城开设了永安堂国药行。

从此，胡子钦一面开门诊，一面做中药生意，事业日益兴旺。不久，他便择定仰光广东大街兴建一座三层楼房，并娶缅甸出生的广东潮州籍女子李金碧为妻。

李金碧与胡子钦生有三个儿子，依次叫做文龙、文虎、文豹。据说这正应了这对幸运夫妻新婚之夜的愿望。当时，新郎跟新娘讲述家乡的传说，有一对夫妻生下两个儿子，名叫阿猪和阿狗，两个儿子长大后飘洋过海去谋生，发了大财回来，在家乡盖了大房大楼。新郎说：“我们要是生了儿子，就叫阿虎、阿豹，人家阿猪、阿狗都能发大财，我们的阿虎、阿豹肯定会更富有。”新娘兴奋他说：“最好再多生一个，大的叫阿龙，阿龙的生肖更大啊！”天随人愿，他们果然得到三个儿子。

不幸的是，文龙生病夭折。胡子钦是一个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而长成的知识分子，对祖国与故乡怀着深切的热爱与眷恋。所以，当文虎长到10岁，胡子钦便送他回故乡中川，让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文虎生性好动，坐在板凳上读“人之初”是怎么也坐不住，常遭先生的斥骂。有一天，先生教读《三字经》，学生全都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地大声念着，只有文虎一人竟望着窗外走神，嘴都没张一张。先生大怒，拿起方尺就要往文虎头上敲，文虎闪身躲开，竟从衣袋里拔出一把小刀。先生看见小刀闪闪发光，吓得脸色发育，手里的方尺掉到地上。先生再不肯教他，家人只得把文虎转到另一间私塾。

胡子钦送文虎回来时，没把文虎安排到中川故居庆福堂文虎的伯父家，而是安排到科坪里大源楼他的嗣父胡秀才家，因他考虑到嗣父膝下无人。乡亲们夸他“不忘本”。胡子钦临行时还把随身带回的300银元交给嗣父。

300银元在当时抵得一户宫农的家产。嗣父嗣母没能生育，不料竟有这么个有出息又贤孝的嗣子，十分快慰。他们自然要担当好抚养和教育文虎的责任，叫胡子钦只管放心。

从南洋回来的文虎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回到乡里理所当然成为孩子们的首领。他贪玩好斗，每天都玩得变个泥人回家来。时间一长，令房公房婆（胡秀才老夫妇）生厌，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渐渐地，房婆连饭都不肯让他吃饱，文虎时常落得啃烂蕃薯。

春节到了，这是客家人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按照习俗，家家都要给孩子做新衣，发压岁钱，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不例外。可是房婆竟然不给文虎做一件新衣，也不给他发一文压岁钱，这无疑是对文虎最大的惩罚。文虎作为“首领”第一次遭受小伙伴们的嘲笑和轻蔑，很没面子，跑到中川庆福堂他伯父面前嚎陶大哭了一场。

伯父非常气愤，决计把文虎接过来亲自抚养。在伯父一再请求下，经胡氏宗族内部调解，文虎终于回到伯父身边。

文虎依然是野气十足，但伯父只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从不恶言骂他。伯父夜晚跟文虎同睡一个床，天热给他驱蚊打扇，天冷给他暖脚盖被，尽心照料如同亲子一般。

文虎一度迷上捕玩燕子。中川胡氏家庙的雕梁画栋之上栖息着许多燕子，文虎把它们捕捉了关在山洞里饲养。为此他逃学，不做功课。伯父见了十分心焦。

伯父知道文虎喜爱《水浒》、《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最崇敬讲义气的英雄人物，便带他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广东大埔县城去看汉剧《逼上梁山》、《桃园结义》。露天演出，没有凳子，叔侄二人站着从头看到剧终。

散了戏，回家路上，伯父便对文虎说：“你将来是要做宋江那样讲义气的人吧，可是你现在不好好读书，将来又有什么用呢？燕子是益鸟，捕捉乃是做恶，少时行恶，老大断难行善，你怎样做得了宋江那样讲义气的人呢？”

文虎听了，颇有触动，当夜跑上山，把用小鸡笼关着的10几只小燕子全部放飞，又让伯父点上灯，他要读书。

第二天上课，先生手里举着方尺，叫文虎背书，先生料他背不出来，手里的方尺随时都要打下去。然而文虎却琅琅有声，把一篇课文背得没一字卡壳。

先生大喜道：“文虎，你总算开了窍。你要真肯读书，没谁比得过你。”

这天中午，先生留文虎同他一道吃“饭袋饭”。客家山村生活艰苦，一日三顿吃的稀饭汤，能吃上干硬的“饭袋饭”，无疑是极高的礼遇。

第二章 变铺为厂虎标良药问世

提铁砧提得腹绞痛，只为说：“我比你力大！”父亲辞世，文虎将店铺中现款尽数携带赴香港，意欲花天酒地？永安堂风雨飘摇，母亲倾尽家私，胡文虎寻济世良药踏破铁鞋。

胡文虎在中川故乡呆了4年，重返仰光父亲身边，这时，他已是一个14岁的少年，长得浓眉大眼，体格健壮。

他依然是好动的性情，喜欢结交朋友，并且胆识过人，争强好胜。有一次，胡文虎和几个青年在同乡一间铁铺里，不知怎么争论起准的力气大，人人不嘴软，都说自己力气最大。最后有人建议比提铁砧，谁能将打铁用的铁砧提起，提起的次数最多，谁就是力气最大。

别人一个个提过了，三下的，五下的。轮到胡文虎，硬是咬紧牙关提了七下，大家情不自禁为他鼓掌喝彩。

胡文虎得胜而归，十分的心满意足，却不知自己用力过度，在腹中埋下了隐患。

起先，胡文虎对自己腹痛并不在意，以为是提铁砧引起，过些日子自然会好。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腹痛不但不见消停，反而愈演愈烈。他便拿跌打药来搽，拿活血药来吃，都不见效。做医生的胡子钦也拿儿子的腹痛没有办法。

胡文虎只好去找西医。医生说他的小肠有问题，必须开刀，将小肠的秩序重新整理，方能根本上治好腹痛。

父母一听，一致反对，因为当时人们对西医还缺乏了解，不敢相信，随便开刀动膛岂不危险？

胡文虎说服不了父母，但他生龙活虎一个人，哪甘病病快快活着。按照他的性子，是要立刻开刀动膛把那令他痛苦不堪举步艰难的病患三下五除二地干掉。

胡文虎谎称去走亲戚，父母信以为真。可是隔些日子收到胡文虎自香港发来的电报，说他已进医院施过手术，现已拆线，情况良好。此举令父母惊悸不已。

这件事充分地体现了胡文虎果敢的性格。

1908年，胡子钦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弥留之际，他叮嘱儿子文虎要与弟弟文豹同心协力，发扬光大永安堂药铺，要教育子孙后代，永不忘记故土家乡。

父亲辞世不久，胡文虎便将店里所有的现款，约3000缅币，换成港币，随身携带，只身去了香港。

此举令亲友熟人好一阵议论，胡文虎怕不是父亲去逝了，再没人管束他，他带上这许多钱去香港寻欢作乐哩，那真是不肖之子啊！

旁人是把胡文虎看扁了。年近而立的胡文虎已经不是昔日的顽蛮小儿，此番他携款赴港，正是牢记父亲的遗嘱，迈开将永安堂药铺发扬光大的第一步。胡文虎没去花天酒地，而是去了几间药材行。

原来，永安堂药铺的药材都是从香港的几间药材行批发而来，因为是老业务户，香港那边时常先发货，永安堂药铺收货后甚至卖完货后再汇货款。这样，永安堂药铺自然就欠着香港药材行的帐。胡文虎这回就是特来把父亲

欠着的帐一一偿还。

香港药材行的老板们原以为胡子钦一死，那些货款肯定收不回来了，没想到他的儿子胡文虎竟主动来香港清还，真是意外而又高兴。难得胡文虎初出茅庐即有如此良苦用心，只此一着便赢得众老板们另眼相看和对永安堂的加倍信任，大家争相发货给他。

胡文虎这一趟从香港返回仰光，带回大批药材，使永安堂药铺中的货物更加丰富完备。而此后，只要永安堂药铺的货单开到香港，香港药材商无不尽快发货。

胡文虎这些年在父亲身边的确大有长进。胡子钦对儿子的管教十分严格，他给文虎规定的时间表是，白天帮助料理店务，过秤草药，夜晚完成学业，研读医书。在父亲的影响下，胡文虎对把脉抓药也兴趣日浓，无论父亲配什么方，抓什么药，他都仔细观察，潜心琢磨，铭记在心。渐渐地，他也能走出广东街 644 号的永安堂，给人按脉行医了。

胡文虎继承了父亲的医术，也继承了父亲的医德。父亲胡子钦在仰光有“红利郎中”之称。胡子钦常对人讲，“救人一命，胜食十年斋。”他对病人一视同仁，无论贵贱，有的穷人家给不起药费，给一张红纸，包几粒白米，以示吉祥和谢意，他也笑纳。胡文虎像父亲那样善待病人，永安堂很快又像胡子钦在世时那样门庭若市。为了减轻病人负担，胡文虎还四处奔走采购便宜药材，并多次爬上阿拉干山采集草药，使永安堂的药价降至仰光最低点。

但是，永安堂的业务却仍然显出日渐衰落的趋势。这并非经营不善，而是形势使然。

20 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达，医药制作日趋现代化。西药的畅销使古老的中草药受到严重冲击，人们发烧感冒只需服用几片阿斯匹林即可康愈，何苦劳神买大包草药来煎汤饮服呢？

永安堂面临危机。

但是，胡文虎坚信西医要完全打倒中医也是不可能的。西药服用方便，收效快捷，却多产生副作用和抗药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中药自有其特殊的疗效和优势，为什么不把中药材也制成如西药那样的丹、膏、丸、散之类的成药呢？

胡文虎认定永安堂要生存和发展，从长远来看就必须自己办药厂，如果能用西药制作的科学工序，把祖传的秘方和传统单方的中药材加工为成药，就不愁没有销路。

变永安堂药铺为制药厂，这是个生死抉择的重大变革。

母亲李金碧非常支持儿子的想法。她倾尽家中的金银现款和其他私蓄，共约 2000 块钱交给文虎和文豹兄弟，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全部家底，我如今都交付你们，一家人的吃穿，就全靠你们了，切望你们好好做人，好好做生意！”

胡文虎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故乡中川那首流传的童谣此刻又在他耳畔回响：

月光光，
照四方，
唐人街，
夜茫茫；
人生就为一口气，

佛爷也争一炉香；
阿妈盼我快长大，
做个炎黄好儿郎。

胡文虎暗暗发誓，一定要振兴永安堂，发扬光大父亲开创的永安堂事业，给父母争口气，给胡氏祖宗争口气，给客家人争口气，给中国人和中国医学争口气。

胡文虎接过母亲给的总值 2000 多元的家产，留下一半给弟弟文豹继续经营永安堂药铺，自己带上 1000 多元去香港坐庄办货，打算赚了钱购置制药设备。

胡文虎在香港一面办货，一面了解和考察国内外药业发展情况，这期间他还到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地熟悉药业行情，学习成药制作技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天吃最廉价的便饭，每晚住最廉价的客店。

胡文虎每到一处，都虚心请教，留心观察。在日本，他见德国拜耳药厂生产的西药十分畅销，便特意到德国人开的西药行买了些药膏、药水，只为得到其中的说明书，摸清西药的性能和用途。

在调查中，胡文虎发觉，第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地，人口稠密，生活贫困，苍蝇蚊虫很多，劳动人民中暑热病盛行；第二，西成药虽然便于携带和服用，但其价格比中药高出许多倍。

缘着这两点发现，一个创制新药的思路在胡文虎脑子里渐渐清晰起来，这个新药须是治暑热头痛蚊虫叮咬，便于携带和服用，并且价格便宜。

这时，胡文虎在香港办货顺手，获利不少，返回仰光时便购回一套新式的制药设备，以及各种西药的说明书。弟弟胡文豹自小念的英文学堂，这下英文派上了用场。胡文豹把说明书翻译为中文，兄弟俩探究西药制作的奥秘，认定中药完全可以按照西药的制作方法，生产成系列性的简便成药。

当初父亲胡子钦是这么想的：把文虎送回老家学中文，把文豹送进英文学堂学英文，永安堂里有懂中文的，有识英文的，生意一定会更加发达。

虎豹俩兄弟认准了就真枪实弹干起来，他们在祖传秘方“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古方，利用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为原料，采取西药的科学制作方法，经过 3 个多月的辛勤研制，一种既可外抹，又可内服，能治感冒、头痛、鼻塞、晕车船的新药诞生了。

连日的劳累，胡文虎感觉头晕目眩，作呕欲吐。他想试试自己创制的新药疗效如何，便从罐子里抠了点药膏抹在太阳穴上。他只觉神清气爽，浑身舒坦，晕眩和呕吐感顿时就消失他狂喜地把这情形告知母亲和弟弟，一家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第三章 业发于勤 万金油闯新市

万金油秘方是胡老先生所授，还是德国老板所赠？胡文虎笑而不答。手提箱装满代销药，求人“寄售”、发货、收款，只看店家脸色行事。万金油大瓶改小瓶，赢得顾客心。夜色遮掩中，胡文虎登高贴广告。

关于万金油的来历，有不少传说。

一说胡文虎当初奔走南洋的时候，在新加坡结识了一位从事西医的客家老前辈——胡老先生，那时候新加坡的医生还很少，胡老先生既从事西医，在新加坡很有名气和威望。胡老先生见胡文虎钻研药业，年青肯干，可惜不懂药物学，就送了他一个包治百病的验方，这就是万金油。

一说万金油其实是德国人的药方。胡文豹早年于仰光外文学堂毕业之后，曾到一家德国人开的西药房任职。胡文豹工作勤恳，为人诚笃，深受德国老板青睐。德国老板告老退休，返回柏林之际，便以万金油制药秘方赠与胡文豹。

种种传说，不知孰真孰假。而胡文虎本人对此一直秘而不宣。旁人问及，他总是笑而不答。胡文虎回家乡中川，乡亲们欲知真情，胡文虎也只是说：“管它是真是假哩，多几种传说，就多几种广告，让人家去议论，这是好事情嘛。”

但胡文虎发财之后把一幢跟他自己的住房差不多大小的花园洋房送给了新加坡的那位胡老先生，却是确有其事。胡文虎还把胡老先生的同样是当医生的儿子聘为他的终身医师以及他到国外游历时候的随行翻译兼顾问。这显然是知恩图报的表示，胡老先生即使不是送了秘方给胡文虎，也是给予了他某种至关重要的帮助。

万金油的来历一直到虎豹兄弟相继辞世，仍未公布于世，成为一个让后人永久难解的谜。客家父老则宁愿归功于胡氏祖传的“玉树神散”秘方的灵验，他们认为那才是万金油之魂。

万金油之类的药油并非首创，当时生产这类药物的有很多家，为什么独有胡文虎能够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东南亚一代豪门？

胡文虎当时创制了五种成药，除万金油外，还有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四种。胡文虎自己设计了以老虎为图案的商标，统称“虎标良药”。老虎在当地民间象征着法毒镇邪之力量，而又与虎豹兄弟的名字相关。与此同时，“永安堂中药铺”也更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到处疾疫流行，医药短缺，然而，这全球性的不幸却恰恰为虎标良药提供了横空出世的天机。经济萧条，社会动乱，人们患病没钱买药求医，价格低廉服用简便的虎标良药自然成为人们力所能及的选择。

不过，虎标良药的销售一开始并不顺利。起初，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头痛粉之类的手提箱到各家药店请人代销，他费尽口舌介绍自己的药品功效如何好，替他代销又如何有利益，好说歹说人家才勉强答应下来，代为“寄售”，货卖出去了，人家才付他款。就这样，胡文虎还满口道谢。

货到人家店里后，胡文虎时常到店里探望，看货柜上的药是否卖完了，一是好及时收货款，二是好再发新货。怕人嫌他烦扰，他总是悄悄地伸长了脖子向店里张望，而下直接问店家卖完了没有，若看见卖完了，便满面笑容

地打开手提箱，取出些药品，十分客气地请店家摆上柜台去。至于收钱，那是一定要等人家卖完了货才敢开口的。胡文虎陪着小心，只恐人家不给他“寄售”。

适逢大战时期，制药原料价格飞涨，使得成本加重。万金油眼看着要亏本，当时的同类产品，厂家为了减亏，全都暗中把贵重的原料减少了份量。胡文虎认为这个办法使不得，药品的效力是最重要的，原料减少，药品的效力自然就要降低，影响到顾客的治病效果。可是不减少原料，又势必亏本；而若要加价，顾客又恐怕不能接受。胡文虎思量再三，终于想出一招——减量不减质。就是把原来的一满瓶油，只装七八分满，原料和价格都照旧不变。

减量后的虎标万金油销售正常，一般顾客都不大留意份量的减少，只当是制药厂偶然没装满。到后来，别家的药油因为减少了原料，药效降低，顾客使用后效果不佳，便不再购买；唯独虎标万金油保持了原有质量，药力较强，虽然没装满瓶，顾客也不大在意，万金油终于从众药泊中脱颖而出，变得抢手起来胡文虎初尝了薄利多销的甜头。

“薄利多销”是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经商的座右铭。胡文虎在故乡中川读私塾时就能背诵范蠡的诗文，并且听先生讲起范蠡的经商之道，范蠡是一位大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大经济学家，他辅佐越王勾践发愤图强、灭亡吴国之后，弃官经商，很快致富。范蠡有一整套经商理论，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薄利多销”，这正是胡文虎所信奉和实践的。

减量不减质一招成功，使胡文虎坚定了价廉物美才能畅销的认识。他从此确立了“永安堂”研制中成药的方向，即瞄准便宜的普通药，而不是贵重的大补药。并且为了降低成本和单价，胡文虎把大瓶装的万金油改为小瓶装。

关于这件事，民间有一个俚俗的传说。有一天，胡文虎走在仰光街上，忽然尿急，一时找不着地方，就在近旁的垃圾堆前小解了。便溺冲开垃圾，露出小半截玻璃瓶，胡文虎看那玻璃瓶小巧玲珑，心里一动，要是把万金油用这种小玻璃瓶装如何？他这么想着，就俯身把那小玻璃瓶拾起，用纸擦净了，带回店里去。

胡文虎回到店里，细细端详那小玻璃瓶，越看越喜爱。他想，时下出售的万金油每瓶要卖3盾缅币，这个价格对于贫穷百姓还是要咬咬牙关才肯买的；假如改用这种小玻璃瓶装，可将价格降至每瓶几毛钱，那就能适应多数顾客的购买力了。

这样，就有了小瓶装万金油问世。

一些传说虽是无稽之谈，却又总是事出有因。事实是，为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胡文虎一直都在做降低万金油成本和单价的努力。起初，他把万金油大号六角玻璃瓶改为小号六角玻璃瓶，后来又把小号六角玻璃瓶改为小铁盒。大瓶万金油每瓶1元，而小盒万金油每盒1角，并且便于携带，自然使顾客大增。

那时，新加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仁丹”药丸的张贴广告，胡文虎便仿而效之。他在仰光印刷了一批万金油宣传广告，运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开始，胡文虎花钱请了两个人帮他张贴，可是贴的位置太低，贴上去就被人撕了。胡文虎只好亲自上阵。可他到底是个老板，大白天上街张贴广告未免有些难为情，总要趁着夜色遮掩才好。

这时，有个名叫阿遇的胡氏同乡出来找事做，胡文虎便留他到药行里帮着张贴广告。每到夜晚，胡文虎和阿遇便出动，发现街头有个好位置，阿遇

就蹲下身子让胡文虎踩在自己双肩上，把广告张贴到那显眼的高处。

不出一个月，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甚至有些公共厕所，都能看见“虎标良药——万金油”的宣传广告了。

第四章 美女伴虎 广告奇招迭出

捐 500 元，看了戏，做了善事，还给虎标良药做宣传，何乐而不为。教人接吻要口含八卦丹，“吐气如兰”，新潮有趣。虎头车开进上海滩，招摇又风光。虎豹别墅既娱乐游人，又做了广告，一箭双雕。

万金油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广告的成功。可以说，在胡文虎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人比他更重视和更懂得做广告了。

创业之初，胡文虎除了张贴街头广告外，每年春节他都派人在大街路口悬挂画有老虎图案、写有“永安堂”红字的灯笼，名义上是为佳节增添喜庆色彩，实际上是提醒人们永安堂的存在，加深人们对永安堂的印象。

有一次，胡文虎逗留广州，夜晚路过一个戏院，只见戏院前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他抬头一看，见门前花牌上写着：“方便医院演戏筹款”。胡文虎踌躇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

胡文虎走近办事台前问道：“我想买张票，你们最贵的座位要多少钱？”

工作人员看见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主动要买最贵的座位，不胜惊喜，连忙茶水招待，一番询问，方知是来了一位南洋华侨。

胡文虎花 500 元购得一张名誉券，由大会主持及众人前呼后拥引迎至会场前排中央位子入座。场内观众不知来了什么大人物，争相站起来观看。记者也在他一旁就座，采访他的身世经历。

第二天，胡文虎主动把买名誉券的事情作为新闻在广州各家报纸刊出。文章自然把胡文虎这个人和他的药介绍了一番。事后，胡文虎很得意地对人说：“我捐 500 元，看了戏，做了善事，还给我的虎标良药大大宣传了一番，真是很值得！”

20 年代中期，胡文虎贴出告示，重金征集日历画稿。

告示贴出后，画稿雪片般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位羞花闭月的美女，一双玉臂环抱着老虎的脖子，嫣然巧笑。美女之靓丽，老虎之生气，相得益彰，满目瑞气吉祥。胡文虎很钟意，当即买下这幅画稿，把它作为日历的封面。

日历印制后，胡文虎广为赠送。一时间，永安堂“美女伴虎”为封面的日历到处流行，人们竞相争睹，爱不释手。就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的夫人看了，也赞不绝口：“太美了！胡文虎真是一个天才商人。”

胡文虎很早就注意到外国药商推销药品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胡文虎觉得这是宣传药品的有效办法，因此不惜血本。别家公司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常是些枯燥的自吹自擂，胡文虎却喜欢通过讲故事来做广告，因为读者总是比较喜欢读故事。胡文虎专门聘请了几位文人，天天好酒好菜好烟好茶招待，让他们任在舒适的嗜子里编写广告稿。

比如宣传八卦丹的广告，大意是一对恋人相爱接吻，男的口臭，女的不喜欢，多扫兴啊！怎么办？口含八卦丹，包你“吐气如兰”。那个年代教人接吻要口含八卦丹，确是非常新潮有趣的。

同样也是宣传八卦丹，另一则广告题为《学生罢课原因》，题头有一幅《今天罢课》的漫画。广告说：“缅人某教员，内有瘤疾，胃热口臭，授课时吐痰满地，秽气难闻，学生陆续传染，到校者日见稀疏，久之发生罢课风潮。某教员以学生无故罢课，不守校规，责词极严。学生代表答称先生不得

卫生之法，毒气流传，染及全校，即不罢亦罢矣。先生讶曰，然则当用何怯施救？学生云，永安堂虎标八卦丹，乃清胃化痰法除口臭之圣药，先生购来常服，则恼疾可疗；且闻先生夫妇失和，若并服之，感情顿生必合好如初矣。更有足述者，八卦丹能治时行瘟疫、伤寒中暑、霍乱吐泻、心腹疼痛等症，不论居家旅行，慎应购备，真随身之宝品，济世之金丹也。”

全文 209 字，读来完全像一则幽默小品，令人捧腹。这是小型广告。胡文虎还时常请人炮制大篇的故事广告，如《为什么关公刮骨疗疾不会痛？》。文章开头只绘声绘色描述关公领兵攻打樊城，中箭落马，名医华佗为他刮骨疗疾，关公吃下两包药散，华佗持刀切入他手臂，刮去箭毒，关公竟全然不觉疼痛；刮骨之后，关公即给伤口抹上了一种药油，只隔几天，关公的伤就痊愈了。广告稿这才转而写道：华佗问：“关公，你吃的两包药散是什么灵丹妙药？后来在伤口上涂擦的又是什么药？能不能介绍给我，让我也买一点？”

关公听了，只是哈哈大笑，边笑边说：“华佗，你是名医，还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药？我吃的两包药散，就是从永安堂买的虎标头痛粉和止痛药。伤口上涂的药，是鼎鼎有名的虎标万金油呀！”

“啊，虎标药真是名不虚传，可谓是仙药，病者连刮骨都不觉得痛，我也去买几包，为天下人治病之用。”

由于故事写得活灵活现，这则广告刊出后人们争相传阅，永安堂的虎标良药竟一时间抢购一空。

胡文虎摸准了群众的口味，又请人编写张飞大战长板桥的故事——《为什么张飞能喝断长板桥？》这篇 500 多字的故事讲的是刘备被曹军大败，逃过长板桥，曹军追至，张飞竟将长板桥喝断的情形。故事这样写道：曹操赶到，也恐有伏兵。这时，张飞厉声大喝道：“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长权桥震得摇摇晃晃，曹军兵将双腿发抖。张飞见曹军不敢出战，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长权桥被震发出吱吱声响，曹操后军阵脚开始移动。张飞又喝道：“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这一喝不要紧，只听得声音在空中回响，长坂桥“咔嚓”一声折成两段，曹军吓得面如土色，曹将夏侯杰即时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而死。曹军不战而退，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张飞为何三声就喝断长权桥呢？只因为他上阵前吃了虎标八卦丹，擦了虎标万金油，所以精神抖擞，气贯长虹，声如巨雷。

以如此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广告，在当时算得十分进步了。胡文虎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地让虎标良药一天天地深入人心，从而家喻户晓。

胡文虎发达之后，做广告就做得更加轰轰烈烈了。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引人注目，他花巨款请美国福特汽车厂特制了一辆虎头车身的轿车。

1935 年 10 月，胡文虎作为马来亚华侨代表队总领队，率领运动员回国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特意将他的虎头小轿车带到上海。当虎头小轿车驶向上海滩时，胡文虎嘱司机减慢车速，并不时闪动一对老虎眼睛般的前车灯，揪响老虎吼叫般的喇叭声。上海人没少见各式各样的车辆，却从未见过眼前这老虎状的小轿车，人们蜂拥而至，尾随围观，上嘴八舌议论着：“这是哪来的怪物，谁的车子？”

“那不写着，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

胡文虎喜滋滋地坐在车里，享受着大上海的人们看他的希罕，那些言论

都正是他想要听到的，比什么广告都好。

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虎头汽车进上海，“阿拉”成了乡巴佬》，胡文虎一下就成了大上海妇孺皆知的人物。

紧接着，胡文虎在新加坡和香港备买下一块地，兴建“虎豹别墅”。胡文虎造别墅不单为己住，而且供人游玩。有人认为那是中国民间生活艺术的展览馆，内中有最地道的中国民间泥塑、观音菩萨、妖魔鬼怪、飞禽走兽，还有亭台楼阁、假山石洞、花园、高塔及游泳池。胡文虎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别墅呢？

他自己说是要与人“有乐同享”，这或许是目的之一，而另一个目的显然还是做广告。游人到虎豹别墅玩过之后，当然知道虎豹别墅是胡氏兄弟所造，提到胡文虎和他兄弟便难免提到万金油和虎标良药。这样的广告，一箭双雕，既娱乐了游人，又宣传了自己，做得自自然然。就像订制那辆虎头小轿车，反正是买辆车坐，买普通的车不过就是实用罢了，而特制虎头小轿车却在实用的同时更增添了广告效应。

胡文虎曾对人说，他无论何时何地，见到别人的宣传，就要想一想这方法是否也可用来宣传虎标良药。只要是吸引他的事情，他就联想起来，脑子不停地转呀转，坐车的时候想，走路的时候想，饮茶、吃饭、如厕，还是在想着广告，务求自己的广告比别人的广告更醒目、更吸引人。

所以，胡文虎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了广告性质，捐款、行善、办报，甚至包括与橡胶大王陈嘉庚作对。

胡文虎做广告做到连自己都下放过，他穿的衣服，胸前衣袋外面绣着虎头，他系的领带也绣着一只虎。他的挂表链配有一只金牌，金牌上也刻有一只老虎。而胡文虎住的地方，门口左右两边门柱上，总是置有两尊泥塑、一只老虎，一只豹子。

胡文虎真是天下精明绝顶的商人。

第五章 姐妹妯娌 手足兄弟连襟

郑氏身强力壮，胆量过人，胡文虎日后虽又娶了几位太太，但对这位元配夫人却始终很尊重。一对姐妹嫁与一对兄弟，胡氏兄弟亲上加亲，传为佳话。共用一只钱柜，兄弟俩从不分你我。

胡家本来有三兄弟，哥哥叫文龙，早年夭折，文虎是老二，比弟弟文豹长两岁。

这弟兄两个从外貌到性格都迥然不同，胡文虎生得五短身材，性格却像他的名字那样虎虎有生气，他生性要强，勇猛好斗，永不安分，好动，爱热闹，说话办事总是那样精神抖擞。而胡文豹虽长着大高个子，却是一个极安静极守本分的人，他说活声音很小，走路步子很慢，凡事慢慢吞吞，不急不躁，从不发脾气。也许正是个性上的差异，使兄弟二人在为人处世上恰成互补，成为永安堂事业的好拍档。

胡文虎 24 岁结婚，太太郑氏是广东惠阳客籍人，生长于仰光。郑氏身强力壮，胆量过人。据说一次有个贼黑夜中摸进胡家来偷东西，被郑氏发现，她毫不慌张，大喊一声“捉贼！”上前把贼抓住，贼欲挣扎逃脱，拳脚相加，郑氏毫不畏惧，与贼对打。贼到底心虚，服了软，郑氏斥责他一番，晓之以理，这才把他放了。

郑氏是个贤德的女性，她跟胡文虎结婚的时候，胡文虎还算不上富有，郑氏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不但要操持家务，还夜以继日地做永安堂的制药和包装工作，任劳任怨。所以，胡文虎发达之后虽然又娶了几位太太，但对这位元配夫人却始终都很尊重。

郑氏有一位妹妹，也极为贤德和勤俭，在郑氏的撮台下，郑氏的妹妹不久就与胡文豹缔结良缘。一对姐妹嫁与一对兄弟，姐妹成妯娌，兄弟结连襟，美好姻缘，一时传为佳话。自此，胡氏兄弟亲上加亲。

当初父亲胡子钦对两个儿子就早有设计，实行定向培养。胡子钦送文虎回家乡就读私塾，而文豹则送进仰光的学堂接受英文教育。胡子钦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现在兄弟一个懂中文，一个会英文，这对他们事业的开拓有很大作用。

但是，胡文豹虽然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天性中本分知足，不求发达，只愿安稳的一面从未改变。而胡文虎虽然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却天生一种敢想敢干、开拓冒险的精神。

兄弟俩如果守着父亲留下的永安堂，过日子自然不成问题，但是死守家业太不台胡文虎的个性，他是一个有大野心的人，他要把永安堂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他后来要到新加坡去扩设永安堂，把仰光的永安堂留给胡文豹独自经营。

个性不一致常常导致想法不一致，兄弟俩难免也为经营上的事发生争执，但是却从不影响兄弟间的感情。有一个关于保险柜的故事很能体现他们亲密无间、相互无猜的手足情谊。

父亲遗下的财产中，有一只保险柜。父亲去世后，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俩各执一把钥匙，无论日常用钱还是永安堂的开销，彼此都可以打开保险柜随取随用。兄弟俩商定，凡需要用钱，只径直到保险柜内提取，不必记帐，也无需多言，若是现钱用光了，再补放一些进去就是。兄弟俩只知道花销的

总数，却从不知道也从不计较谁用多用少。

后来，胡文虎到新加坡去扩设永安堂，生意越做越红火。胡文虎总是把在新加坡赚得的钱跟弟弟胡文豹一起平分，从来不认为自己该多占。

胡文虎常说：“一个人能孝顺父母，方能使儿女孝顺你；一个人连兄弟也不友爱，怎么能使朋友放心结交你？”

到了1941年，二战局势日益恶化，胡文豹深感不安，世界动荡，时局变化莫测，而他和兄长胡文虎都已年届花甲，他们兄弟俩已经共用保险柜大半辈子，他们兄弟俩终生不分家肯定没问题，但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他们将来怎样，能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兄弟们不分彼此吗？胡文豹终于把自己的忧虑对哥哥说出来。

胡文虎觉得弟弟说得在理，大战临头，生死难卜，假如他们俩的财产不稍加区分，只怕要给予侄辈留下难解的纠纷。

这样，兄弟俩就特意添置了两个新保险柜，两个新保险柜各有两把钥匙，胡文虎和胡文豹各一把，以示兄弟的现款不分彼此，仍然可以互相支取。他们还把旧保险柜的现款分作两半，各得一份，存入各自的新保险柜里。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胡文虎打开他的新保险柜，发现多出很多钱来，他大约一数，竟多出30万元。胡文虎想可能是弟弟文豹把钱误放到他的保险柜里来了。

胡文虎便问弟弟：“这许多钱是你错放到我的柜子里了吧？”

胡文豹笑笑说：“没错，那是你的。文豹不才，仗兄长的力托兄长的福，才成为一个富翁，兄长却还主动提出分财，各得一半。想想兄长奔忙一生，文豹却坐享其成，真不好意思。弟现以这区区小额奉赠兄长，望兄长笑纳。”

胡文虎看着弟弟一张表情诚恳的脸，不觉心头一热，他连忙摇头摆手道：“不敢当！大不敢当！”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

胡文豹说：“兄长之所得，已倾囊捐献于国内慈善事业，手头分文未留。不日即是兄长60寿辰，请容豹为兄长祝寿，以博兄长诞辰快乐，也好使文豹稍息惭愧之心。”

胡文虎点头道：“弟一片诚心，文虎心领了。文虎会挣钱，却从不敛财，千金散尽，捐赠慈善，乃兄之所好。弟若赠我款，倒不如汇往仰光，捐赠缅人学校，兄当更为快慰，仰光是你我生长的地方嘛！”

胡文豹听兄长如此一番言说，更生钦佩之情，答应道：“恭敬不如从命。”

胡文豹果真按照胡文虎的意思，不日即把30万元巨款汇往仰光，捐赠仰光缅人学校。

胡文豹来到新加坡后，兄弟俩一同住在虎豹别墅，饮食起居互相关照，每天上班都同坐一部私家车到永安堂。

新加坡永安堂有一间兄弟俩的办公室，布置得相当豪华。当中摆着一张长型的办公台，也是为兄弟俩共用而特制的，兄弟俩一左一右并排坐在桌前办公，室内有一只保险柜，两把钥匙兄弟俩各执一把，可随时开柜取款，彼此无须过问。存在银行的款项，也是兄弟俩都可以签名提款的。

虎豹兄弟在事业上的合作支持，在生活上的互敬互爱，在感情上的忠诚信赖，堪称手足之情典范。1944年9月7日，胡文豹先兄长胡文虎病逝。噩耗传来，胡文虎捶胸顿足，涕泪纵横，呼天抢地，伤心至极。

后人在纪念胡文豹先生的文章中，对虎豹兄弟的手足之情和历史功绩如此评价道：“胡文豹公，文虎公之胞弟也，亦侨生缅甸之仰光。天性笃厚，

友爱逾恒，手足之间，融融和睦，无分彼此。数十年如一日，而于公益事业，尤能同心同德，胞与为怀，慷慨输将，济群利众。故海内外谈胡氏仁风义举者，每棠棣并称，炳蔚同彰，猗钦盛哉！”

第六章 攻占市场 商场形如战场

半道上杀出个“佛标二天油”，胡文虎发誓一定要把市场夺回来。“虎”“佛”两家在报纸上展开广告大战，杀成一团，不分胜负，最终是吴市长出面调停。另一个战场也是你死我活，韦少伯广告牌竖到哪里，胡文虎就“追杀”到哪里。胡文虎把倭寇的仁丹压了下去，恨得日本人把重庆永安堂炸毁。

商场就是战场，胡文虎面对这个战场从不畏惧，无论对手多么强大，来势多么凶猛，他都绝不退缩、回避，而是勇往直前地迎接挑战，在战斗中他总是越战越勇，不获胜利，绝不罢休。

在虎标万金油问世之前，市场上就有多种类似虎标万金油的中成药，什么“如意膏”、“至宝丹”、“万应锭”、“如意油”之类。这当中较风行的是韦少伯的二天堂在越南的堤岸市唐人街生产的佛标二天油。

虎标万金油与佛标二天油虽然是同类型药物，都是主治伤风、感冒、肚痛、头痛、抽筋、肿毒、发痒、风湿等热带人体常发病，但它们起初是各有各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佛标二天油的主要市场是法属的安南三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荷属的印度群岛。而虎标万金油的主要市场是英属的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

虎标万金油由于功效好，又善于作宣传，影响越来越大，市场逐渐扩展到国内，正当胡文虎春风得意之时，佛标二天油也开始打向国内。

各地的永安堂分行负责人眼看着虎标万金油在佛标二天油的强劲攻势下，销售量急剧下跌，大有被佛标二天油取而代之的危险，纷纷致电新加坡向胡文虎告急。

虎豹兄弟坐在永安堂办公室那张特制的长型办公台前，看着告急电报雪片般飞来，胡文豹愁眉紧锁，胡文虎面色阴沉。

“这可怎么办？”胡文豹叹息道。

“什么怎么办！”胡文虎气呼呼他说，“怕什么，经商就是打仗，强者存，弱者亡。伯，人家也不会把市场让给你永安堂！”

胡文豹嘟囔道：“谁怕，我是说现在该怎么办？”

胡文虎一拍桌子站起来说：“该怎么办？跟他抢！既然他韦少伯要跟我争国内市场，我胡文虎奉陪到底！你马上通知所有分行，不惜血本立即展开广告宣传，一定要把国内市场给我夺回来！”

自此，轰动一时的“虎佛激战”便拉开了帷幕。

那时候一般卖药的手法也就是走江湖、变把戏，在街头巷尾、渡口墟场拉个场子表演武艺招徕看客，从而兜售“狗皮膏药”。据说国内是韦少伯率先使出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这一前所未有的招数，原先报纸上医生开业的广告很多，但药品在报纸上大登广告的还未曾见过。

胡文虎见韦少伯在报纸上做广告，便毫不示弱也在报纸上做广告。韦少伯每在某报纸刊出佛标二天油的广告，胡文虎必紧追其后在这家报纸刊出虎标万金油的广告，而且广告的版面必要超过佛标二天油，常常是佛标二天油版面的双倍。

“虎”“佛”两家在报纸上展开广告大战，不仅在版面上抢占地盘，而且在广告内容和形式上出奇制胜，标新立异，一时间，香港、澳门、广州的

报纸上，“虎”“佛”交战，昏天黑地，一片硝烟弥漫，办报的有如军人商，大发“战争”财，乐得嘴都闭不拢。

“虎”“佛”广告战愈演愈烈，由华南向华中、华北和华东扩展，广告词也不断升级。

这年夏天，孙中山总统逝世，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痛与哀悼之中。可是南京的各大报纸，每天占据大量版面的居然是“虎”“佛”两家针尖对麦芒的广告大战，这使得人们对报界深感不满。南京市市长吴铁城亲自打电话给报界，指责报人“见钱眼开，无事生非，实在有伤风化”。但是按照新闻学定义，广告也是属于新闻范畴的，报馆刊载广告也是名正言顺，无可指责。吴铁城市长只好亲自出面调停“虎”“佛”之争。在吴铁城市长的干预下，“虎”“佛”双方这才稍有收敛。

除报纸之外，“虎”“佛”之战的另一个战场是街头广告牌。每当韦少伯派人在各大城市竖立广告牌时，胡文虎必追踪而至，并且广告牌竖得更多、更大、更引人注目。在这场战争中，胡文虎设在各地的永安堂分行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们使胡文虎信息灵通，便于指挥作战。

在胡文虎的穷追猛打下，韦少伯渐渐感到精疲力倦，难以招架，佛标二天油步步退却，返回它的老根据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虎”“佛”之战的最终胜利，使虎标万金油在同类药物中赢得了霸主地位。

胡文虎打的另一场硬仗，对手是日本的“仁丹”。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一直行销国内的日本仁丹却仍然占领着四川的市场，致使虎标成药难以攻入。重庆永安堂分行经理胡万里为此专程奔赴香港，面见胡文虎，商榷把虎标成药打进四川市场的对策。

胡文虎早已对日本仁丹充斥国内各地深感不满，如今对这来自侵略者国度的产品更视为仇敌，他满心愤慨道：“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把倭寇的仁丹给我压下去？”

其实，胡万里早已胸有成竹，这时，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当然，一定要把倭寇压下去，我这次拟定了一个方案，特来向先生请示。”

“什么方案？”胡文虎急切地问道。

胡万里说：“目前民众抗日爱国情绪高涨，我想顺应天时，组织一支宣传队伍，深入城乡山区，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我们的虎标成药，如此，倭寇的仁丹自然就压下去了，先生以为如何？”

胡文虎听了，连声叫好，还忍不住一个劲地夸胡万里：“到底是我们胡家的子孙，有办法！就照你说的，赶紧干起来。”

胡万里取得了胡文虎的认同和支持，日夜兼程回到重庆。

他紧锣密鼓组织了5个宣传大队，赶排了一批表现抗日内容的短小精悍、形式活泼的话剧和歌舞，深入城乡山区宣传演宣传队员们身穿老虎图案的服装，胸前披挂写有“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有的队员还化妆成老虎。宣传队所到之处，不用介绍人们就知道是胡文虎派来的永安堂抗日宣传队。

每到演出结束后，宣传队员们就一面发广告单，一面念快板：“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还有随队郎中为病人看病，免费发送虎标成药。

重庆永安堂分行的宣传顺应民意，深得民心，加上重庆永安堂分行一贯

奉行胡文虎规定的“薄利多销，不能随意涨价”

的经营方针，虎标成药迅速风行已山蜀水，取代了日本的仁丹。

日本人因此对永安堂恨之人骨。

1940年5月，日本广播电台扬言要炸毁永安堂重庆分行。5月25日，日机轰炸重庆时，果然将重庆永安堂分行三层楼房全都炸毁。

胡文虎得知，不但不痛惜，反而称快：“值得，值得！只要把倭寇的仁丹压倒，再炸毁一个永安堂也值得！”

第七章 大兴报业 星系星光灿烂

胡文虎坦言：“裁缝师傅不偷布，他的老婆无穿裤。”办报的目的是为了给虎标良药做广告宣传。胡文虎的《星洲日报》同陈嘉庚的《南洋商报》两强相争，最终同归于尽。胡文虎办报纸越办越过瘾，一口气办了16张报纸。《星岛日报》被海内外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的号角”。

胡文虎为了拓展市场，宣传虎标良药，在报纸上大肆刊登广告，每年的广告花销数额极其巨大。胡文虎不由地想，花这样多的钱在别人的报纸上登广告，倒不如自己办报纸哩。胡文虎因此动了办报纸的念头。

胡文虎在未办报纸前，仅在上海的报刊广告费一年就高达100多万元。作为一个商人，他办报纸最直接的想法，自然就是要宣传他的产品虎标良药。

诚如胡文虎本人在《星洲日报》宴请郁达夫的餐会上所言：“诸位恕我说话粗鲁，客家俗语有道：‘裁缝师傅不偷布，他的老婆无穿裤。’作为虎标永安堂主人之二的胡氏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不想隐瞒，办报的另一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做广告宣传，打开销路，借此扩大永安堂的事业及其影响。”

1929年，胡文虎在新加坡独资创办《星洲日报》。此时，他的永安堂总行已正式迁到新加坡，虎标万金油及头痛粉、八卦丹行销东南亚和国内，在市场站稳了脚跟。据说这之前他和朋友曾在仰光办过一份报纸，因为营业不振，不久就垮了。

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对办报纸并没有兴趣，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打算。直到1926年，他看见几位同乡青年在新加坡办了一份名叫《垦报》的小报，此时正当“济南惨案”发生，这家《垦报》对此作了详尽报道，号召华侨爱国，言论慷慨激昂，读了令人激动、振奋，一时极为畅销。胡文虎正是读了这份报纸，才萌发了办报纸的兴趣和打算。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报纸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其报纸的诞生甚至早于国内，早在100多年前，新加坡就先后有《叻报》、《星报》、《天南星报》诞生，而马来亚也有《檳城新报》创刊。

近代以来，继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外侮接踵而至，国难深重。海外华侨虽被满清政府视作化外顽民，却难弃炎黄子孙的爱国之心，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孙中山倡导的驱逐鞑虏的民族革命运动，都在南洋华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刊行报纸，发表舆论，为政治变革推波助澜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报纸都是缘政治而生，关注国事，表达个人的政见和主张，没有哪一家以营利为目的，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经营之道，大多是同仁协办，同乡支持，由于资金不足，或时办时停，或改弦易辙，或昙花一现。

到了民国成立之后，政治上相对稳定平静，报纸逐渐增多商业色彩，纯商业报纸开始诞生。

第一家纯商业性的报纸是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它的创办人是橡胶大王陈嘉庚。

陈嘉庚继承父业成为商人，经营过很多种生意，如米店、黄梨罐头厂、地皮、房产、建筑业，而使他真正成为商业巨子的却是种植橡胶。陈嘉庚1906年开始试种橡胶，这不但使他本人的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和质的飞跃，

也整个地改变了马来亚华侨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构和面貌——马来亚橡胶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围绕着橡胶，马来亚百业俱兴。陈嘉庚除了种胶卖胶，还开厂制造轮胎、胶鞋等胶制品，销售公司多达七八十个。陈嘉庚每年用于推销产品的广告费数不胜数；因此他便想到办一张报纸，明明白白就是以商务为目的的报纸，就叫《南洋商报》。

《南洋商报》初创时，由于缺乏人才，没有经验，办得非常简陋幼稚，甚至粗制滥造，但是它毕竟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又是南洋唯一一家商报，很快就站住了脚，并逐渐成为一张最具影响力的侨报。

胡文虎显然从陈嘉庚《南洋商报》的成功得到启示，陈嘉庚可以利用办报纸来推销他的鞋子、轮胎，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办报纸来推销我的万金油、头痛粉呢？

1927年，胡文虎诚邀办《垦报》的几位青年同乡为他筹办《星洲日报》，并与新加坡春源印务公司的老板邓荔生合作。《星洲日报》系胡文虎独资创办，但是出版的头一年，印厂是由邓荔生所经营的春源印刷所折成一部分资本参加合作，所以初任总经理是邓荔生。但邓荔生不久即退出，胡文虎改聘林霭民为总经理、傅无闷为总编辑。林霭民和傅无闷都是职业报人，博学多才，笔杆子很硬，《星洲日报》得此二人，如有神助，第一年周年纪念就刊印了一部60多万字的巨型特刊，在南洋华侨的报业史上可谓是破天荒的创举。

胡文虎的《星洲日报》横空出世，使得多年来称霸南洋华侨报坛的《南洋商报》遭遇劲敌。《星洲日报》既有雄厚的资本，又有出色的人才，与《南洋商报》可说是旗鼓相当，从此这两家报纸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竞争，时间长达数十年。直到1971年新加坡“五月风暴”之后，两家报纸先后被当局接管，后来又合并，这场竞争才宣告结束。

《星洲日报》办得颇有影响，使胡文虎对办报纸兴趣日浓。办报纸的好处显而易见，报纸作为舆论工具，可以发表自己对社会的意见，对于不满意的人和事都可以进行批评和抨击；报纸可替自己宣传药品，不仅可以大量刊登广告，还可以用新闻的方式大事宣传，办报纸有这么大的好处，何乐而不为？所以，胡文虎后来每到某个大城市开设永安堂分行，就有意要在那个城市开办一家报馆。

1930年，胡文虎在汕头设立永安堂分行，并开办药厂。当地报纸曾给予虎标良药诸多批评。胡文虎想，自己每年都要付给汕头报界为数不菲的广告费，反而还要挨别人批评，倒不如把这些用于做广告的钱拿来办报纸呢。此时的胡文虎已是财雄势大，不久，一份新报《星华日报》就在汕头诞生。胡文虎为《星华日报》广聘人才，购置优良设备，令当地报业感到威胁。

此后，胡文虎又于1935年推出《星中日报》。同年9月在厦门创办《星光日报》，在广州创办《星粤日报》。胡文虎不经意间开拓了他药业之外的另一个行当——星系报业。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人们深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忧心如焚。胡文虎顺应时势需要，在香港仅一年内办起3家报纸——《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晨报》。1939年在马来亚创办《星报》。1940年在香港增办《星岛周报》，同年又在新加坡收购接办《总汇报》。至此，胡文虎一人独资创办10家报纸，令世人惊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文虎又在福建创办《星闽日报》，在上海创办《星

沪日报》，在香港创办英文《虎报》，在曼谷创办《星退日报》和《星退晚报》。

胡文虎一生独资创办了 16 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报业网，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星系”的天空。胡文虎因此以报业大王的赫赫声名载入 20 世纪国际新闻史册。

胡文虎虽然坦诚布公地承认自己办报纸是为了宣传虎标良药，但实际上他是非常注重报纸的社会效应和教化作用的。在 1929 年《星洲日报》的创刊宣言中，胡文虎就提出：“环顾垦洲，物质文明一方面虽稍发展，而精神文明，则实多缺陷。故极亟增进社会教育的效能，为之补救。如对于宗法社会之陋习、封建时代的思想，应根本改革，而于现代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美术，更应沟通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星岛日报》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被海内外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的号角”。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星华日报》，在推动抗日救亡活动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认为是“潮汕地区最大也是最进步的报纸”。胡文虎以他的实际行动展示和达到了他宣传虎标良药之外，办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适应现时代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并且在他办报纸的客观实践中，毫无疑问是后者超越了前者。

第八章 陈胡斗法 终究握手言和

胡文虎初到新加坡，偏要与早已是南洋华侨中的第一号人物陈嘉庚作对。胡文虎说：“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胡文虎做校门掠人之美，陈嘉庚开赞助人大会给他颜色瞧，胡文虎大失面子，与陈嘉庚对簿公堂。

远在胡文虎到新加坡扩设永安堂分行之前，陈嘉庚早已是公认的南洋华侨的领袖。作为华侨实业家，陈嘉庚享有“橡胶大王”之称，他的立身之道是“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国爱乡。”他在南洋华侨中德高望重，深受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崇。而新加坡的华侨，以闽南人居大多数，陈嘉庚是福建会馆的主席，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长期在他的领导控制之下。

胡文虎迁居新加坡时，正值陈嘉庚的全盛时期。此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来亚的橡胶业在经历了战后的一度冷遇之后，胶价开始口升，马来亚的橡胶业再次步入黄金时代。

胡文虎是福建人，与陈嘉庚谊属同乡，因此，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对他热诚地表示欢迎，鼓励他在新加坡开创事业，并邀他参加怡和轩俱乐部，与大家时常聚会，联络感情。

在新加坡，俱乐部比比皆是，当地华侨很喜欢组织俱乐部，有的是同乡关系，几十人相邀组织在一起；有的是身分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资本家俱乐部，或店职员俱乐部。有了俱乐部，工作之余就有个去处，既可娱乐，又能联络感情。

怡和轩俱乐部是当时著名的俱乐部，这家俱乐部的会友是以陈嘉庚为中心的一群福建籍资本家。这些人大多在下午下班之后便驱车去怡和轩，在那里饮酒、打牌，直到夜深时候才散去。胡文虎自然也常来这地方。

胡文虎生性大方豪迈，争强好胜，有时到俱乐部来赌博，下注总是相当大。赌博有输有赢，输了的往往脾气不大好，难免争争吵吵闹出些不愉快，陈嘉庚不愿看见会友们因赌博而彼此伤感情，他因此劝胡文虎不要赌得太大。胡文虎误会了陈嘉庚的意思，以为他倚仗领袖之势干涉他，心想钱是我自己的，赌大赌小关你陈嘉庚什么事！愤愤之余，第二天来俱乐部，注下得比头天更大，令旁观者咋舌。陈嘉庚看了，心下当然不快。两人自此心中结下芥蒂。

怡和轩俱乐部那时还只是租了间普通的房屋作会所，不够豪华。有一回会友欢宴杯觥交错之时，胡文虎言及须建一所富丽堂皇的建筑作为会所，才能与在座诸位的身分地位相配。陈嘉庚听了，心中不悦，冷言道：“要建豪舍，谁不知道，可钱从何而来？”

胡文虎说：“各位捐啊。”

陈嘉庚便问：“那么你能捐多少？”

胡文虎不加思索便道：“我个人乐捐 5000 元。”

捐 5000 元建俱乐部会所，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胡文虎慷慨倡捐，会友们跟着纷纷解囊，怡和轩俱乐部新会所不久就堂而皇之地落成了。捐资建所的题名牌上，捐钱最多的胡文虎当然是名列第一了。

胡文虎虽然捐钱最多，可非但未能博得陈嘉庚的认同与好感，反而使陈嘉庚对他反感更甚。陈嘉庚认为建会所这样的大事不通过协商研究，而义气用事地提出，并且胡文虎捐钱的态度又是那样咄咄逼人，胡文虎这人实在是太过气焰嚣张了。陈嘉庚与胡文虎之间无形中又多了一层隔阂。

1925年底，胶价开始下跌，由每担178元跌至90多元，陈嘉庚的企业，除了饼干厂和黄梨罐头厂尚可维持，其它全都亏损，并且制造厂又发生一起大火灾，损失惨重。随后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降临，胶价每担竟降至七八元，1元多一双的树胶鞋只卖到两角钱。陈嘉庚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可是国内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还要由他负担。

当陈嘉庚的事业由鼎盛走向式微的时候，胡文虎却气势如虹，由初试锋芒走向兴旺发达。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胡文虎的事业不但丝毫不损，反而使万金油销路大畅。胡文虎就是在这时创办了《星洲日报》，而且购置了新式的卷筒印刷机。

胡文虎此时已经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客家人的拥戴，足以与福建帮的领袖陈嘉庚抗衡。而由于一些帮闲食客从中怂恿，造谣生事，胡文虎和陈嘉庚愈来愈走向对立，在当地的社会公益及教育事业上，时常各执己见，形成陈派胡派。两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报纸，笔墨对仗，没完没了。后来，又因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扩建之事，惹出一场官司。

新加坡华侨中学是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华文学校中的最高学府，创建于民国初年，校舍由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些华侨实业家捐款兴建，校址距新加坡市区7英里，校园面积广阔。其中的大礼堂由糖王黄仲涵捐助叻币10万元，教室、实验室、员生宿舍分别由陈嘉庚与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些有钱的华侨捐助。

1928年，胡文虎被推任华侨中学董事长。由于学校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学生宿舍不够使用，该校董事会请胡文虎捐资兴建一栋学生宿舍。胡文虎身为董事长，还没有给该校捐过一分钱，现在校董事会提出来，胡文虎自然是义不容辞，便慨然允诺。胡文虎捐资8万叻币，建成一座两层楼学生宿舍，名为虎豹楼。

这华侨中学占地极广，一座座校舍和建筑依傍着山坡，周围植着许多花草树木，环境极为优美，只是偌大的一个校园，竟没有校门。胡文虎经过细致观察、反复思量，决定在学校广场的前面，东西两方，各加建一个大门。

胡文虎建立校门的意图是无可非议的，一来使学校更优美壮观，二来可区分校园内外。建立校门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就出在校门的题字上。

华侨中学前面有个广场，广场前面有一条重要的公路，不断有许多汽车驶过。胡文虎捐资兴建的两座式样相同的西式大门，就分别仁立于广场的东西两方。大门横额写着“新加坡华侨中学校”八个字；大门右柱上署着“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就是这右柱上的10个字，引起了陈嘉庚和其他人士的反对。

陈嘉庚等人一看见这10个字，认为胡文虎玩的是“混水摸鱼”的花招，路人凡经过这里，看见这10个字，肯定认为这所学校从校舍到课室，甚至大礼堂等等，统统都是虎豹兄弟捐助的，而实际上胡文虎不过花了区区几千元建筑了两个大门，如此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那还了得！

陈嘉庚等人愤慨之余，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胡文虎建华侨中学校门，没有征得董事会许可，擅自题上“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

字样，不符合手续，兹定于某月某日于某处，召集所有华侨中学赞助人来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校门的问题。启事中指责胡文虎的这种行为是“掩耳盗铃，指鹿为马”。

启事见报，轰动整个新加坡社会。这无疑是一场“龙虎斗”。陈嘉庚和胡文虎两个人都财雄势大，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拥戴者，这一场斗争谁胜谁负，实难预料。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别会议，200多人聚集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他们都是陈嘉庚的拥护者。事前经过一番联系和计划，大会如期举行。陈嘉庚自然被推为大会主席。

陈嘉庚首先作了发言，言词极为尖锐，语气极为激昂，抨击胡文虎把诸多赞助人所作的贡献据为己有的做法。接下来又有几位赞助人也慷慨陈词，不外指责胡文虎掠人之美之伎俩。每当言毕，群情激愤，掌声雷动。大会讨论的结果，是要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铲去。

大会次日，“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的字样就从华侨中学的校门上消失了。

胡文虎的气愤自不待言。胡文虎建筑校门在门柱上题上那10个字，是否有意要掠人之美、贪天之功，只有胡文虎自己心里有数，外人不得而知。但是陈嘉庚在报上刊登启事，发动赞助人大会，铲去题字，这样的做法实在过分。按照组织章程，根本就没有所谓赞助人大会规定及职权。假如陈嘉庚认为胡文虎有存心混淆之嫌，尽可与胡文虎商量，或由校董事会开会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只要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改为“此门系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即可让世人一目了然。发生这种事，实由于陈胡二人平日积怨已久，隔阂太深。

胡文虎被人不由分说铲去了校门上的题字，除了气愤，更觉面子上太难堪。为挽回面子，他决定打官司。胡文虎控告陈嘉庚损害了他的名誉，要求赔偿。

两个华侨富翁和领袖，引人注目的社会名流，对簿公堂，令世人引颈而观。开庭的日子，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陈嘉庚、胡文虎二人亲自出庭，正襟危坐。

这场官司，双方都请了著名的大律师，带着许多法典律书上堂，唇枪舌剑，过了几堂还没有结论。后来双方亲友从中劝解，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胡文虎的生意仅限于成药和房地产，陈嘉庚的战场却十分广阔，除了橡胶园、橡胶厂，以及多项轻工业制造厂以外，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他手底下的人都有兴趣去干。他们看见虎标良药能赚钱，就生产出同类型的药品，名为“钟标良药”。在推销陈嘉庚胶鞋的时候，时常免费赠送钟标良药一包。

胡文虎与陈嘉庚的竞争对抗越来越白热化，谁都知道他们在“斗法”。陈嘉庚在新加坡有他的交朋会友、呼风唤雨的基地“怡和轩俱乐部”，胡文虎就大操大办搞起了“威尔基俱乐部”，成为胡氏亲朋会聚的场所。在抗战救国筹赈热潮中，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发动华侨为抗日筹款，胡文虎则举起“南洋客属总会”的旗帜，号召华侨投入抗日捐献运动。当然，面对抗日救国的大局，这场“斗法”客观上成为了一场爱国主义的竞争。

当初，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早已是新加坡华侨界的第一号人物，胡文虎初来乍到，为什么偏偏要跟陈嘉庚作对呢？胡文虎自有一番奇怪

论：“陈嘉庚是世界知名人物，在南洋生意做得这样大，又做了许多公益事，人人认识他，敬重他。就是远在家乡，他也建树颇多，著名的集美学校、厦门大学，都是他创办的，我胡文虎不过是一个仰光商人，初来新加坡，没有许多人认识我。但是，我一来到新加坡，就敢与社会上最有名的陈嘉庚作对，我的名字便与陈嘉庚相提并论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吗？我为什么伯与陈嘉庚作对呢？他是已经出名的人物，彼此斗争，被我赢了，我的名字就在陈嘉庚之上；即使输了，也无妨，虽败犹荣，我胡文虎的名声也就传开了，这不是很划算的事吗？”

且不论胡文虎这种追逐名声的手段是否妥当，但从这一段言谈中，的确可以看出胡文虎这个人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具有一种敢打敢挤无所畏惧的雄心和魄力，正是这一点，使他得以由一个故意与陈嘉庚作对的普通老板，在若干年之后成为真正具有实力与陈嘉庚两雄对峙的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与胡文虎都已是满头华发。也许是岁月易逝，使他们对人生真谛有所顿悟，他们不再“斗法”，而是不约而同地考虑两件大事，一是海外华侨的团结，一是恢复与发展华侨的实业。

胡文虎在新复刊的《星洲日报》上撰文，呼吁华侨团结，表示希望能与陈嘉庚先生合作，一道推动和发展南洋华侨的团结运动。

《星洲日报》头天发表这篇文章，陈嘉庚的《南洋商报》次日便全文转载，以示陈嘉庚的响应之意。不久，陈嘉庚的言论也出现在胡文虎的《星洲日报》上。陈胡二人的言论，彼此在对方的报纸上刊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南洋华侨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种祥和之气笼罩着马六甲海域。

团结合作的第一件大事，是胡文虎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各地侨领、侨商座谈会。陈嘉庚派出他的女婿李光前、亲属陈六使等为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成果是组织了“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 300 亿元，在马来亚募股 100 亿元，在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等地合募 100 亿元，在福建、香港、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合募 100 亿元。胡文虎个人当场投资 10 亿元。

这一公司的经营范围，胡文虎和陈嘉庚等人商定如下：

- 一、金融：创建福建建设银行；
- 二、交通：经营航运业、铁路和公路；
- 三、矿业：开发龙岩煤矿、安溪铁矿及其他矿产；
- 四、农林水利业：兴办农场、林场和开挖水渠；
- 五、工业：兴办水泥、水电、造船、化学、织布、造纸及食品罐头业；
- 六、海产：经营渔业及盐业；
- 七、特产：经营闽茶、纸、漆、烟叶、笋干、海味、蔬菜、闽南水果、永福花卉、木棉、陶瓷品。

按照胡文虎的愿望，海外闽侨，群策群力，全力以赴，“十数年之后，吾闽必不下于今日之马来亚。夫如是，则吾子孙，与八闽子弟，无须求糊口于西方、远离乡井于重洋之外矣！”

甚为遗憾的是，这一由南洋华侨团结合作组成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被国民政府“格于法令，未便照准”而否决。但是，陈胡二人弃绝前嫌、团结合作的行动却在南洋华侨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九章 风波陡起 失马安知非福

一篇激扬文字，惹起闽侨是非，风波一闹几个月，幸亏，总经理、总编辑以及半数以上员工都是福建人。风波助《星洲日报》发行量剧增，《星对日报》打破星期天休刊惯例，特别推出《星洲日报》四大张。胡文虎不谙 ABC，为何创办英文报？

前面提到胡文虎因受陈嘉庚办《南洋商报》成功的启发，而创办了《星洲日报》。《星洲日报》是胡文虎星系报业当中的第一张报纸。由于设备较为先进，又在香港聘有专员，每日拍发新闻专电，该报从内容到形式在新加坡都可算得首屈一指了。

《星洲日报》第一年周年纪念就刊印了一部 60 万字的巨型特刊，16 开本，附有南洋各地风光和华侨要人的照片、插图，内文计有 900 页之多，介绍南洋各地的风土文物，以及一年来的国内外要闻时事，材料详实，图文并茂。特刊全部赠送给南洋各地社团和长期订阅该报的读者，深受欢迎和好评，这在南洋报业史上堪称一件破天荒的创举。

由于一周年纪念特刊极为成功，《星洲日报》第二年又出了两周年纪念特刊。

两周年特刊也是洋洋五六十万言，其中很多名家名作，如巴金、丘寂园、罗良铸、赵景深、司徒赞、顾因明、王宣文、温雄飞、张竟生等作家、社会学家都著有颇具社会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作品及言论。然而，正是这本两周年特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特刊中载有一篇题为《两年来福建军事政治述评》的万余字的长文，内容是有关当时福建的军事政治情况。该文作者潘柔仲是湖南人，时为《星洲日报》的编辑，曾在厦门《民钟报》任编辑多年，因此对福建的情况比较了解。作者的本意只是客观地叙述一些福建的现实，孰料竟会引出一场风波。

引出风波的是其中一段关于福建民俗的描述，“闽省民众习俗，亦有足批评者。甲，吾国宿重宗法，崇尚血统，每以异姓乱宗为耻，而闽省独不然，虽诗礼之家，亦养义儿假子，视若己出。非仅以承宗嗣，亦且以强宗族。虽有子多人，犹且广购螟蛉。以是人口买卖之风，为各地冠。土匪以之掠劫幼童，拐贩以之掳卖子女，离人骨肉，不可胜计，查其所以不耻异族乱宗之理，厥端有二：一则闽人夙好械斗，每以族之人丁多，以强欺弱。而生息不蕃者，恫己族之遭欺，遂不计及血统，嗣异姓以为后，且以多多为益善盖，如是则可转弱为强，而图报复矣。一则闽人多好远涉异域，以谋生计，而留妻室于故乡。妇女未有生育，寂寞无聊，每嗣义子以自慰，幼小可以承欢膝下，长大也可以协理家政，较之借助他人，计实为得也。”

《星洲日报》两周年特刊也如一周年特刊一样，完全赠送给南洋华侨社团和一些长期读者。特刊发出去不久，就有一些新加坡的闽籍侨胞暗中议论，说《两年来福建军事政治述评》一文有侮辱福建人之意，尤其是评述民俗的那一段。某些平素对胡文虎心怀不满的人，这时候便想借机生事。他们三番五次开会，派人到马来亚各地，鼓动闽籍同乡，意欲召开闽侨代表大会，正式向《星洲日报》提出交涉。

他们初步拟定了三项条件向《星洲日报》提出交涉：其一，立即革除该文作者潘柔仲在《星洲日报》的编辑职务；其二，登报声明，取消该文，尚

未发出的纪念册则应将该文撕去；其三，登报向福建人道歉。这三项条件如不答应，他们即号召华侨抵制《星洲日报》，并且进一步抵制胡文虎的永安堂虎标良药。

胡文虎本人并未读过那篇文章，这时候外面已是满城风雨，他才找来文章一读。胡文虎读过文章后，明白某些人是有意小题大作，无事生非。关于螟蛉养子之事，当时不但福建存在，全国各地也很普遍，潘柔仲言及这种普遍存在的现实，谈不上是对福建人的污辱。胡文虎本人是福建人，《星洲日报》的总经理、总编辑以及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福建人，如真有污辱福建人之意，《星洲日报》本身都断不能容。胡文虎断定那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示决不屈服。

两周年特刊的风潮起于新加坡，逐渐波及到马来亚。一些人对那篇文章不求甚解，甚至根本就没读过，只是听见风就是雨，听说《星洲日报》刊载了侮辱福建人的文章，便愤慨不已，认为《星洲日报》不可饶恕，那个潘柔仲不可饶恕。而闽侨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却自有主见，不会轻易接受挑拨。

这期间，《星洲日报》再三进行针对性的辩论和解释。好在《星洲日报》多数以上的编辑员工都是福建人，这一点比任何辩论和解释都更有说服力。

这场风波前后折腾了几个月，那些兴风作浪的人最终没能够煽动起多数闽侨更热烈的响应，原定要召开的闽侨代表大会也没能付诸实现。而胡文虎的态度又很强硬，他们原拟提出的三项条件只恐《星洲日报》不会接受，也只好作罢，免得被《星洲日报》置之不理，则更下不了台。

这场文字风波原是有人企图找《星洲日报》的岔子，好让《星洲日报》低低头，可是那些人的目的没能达到，却反而帮了《星洲日报》的忙。《星洲日报》才刚出版两年，很多人还没读过这份报纸，甚至还有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份报纸，现在这场风波一闹几个月，无异于给《星洲日报》做了一场广泛的宣传，《星洲日报》一时间在新加坡、马来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发行量陡然增加了许多。

《星洲日报》创刊于 1929 年，恰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突然爆发的那一年。如果是做别的生意，肯定是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次危机几乎是无处不在，尤其是主要靠国际贸易生存的新加坡、马来亚，更是在劫难逃，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一下子濒临破产的边缘。但是办报纸却可以说是适逢良机，由于经济危机深重，人们密切关注与自己前途、命运和生计紧密相关的时局的变迁、动荡，报纸不再单单是少数人的精神食粮，而成为大众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

但《星洲日报》能在初期的六七年中，一跃而执新加坡、马来亚各报之牛耳，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选为海内外十大华文报纸之一，绝非偶然侥幸所致。《星洲日报》对南洋社会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当初，新加坡、马来亚逢星期天是没有报纸可看的，因为南洋各地的各种报纸是实行星期日休刊的。

1931 年，《星洲日报》率先打破休刊惯例，星期天特别推出《星期刊》四大张，内容除专电要闻外，另有每周评论、经济、文艺、体育等周刊，以及南洋研究、国际问题、妇女界、新闻图片等特辑，内容相当丰富。此举乃华文报中之创举。此后，南洋其他各报也就跟着在星期天出报纸。

新加坡的日报，不来是白天编印，中午前后发行。《星洲日报》却改为夜间工作，早晨出版发行。不久，《星洲日报》又改为分早晚两次出版，早

版于早晨 6 时发行，晚报于午后 6 时发行。这些改进对报纸业的更有效运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时，没想到它日后竟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这之后，胡文虎办了一连串星系报纸。胡文虎对于办报纸如此热心，令人们感到诧异。特别是在战后，万金油的市场比战前损折了一半以上，胡文虎却还要拼命地办报，这更是令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这个一辈子都做着虎标良药生意的胡老先生，难道竟要在风烛残年之际改行，而从必定是赔钱货的新闻报纸中去谋利？

当然不是，胡文虎办报纸向来只为推销他的虎标良药。报纸虽然没给胡文虎真正赚过钱，但带给他的好处却不是钱可以计算的。胡文虎在工商企业和社会事业上起先并无什么大的建树，但不到 10 年间，就能够与创建过厦门大学的橡胶大王、华侨领袖陈嘉庚分庭抗礼，由寂寂无名而成为南洋华侨中的传奇人物，这种成就是报纸而非万金油带给他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令人疑惑的，不懂英文的胡文虎为什么要办英文报？抗战胜利后，胡文虎在新加坡和香港各创办了一张英文《虎报》。

胡文虎办英文报的原因，一是由于他自尊心极强。胡文虎希望自己的言论和有关自己的新闻，能够得到不仅仅是国内人的注意，所以他对社会有什么意见，除在中文报纸刊登之外，还请人译成英文，送到西报去刊登；可是外国人对胡文虎的言论和消息，有时不加重视，不予发表，胡文虎感到屈辱，所以就要自己办英文报。而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权不久易主，万金油因此丧失了国内这个巨大的市场，胡文虎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办英文报是为了开拓新市场。

胡文虎办英文报也许还有家族的原因。胡文虎本人虽然不谙 ABC，但他的弟弟胡文豹却是受的英文教育，而他们的下一代则几乎是全盘西化的。

第十章 力倡体育 足球远征世界

做运动大会会长，做运动大会总领队，给运动员颁奖，这些都是抛头露面很引公众注目的事，胡文虎当然乐意，五次运动大会四次由他主持、捐助。星岛足球队踢败球王李惠堂的华南足球队，又踢赢声名显赫的东方足球队，远征世界，门票抢手，胡好净赚40万元。“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胡文虎听了这话，比赚那几十万元更开心。

胡文虎对资助体育事业非常有兴趣。他不遗余力把钱投到体育界，当然是有他的小算盘的，那就是贯串于他所有行动中的无处不在的一种广告意识。

做运动大会的会长，做参加运动大会的总领队，给运动员颁奖，这些都是抛头露面很引公众注目的事。人们对于热心体育运动的头面人物总是怀着钦佩之情、胡文虎自然乐意通过体育这个大舞台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频频看见他这万金油大王，自然就想到万金油，想到虎标良药，胡文虎很善于捕捉和利用这种广告效应。

然而，毋庸置疑，胡文虎热心体育事业，还来自他的爱国赤诚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胡文虎多次在《星洲日报》发表文章，弘扬“体育之功至为伟大”，可以“锻炼国民体格，发扬民族精神”，使人“奋发图强，挽救萎靡意志”。他认为体育运动乃是洗却“东亚病夫”之耻的强国之道。

胡文虎亲力亲为，捐资兴建体育设施，主持各地的华人运动大会，对优胜运动者给予重奖。他担任香港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1929年9月，胡文虎到香港主持中华体育运动大会，回到新加坡后，他以兴奋的心情写下《提倡组织新加坡体育会之刍议》，刊发于《星洲日报》上。文章写道：“文虎此次香港归来，满怀感想。参加中华体育会运动大会时，所见选手，均体魄健全，精神焕发，强国之道，或即在此，体育之功，盖至伟大者……”

在胡文虎的倡导下，《星洲日报》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体育事业的发展 and 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各地华侨，对于体育运动还不甚注意，除有足球、网球、游泳等少数几项运动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项目。

1930年，《星洲日报》发起星洲华侨排球竞赛联合会。该竞赛分男女两组，男子队13支，女子队5支，胡文虎设立两大银盾，分别奖给男女冠军。这次竞赛历时长达两个月之久，健儿们奋力拼杀，比赛热闹非凡，激发了许多体育爱好者的兴趣和热情。胡文虎出席了开幕式；比赛结束后，他设筵欢宴各队健儿。《星洲日报》为此特地编印了《华排特刊》，报道描述比赛盛况。

此后，《星洲日报》发起举行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大会拟于1930年冬举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华侨运动大会，《星洲日报》一经发起，新加坡各学校社团便积极响应，许多热心人士也自愿投入筹备活动之中。

首届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隆重热烈，与会人数众多，比赛项目丰富，整个新加坡都为之增添了一种节日般的热闹气氛。胡文虎身为大会会长，负担大会的经费和全部奖品。

新加坡华侨运动大会取得成功，《星洲日报》进一步发动举行马来亚华

侨运动大会。那时候，新加坡还只是包括在马来亚中的一个地区。

马来亚各地华侨领袖云集新加坡，讨论商议大会的各项事宜。在长达半年时间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第一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于1931年4月在新加坡正式拉开了帷幕，胡文虎仍然是大会会长，大会的经费一半由他承担。5天的会期，马来亚各地侨领率领自己的运动健儿奔赴新加坡一试身手，各显神威。运动大会盛况空前。

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自此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举行之前，各地先自行举行运动会，比赛中的优胜选手取得参加大会的资格。第二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于1933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第三届大会于1935年8月在槟榔屿举行，都取得了良好的竞技成绩和社会影响。

1935年10月，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马来亚华侨运动会根据刚刚结束的第三届运动大会的比赛成绩，选拔出男女选手150多人，作为马来亚华侨代表队回国参加比赛。这次的总领队是胡文虎，整个代表队包括选手、教练、职员共200余人，所有比赛项目均有选手参加，服装整齐、阵容浩荡的马来亚华侨队在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胡文虎就是在这次回国时，把他向美国福特汽车厂定制的虎头型汽车开进了大上海。那虎头车张开血盆大口，车灯如电火喷射的两眼，喇叭发出虎吼般的鸣叫，一向见惯世面的上海人这时候都震住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观看。上海的报纸报道说，老虎车开进上海滩，上海人变成乡巴佬。胡文虎不仅大出风头，而且又美美地做了一回广告。

在上海期间，胡文虎与上海大亨杜月笙相识相交，在双方朋友的撮合下，举行了结拜把兄弟的仪式。择定良辰吉日，胡文虎和杜月笙携双方友好十几人，一道奔赴杜月笙在浦东的家乡。在杜氏家祠祖宗牌位前，胡文虎供香献花，行三鞠躬礼，再与杜月笙相对三鞠躬，然后交换兰谱，称兄道弟。胡文虎大杜月笙两岁，以兄长居。礼毕，众人在祠中设筵欢庆。

此次参加全国运动会，马来亚华侨代表队在比赛中成绩不俗，其中足球队表现尤为出色。马来亚华侨队奋力拼搏，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是与香港队争夺冠亚军。香港队当时由球王李惠堂任队长。这场球赛观众多达10万人，战情激烈，扣人心弦。马来亚华侨队先破门进球，但后来失利，屈居亚军，虽败犹荣。

1937年这年，胡文虎赞助体育团体，主持了多起比赛。在这种体育风气日益浓厚的情况下，胡文虎提出组织星洲华侨体育总会的建议，对体育总会的组织、任务、活动范围、设备等具体事项都作了详细阐述和拟定。在胡文虎的大力倡导下，马来亚各地的华侨体育团体蓬勃兴起，势如雨后春笋。

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间，新加坡一共举办过5次华侨体育运动会，其中4次都是由胡文虎主持，经费和奖品也是由胡文虎捐资。与此同时，马来亚举办的4次运动大会，也由胡文虎任会长并捐资。

为沟通马来亚体育界与海内外体育界的往来，使之相互交流，胡文虎还提供一切费用赞助，邀请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体育代表团体到新加坡及马来亚各地比赛。应邀参赛的体育健儿无不盛赞胡文虎先生的“竭诚接待”，“使人有宾至如归之乐”。

而说到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的事迹，那实在是令华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的壮举。

胡文虎有个儿子叫胡好，年方18，即担任香港《星岛日报》社社长，胡

好酷爱足球运动，因而他在任期间，着意搜罗了一些一流的足球名将，安排在报社工作，不久就成立了星岛足球队。

星岛足球队身手不凡，在香港甲级足球赛中，踢败当时球王李惠堂的华南足球队，又踢赢当时声名显赫的东方足球队，从此威震香港，令世人瞩目。

40年代，胡文虎曾拨款60万元给胡好，支持星岛足球队远征世界各地，访问比赛，远征队由香港精英华人球员组成，随队的17员虎将均是当时香港球迷偶像，如“神腿”冯景禅、“佛爷”黎兆荣、“猴子”侯榕生、“龙驹”宋灵圣、“拼命三郎”张金海、“左脚王”许竟成、“钢门”余耀德。

星岛远征队在香港出发，先在东南亚各地作巡回比赛。在菲律宾六战六胜，在马来亚四战两胜一和一败，在泰国五战五胜，在缅甸四战四胜，战果辉煌，使香港足球在东南亚赢得“足球王国”的称誉。由于实力雄厚、球艺高超，星岛足球队一路凯歌，门票收入非常可观。数月远征，转战世界五大洲，捷报频传，胡好携百万元而归。胡好奉还父亲胡文虎给的60万元，还净赚40万元。

同时，由于星岛足球队的远征，使得《星岛日报》也随之名扬世界，销路上升一时间，报馆内外一片欣欣向荣，昌盛祥和的气氛。

外国记者评论道，一个报馆竟拥有如此强大的足球队，敢向国际劲旅挑战，真是了不起，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

胡文虎听了这话，比赚那几十万块钱还要高兴。

胡文虎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有一次，他得知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公园门口，挂有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十分愤怒。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中国人出口气。胡文虎在巴西班让开设一个游泳池，给它取名为“华人池”，在游泳池门口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写“只准华人入内游泳”，拒绝洋人入内。众侨胞见状，无不拍手称快。

胡好逝世后，他一手创建的足球队依然秉承他的遗志，雄风不减。

1966年，星岛又组队远征澳洲和新西兰。这次远征共作11场比赛，战果是五胜六和，保持不败记录。

1971年，星岛足球队又远征美国、加拿大。这次远征的球员多属体力充沛的青少年，攻守快捷灵活，故在球场上有“喷射机”之称誉。星岛足球队在美国、加拿大大获全胜，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星岛足球队严然是世界各地华侨心目中的偶像球队。

为纪念胡好创办星岛体育会和对香港足球运动所作的贡献，香港足球总会接受星岛公司董事长的建议，决定自1988—1989年度秋季开始，举办胡好杯足球慈善赛，球赛的全部收入拨交足球总会作为慈善用途，球赛费用则由星岛机构赞助。胡好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的精神在香港足球圈和世界华侨心中将永存。

第十一章 献策转款 朋友一计暴富

胡文虎生病去印尼开刀，李社松献计怂恿胡文豹把兄弟俩在银行的存款全部转到胡文豹个人户头上。胡文虎雷霆大怒，李社松轻取 50 万元。香港虎豹别墅大门上的“虎豹别墅”四字，“豹”字陡然坠下地来，不祥之兆，果然从缅甸传来噩耗。

前面说到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情同手足，堪称兄弟友爱的典范，这虎豹兄弟自父亲去世后，接过父亲在仰光的永安堂药材店，同心同德，共同经营，使永安堂事业日益发达兴旺；两兄弟又娶了两姐妹、亲上加亲，两家人如一家人，让世人羡慕称道。这些都没错，但据知情人传，这兄弟俩到中年之后，由于胡文豹一时糊涂，听信别人摆布，铸成大错，使兄弟情谊陡然破裂，险致反目为仇。

事情是这样的。

1937 年，胡文虎得了一种病，遍请新加坡的中西名医诊治，都不见转好，心里很发愁。听人介绍说印尼有个医生对这种病有办法，一开刀就好，胡文虎便想去印尼试试看。谁知他这一去，就出了个大问题。

问题出自一个第三者名叫李社松的人身上。

李社松也是个华侨，与虎豹兄弟从小相识，经常在一起玩耍，后来三个人结为拜把兄弟。胡文虎是个很重义气的人，又觉得李社松自小一起长大，为人忠厚老实，可以依赖，所以对他极为信任和器重，视作自家兄弟般对待。

上海设立虎标永安堂分行之初，胡文虎委任李社松为第一任经理。李社松在缅甸长大，只识得些英文，对中文一窍不通。他到上海后，人地生疏，言语不通，而对于推销药品，又毫无经验，据说他每天就只有在楼上打坐的份儿，根本就不敢到楼下的铺面上去。这样，他生意做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李社松在上海不能适应，胡文虎又调他回新加坡去，由于在当时新加坡那种特殊的华侨社会中，胡文虎用人向来是两项原则并举，一是用人唯才，一是围人唯亲，即无才不用，不亲不用。李社松作为亲信，不久又被胡文虎委任为新加坡虎标永安堂总行的经理，永安堂总行的钱财出入尽由他掌管。李社松与虎豹兄弟同住虎豹别墅，饮食与共，同车出入，真是亲如兄弟。

李社松是虎豹兄弟自小一起玩耍的朋友，年龄自然也与虎豹兄弟相仿，但李社松却尚未婚娶，别人跟他提及婚姻大事时，他总是一口回绝，说要抱定独身，一辈子不打算结婚。胡文虎听见，很感慨他说：“李社松这人何等老实，不嫖不赌，连老婆都不要，一天到晚只给永安堂做事，我到哪里找这样好的人啊，这是天赐给我的啊！”

其实，李社松暗地里有一位与他相好的女人，这女人是他的侄女，多年来对他体贴关怀，早已超越叔侄关系。

胡文虎怪病缠身，无医能治，下决心要到印尼万隆去医治。万隆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医院设备也很现代化，胡文虎打算开刀后在那里疗养一阵。

胡文虎离开新加坡第二天，李社松就对胡文豹说：“文虎年纪到了，这次去印尼开刀危险相当大，万一他开刀死去，你们俩在银行里存的钱未分彼此，就成了他的遗产。你们俩存这么多钱，抽起遗产税来就不得了啦！你最好把银行里的钱全部转到你胡文豹的户头上，这样便成了你胡文豹的私有财产，就算文虎有个好歹，也不必抽遗产税了。”

胡文豹觉得李社松言之有理，把银行里的钱暂时先转到自己名下，万一兄长开刀不利，胡氏家族的财产可以得到保全，不致遭抽遗产税而折损，当然他会把兄长的那一份家产如数分给侄辈们；如果兄长开刀顺利，病除而归，他只要把钱转回到他们兄弟俩的共同的户头上便是了。

胡文豹如此一想，只觉此举有利而无害，便对李社松言听计从，立即办手续，将他们兄弟俩在银行里的所有存款全部转到自己名下。也许是为了答谢李社松的殷勤献策，胡文豹在银行转款时，还特拨了50万元到李社松的户头上，李社松轻而易举便获得50万元存款。

却说胡文虎到了印尼，在医院一番检查，医生认为他无须开刀。胡文虎在印尼游玩10多日，便打道回新加坡。

兄长突然回来，胡文豹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手足无措，他把转移存款的事说出，不容他解释，胡文虎已气得面无人色。

胡文虎冲着胡文豹拍案骂道：“岂有此理！我人还未死，你就敢将所有的钱归到你名下去，你真做得出啊！你有几个阿嫂和侄子，你分文都不给他们，倒是那个李社松，你凭什么给他50万！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说说这都是为什么！”

兄弟两个从未这样翻过脸，胡文豹一时吓坏了，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内心中本来就有些惧怕兄长，这时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只怕自己浑身长嘴都讲不清了，他好后悔听了李社松的活！他又怕，又悔，又恨自己糊涂，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竟像个孩子似的哭出声来。在胡文虎声色俱厉的追问下，他终于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出。

胡文虎一听竟然是李社松的计谋，气得火冒三丈。他一向认为李社松为人忠厚老实，值得信赖，他也从来待李社松不薄，委以重任，亲如兄弟，谁想李社松竟然是这样的阴险奸诈，偏偏胡文豹还要奖励他50万，胡文虎恨得直咬牙。

胡文虎立即就炒了李社松鱿鱼，把他逐出虎豹别墅，与他一刀两断。

李社松被赶出永安堂后，一度曾制造与万金油同类型的药品，想跟胡文虎抢生意，但毕竟资金不足，没能成气候。

炒李社松鱿鱼容易，但虎豹兄弟天衣无缝的手足之情要恢复如初却很难。两兄弟在办公室本来坐一个长型办公台，现在却再不见他们坐一起，胡文虎看见弟弟走进办公室，他便掉头就走，一句话不想同弟弟说，胡文虎逢人便说弟弟傻，不义，没良心，胡文豹有口难辩，只有暗自伤心。

胡文豹后来患了局部瘫痪之症，右脚麻痹不仁，走起路来，步履艰难，要靠人扶持。胡文豹满世界求医，到过德国、美国、日本，看过西医、中医，均不得治疗，医生诊断他脑神经局部中毒，致使无法指挥右脚的行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发生战事。胡文豹其时在新加坡，每听到敌机在空中盘桓，他都惊得浑身颤抖，无奈他腿脚不灵，想钻防空洞却跑不动。后来他在城郊的山谷里租了一幢别墅，在地下室里铺一张床，床的方架子上铺了六七张棉被褥，以防炸弹碎片溅落。他整天卧于床上，听见警报就缩作一团。“听天由命罢。”他对人说。

有一次，胡文豹一位很有身分地位的朋友去探望他，看到他处境如此难堪，极为同情，遂替他向当局有关部门说情，请求准许胡文豹出境。当时新加坡当局有限制居民出境的禁令，胡文豹因为确实有病，走警报都走不动，加上这位朋友的身分地位，说话挺管用，当局遂准予他的申请，一家人办了

手续，前往缅甸。

缅甸是胡文豹生长的地方，其时尚未遭日军的炮火侵袭。可是胡文豹一家到缅甸不久，马来亚和新加坡便相继沦陷，敌机又盘桓至缅甸的上空。胡文豹便又由仰光逃到乡下去。这期间，胡文豹在昆明的亲友曾派人到缅甸来接他回国内居住，胡文豹犹豫再三，终于没能成行。之后，缅甸全境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胡文豹虽避于僻隅，却终是寝食难安，郁郁寡欢，终于病逝于乡下。临终之前，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胡清才、胡清德都随侍在侧。

胡文豹临终之前非常想念胡文虎。胡文豹留下遗言，希望兄长对他尚年幼的两个儿子予以照顾，他名下的钱，全部由兄长安排，用来做善事也好，用来做其他事业也好。

胡文虎在香港得到弟弟去世的噩耗，万分悲恸。他的《悼吾弟文豹》催人泪下。

“文虎旷观今世，每有兄弟，不知和睦。煮豆燃箕，或亦不惜。文虎每一闻之，辄为之怅惘终日。夫人生最难得者，厥为兄弟。由幼而长，由长而老，相依相慰，岁月至长。以相处最久、相依最深之兄弟，岂可略因细故，而祸起萧墙乎？且兄弟之间，情关手足，允宜互爱互让，永睦永和，庶上无负父母之所生，下亦足示儿女之榜样。今则文虎已无弟矣，虽欲亲之，虽欲爱之，又将何以达之那？呜呼！泉路茫茫，再见何日？人天渺渺，携手无期。读东坡‘与君世世为兄弟，愿结来生未了因’句不禁泣然，而亦欲持之以赠。愿吾弟文豹地下有知，怜吾寂寞，魂兮归来，有以慰我也！”

这当中有一件奇事顺便一提。当香港沦陷的时候，胡文虎是在香港。他起先被日军软禁于一个酒店之中。香港虎豹别墅的正门上方有四个大字：“虎豹别墅”。这四个大字金光闪闪，是木刻而成，敷以金箔，每个字两尺见方，牢牢嵌钉于门额壁间。有一天，这四个字当中的“豹”字忽然坠下地来，人人都觉诧异，因为这四个字钉得很牢，就算有意要取下来也不容易，何以无人动它，它竟自己从门额上掉下来呢？没过多久，一封从缅甸辗转而来的家信递到胡文虎手上，告知胡文豹已经辞世，胡文虎叫人一查，胡文豹病逝之日，正是那个“豹”字堕地之时。这样奇巧的事真让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

胡文虎听说了弟弟临终前的遗言后，心中更加伤感和感动，他知道弟弟对他这个兄长始终是信赖和尊敬的，过去由于李社松策划转款一事，使他误认为文豹自私不义，对他这兄长有二心，现在他明白自己是误解了文豹，他后悔自己跟文豹发那么大脾气，还一度冷淡了手足之情。

人死不能复生，胡文虎只能用好好履行文豹的遗言，尽心照顾文豹的孩子，来表达自己的歉意和对兄弟的挚爱。胡文虎把侄子胡清才送到美国去留学，学成之后，让他在新加坡永安堂总行帮理业务，不久即升他为该行总经理。胡文虎在新加坡发起创设崇侨银行，又介绍文豹的女婿李志城任总经理之职。太平洋战事结束之后，胡文虎捐过不少钱做善事，其中有几笔是用胡文豹遗产捐出的，用以纪念胡文豹。

第十二章 八年抗战 捐款捐物最巨

英国学者说他为抗日贡献的钱财“是一个天文数字”。去官邸会见蒋介石，上前就拍蒋介石肩膀，蒋介石一愣，侍卫们面面相觑。胡文虎却满不在乎：“怕什么，我是见官高一级的。”看望伤兵，愧无礼物，送每人法币5元。任常务委员，登高而呼，认购救国公债，20万元，30万元，再来250万元。

香凝的救护队所需。

1941年2月21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胡文虎捐献国币250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6万筒纱布、9000磅药棉、86捆绒布、5大桶金鸡纳霜、300万包虎标良药和4辆救护车，运往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海内外有口皆碑，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是华人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位。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曾颁给胡文虎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也曾颁给胡文虎海陆空军一等褒状。

就是在这次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会见了胡文虎。

胡文虎与蒋介石在1931年就有过一次会见，那是在南京，蒋介石设宴款待他，并照相留念。当时，蒋介石夸奖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的精神，并表示希望他能资助建设一座大规模的医院，胡文虎慨然答应，问需要多少钱，蒋介石说已经预算过了，要37.8万元；胡文虎说愿意全部负担。胡文虎后来捐赠了40万元建这座大医院。那次蒋介石与他握手的照片，胡文虎把它冲印放大了几十张，在每个永安堂分行和虎标良药店挂上。当时，社会上常有人跑到永安堂来敲竹杠，这张照片很能够吓唬一些人。胡文虎开心他说：“这张照片是用来吓鬼的！”

而这次，胡文虎飞抵重庆，稍事休息之后，便由《星洲日报》经理林霭民，重庆永安堂经理胡万里陪同，乘车至上清寺曾家岩官邸拜见蒋介石。

胡文虎是个生意人，不惯于官场应酬，也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于达官贵人，他既有以能与他们在一起哪怕是合张影也引以为荣的一面，又有轻蔑他们的一面，心想，我又不想当官，香凝的救护队所需。

1941年2月21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胡文虎捐献国币250万元，作为战伤救济款和认购抗日公债，资助政府兴建抗战残废军人疗养院。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同时他还捐赠6万筒纱布、9000磅药棉、86捆绒布、5大桶金鸡纳霜300万包虎标良药和4辆救护车，运往抗日前线作为战场急救伤员之用。

海内外有口皆碑，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是华人捐资献物最多的一位。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曾颁给胡文虎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也曾颁给胡文虎海陆空军一等褒状。

就是在这次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会见了胡文虎。

胡文虎与蒋介石在1931年就有过一次会见，那是在南京，蒋介石设宴款待他，并照相留念。当时，蒋介石夸奖胡文虎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的精神，并表示希望他能资助建设一座大规模的医院，胡文虎慨然答应，问需要多少钱，蒋介石说已经预算过了，要37.8万元。胡文虎说愿意全部负担。胡文虎后来捐赠了40万元建这座大医院。那次蒋介石与他握手的照片，胡文虎把

它冲印放大了几十张，在每个永安堂分行和虎标良药店挂上。当时，社会上常有人跑到永安堂来敲竹杠，这张照片很能够吓唬一些人。胡文虎开心他说：“这张照片是用来吓鬼的！”

而这次，胡文虎飞抵重庆，稍事休息之后，便由《星洲日报》经理林霭民，重庆永安堂经理胡万里陪同，乘车至上清寺曾家岩官邸拜见蒋介石。

胡文虎是个生意人，不惯于官场应酬，也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于达官贵人，他既有以能与他们在一起哪白是合张影也引以为荣的一面，又有轻蔑他们的一面，心想，我又不想当官，何必巴结你们。因此，他见了那些人难免就要故意地作出一种潇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见官高一级的。”

所以，当蒋介石走进会客厅时，胡文虎全然没把他当蒋委员长对待，而是像见了老朋友一般地迎上前去，拍了拍蒋介石的肩膀，如此礼节性的会晤，胡文虎竟然这样随便，蒋介石为之一愣，连侍卫们都面面相觑。但蒋介石还是笑了笑，示意胡文虎在沙发上坐下。会谈结束后，离开那气氛森然的官邸，回到嘉陵新村寓所，胡万里还在担心胡文虎对蒋委员长的动作过于随便，有些失礼。胡文虎却爽朗地笑道：“怕什么，我是见官高一级的。”

也就是这一次在重庆期间，胡文虎参加了伤兵之友同乐大会。

胡文虎穿着皮大衣、戴着绒线便帽走进会场，60多岁的人，身材壮健，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像他的名字一样虎虎有生气。当《星洲日报》经理林霭民代表他发言的时候，他起立脱帽，向全场军人致敬。胡文虎说，华侨在海外地位的提高，全赖祖国抗战的将士。由于他这次仓促从海外赶回祖国开会，没能备带礼物，便当场每人送法币5元，并发给1070元。在场伤兵非常感动，伤兵代表将伤兵之友徽章佩戴在胡文虎的皮大衣上，表示要“尽最后一滴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国民政府海外部为胡文虎的到来，在国泰大戏院举行欢迎大会。大会气氛热烈而隆重，海外部部长致欢迎辞，胡文虎在会上发言道：“承各界热烈欢迎，愧不敢当。抗战4年，吾则愈战愈强，敌泥足越陷越深，皆系铁一般事实。胜利在望，光明在即，海外侨胞快慰兴奋，不可言喻。当今国难当头，惟如何治疗因忠勇抗战而受伤之荣誉军人，如何救济抗战将士遗孤，如何安慰流离受难同胞，如何救济渝市受空袭受难同胞，以及如何保育难童，皆为当务之急。本人谨愿献呈国币200万元，请政府以30万元救济伤残将士，30万元教养抗战将士遗孤，30万元在重庆建筑平民住宅区，免费同空袭被难同胞住宿，10万元救济流离难民，100万元保舅难童（内70万元捐助战时儿童保育会，30万元捐助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保育难童用）。杯水车薪，聊表寸心而已。”

胡文虎言毕，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胡文虎的爱国义举，令人振奋和鼓舞。

早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新加坡筹赈会，之后扩建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为祖国抗战筹款募捐，胡文虎与陈嘉庚有私人交谊，没有加入“南洋总”，但他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大型客属团体——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会长，在南洋客属总会所属的53个分会中，掀起一股抗日筹赈热潮，并以星系报业为阵地，为抗战救国摇旗呐喊，击鼓助威。

星系报业在这一时期以突出版面，大力提倡认购救国公债。由于星系报业的宣传鼓动，从“七·七事变”至1938年底，南洋各地认购救国公债1300

万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胡文虎：“情没爱国，迥异寻常。”予以嘉奖。

星系报业还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爱国青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胡文虎支持和资助报社，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内地抗日前线，仅香港大学就有学生百余人。

这年9月，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特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以作非常时期的开支。为此特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由宋子文、陈立夫分别任会长、副会长，常务委员除宋庆龄、孙科外，还有胡文虎、李清泉等26人，领导海内外劝募工作。

胡文虎带头认购20万元，接着又再认购30万元。

宋子文会长致电嘉奖，并提出：“南洋侨胞素具爱国热情，兄系总会常务委员，登高一呼，定更踊跃认购，至盼热烈推进，为叩。”

胡文虎不负期望，在星系各报频频发表文章，号召华侨团结一心，共赴国难，“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胡文虎为表示精忠报国之心，再一次认购救国公债250万元。

胡文虎在给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的信中写道：“……强邻压境，国势险危，……文虎远寄南邦，责不敢忽，除前已购救国公债20万元外，兹愿再认购30万元，聊尽国民天职。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

胡文虎的信在《星洲日报》刊发出来，引起海内外轰动，人们深为他爱国抗日的慷慨热情和赤子之心所感奋。胡文虎的言行无疑是最具感召力和鼓舞性的抗战宣传。

第十三章 大红大紫 战争带来横财

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的前后方除了缺乏武器弹药、最缺乏的是药品，万金油就在此时成为硬通货和走私品。胡文虎仍然不放松产品宣传，上海报纸上一函一文，既骂了人又做了广告。唯利是图，但赚了钱还是汇回国内，存进国家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胡文虎已经是著名的“万金油大王”。但是按照当时新加坡、马来亚的水准，他的经济实力尚排不进前10名。南洋一带地大物博，经济繁荣，华侨资本家多如牛毛，藏龙卧虎者大有人在，家喻户晓的社会名流不见得名副其实，名不见经传者也许恰是真富甲。永安堂在战前无疑是发了财，但胡文虎毕竟只有一个永安堂，毕竟只经营虎标良药，可以肯定这财是发得有限的。

胡文虎发得大红大紫是在8年抗战时期，他真是发的战争财。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前后方除了缺乏武器弹药，最缺乏的是药品。即使是日本和日本占领区也是如此，因为日本的化学工业和制药厂都在忙于制造军需品。

虎标良药便在这个时候行销于整个西太平洋区域以及印度洋，包括中国、东南亚和印度这三个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这场战争，使得地球上半数以上的人都在用万金油和虎标良药，人们缺医少药、而虎标良药廉价，方便，适用面广，这便注定了胡文虎要大发特发。在8年抗战期间，万金油成为中国大后方最走俏的大众药品，也是金华一带中日两军对峙的前线大宗走私货品之一。永安堂实现了第一次大战之后的第二次飞跃。

永安堂的第一次飞跃也是由于战争，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由于投入一切尽可能投入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由于时世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人们患了病得不到医疗，有钱难买药，有药无钱买，价格便宜、服用简便的虎标良药就这样被时势推向了广阔的市场。

永安堂的这第二次飞跃远非第一次飞跃可以比拟，它给胡文虎带来的钱财，其数目之多难以估计。这时候的胡文虎真如猛虎下山，报馆一间接一间开；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处修造自行设计的万金油花园和虎豹别墅；他的抗战捐款是“天文数字”。

战争使胡文虎发了横财，即使在日本占领香港和新加坡之后，万金油的制造也从没有停止过。并且胡文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虎标良药的宣传，每有时机，便迅即抓住。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在上海，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罢课、游行、宣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上海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不但不予理睬、支持，反斥骂青年学生：“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而在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又大力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此转移人民的视线，掩盖自己对抗战的消极态度。胡文虎对此深为不满，电示上海永安堂分行经理胡桂庚，利用做广告的机会给予讽刺，同时达到宣传虎标良药的目的。

时隔数日，上海一些报纸上刊出了两则极为醒目的广告，一则题为《放

屁，放屁真正是有此理》，全文是一个电函，是河南省某地一用户发给永安堂的，内容是：该用户某月某日突然肚子绞痛，吃了多种药，都不见好，后来服了永安堂制的万金油，少顷，放了几个大屁，就舒坦了。特此致函，表示感谢。

另一则广告题为《提倡新生活，必须揩油》，是一篇短文，内容大意是：提倡新生活运动，希望大家时时揩点万金油，因为万金油可以提神醒脑，医治百病，保你身体健康，精神焕发。

人们看了这两则广告，只觉开心解气，而吴稚晖之流虽明知遭到了嘲笑和讥讽，却又无从驳击，只得忍气吞声。

日本仁丹一向占据四川各地的市场，使得虎标成药难以插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前所未有地高涨，胡文虎明白打败日本仁丹的时机来到了。经过一番周密策划，永安堂重庆分行组织了5个宣传大队，排练出许多表现抗日主题的小话剧和小歌舞，深入城乡山区宣传演出。一时间，巴山蜀水到处流传着宣传队员们传播的顺口溜：“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由于抓住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又采取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宣传深入人心，虎标成药很快畅销四川城乡，取代了日本的仁丹。

在香港沦陷时期，虎标永安堂汇往中国内地的国币多达3000万元。这些钱都是卖万金油得来的。卖万金油怎么会赚这么多的钱呢？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就开始禁用港币和国币，市面上准许通用的是日军当局发的一种军票，叫做“丹”。首次公布的官方价格，一“丹”军票相当两元港币。时隔不久，又公布了一次官方价格，一“丹”军票相当4元港币，港币大大贬值。而在黑市交易上，港币更低于1比4这个比值。

当时港币有大钞小钞之分，大钞面值为100元、500元，小钞面值为1元、5元，由于大钞难以找赎，使用不便，人们普遍喜欢使用小钞，因此小钞的实际价值要比大钞高得多。差额最大时，小钞和大钞的比值达到1比5，即1元小钞抵5元大钞。按照新公布的官方价格，一个“丹”即值港币大钞20元。而国币的价值更是每况愈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币与港币大钞的比值为4比1，国币与军票的比值为80比1，即1元港币大钞值4元国币，而80元国币仅值1“丹”。

由于港币和国币贬值厉害，人们对港币和国币没有信心，有点余钱也不敢存，还是买成实物比较放心。那么买什么实物呢？万金油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实物。在当时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万金油还能在市场上见到；万金油可以长时期收藏；万金油要脱手时，也很容易抛出去。因此，万金油在这种特殊景况下，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药品，而成为人们争相购买、囤积保值的实物了。

起初，香港刚刚沦陷时，永安堂的万金油存货还很多，但很快就全部批发出去了，市场上供不应求。胡文虎赶紧招兵买马，扩大生产。连胡文虎自己都没想到，在外侮临头、百业凋敝之际，独独永安堂竟能够这样格外火爆起来。

万金油的发售价格是由日军所限制，不得随意提价的。但在黑市上，由于人们的大量需求，价格却一天一个样地直线上升，常常是早上的价格到晚上就涨了。起初，每打万金油约值军票四五“丹”，后来竟涨到每打值军票二三十“丹”，相当港币约500元，相当国币约2000元。

当时万金油虽说是在香港抢购成风，但主要却还是流入内地。因为国币贬值，人们也争相购买万金油作为存货。香港人买了万金油转手倒卖给内地人，从中渔利。万金油一手转一手，包装纸盒都弄得又脏又破了，还在人们手上倒来倒去。

胡文虎为便利内地客商，在韶关等地的银行开设户头，一些内地客商到香港去采购万金油时，只需把现金存入韶关等处银行胡文虎的户头上，凭银行开出的存款收条到香港永安堂就可以提货。这一着大受内地客商欢迎，胡文虎的生意从此做得更欢。

胡文虎作为一个生意人，自然是要唯利是图的，但在爱国和民族气节这一点上却是毫不含糊，他卖万金油得来的钱，总是千方百计汇到国内，存在国家银行里。据计，他抗战时期存入国内银行的国币，总计达 3000 多万元。

第十四章 巧服倭寇 故做亏本生意

胡文虎直指时弊，却又叮嘱星系报业人员：“蒋介石称我为朋友的，请我吃过饭，照过相，我的报纸骂他不好，不够朋友。蒋介石不好骂，其他人可以骂。”日本海军的南进公司限定永安堂只许每人每次买一盒药，来了个日本宪兵，却偏要买十打万金油，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却是胡文虎导的一出戏。香港闹粮荒，胡文虎做大米生意，为何却吃了亏？

1941年12月8日，灯红酒绿的香港之夜霓虹闪烁，突然，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惊呆了正待入梦的城市：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了！人们遭此突然袭击，一时手足无措。在飞机和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中，日本海陆军分头进击，香港没几天就沦陷那时，占据了九龙的日军与英军隔海炮战，虎豹别墅后山成为目标，胡文虎撤出了虎豹别墅，避居在亲友家中。他的太太和儿女们部在新加坡和缅甸，身旁只有胡山和胡好夫妇。炮声不绝，胡文虎静坐花园中观望。

日军全部占领香港后，香港当局的政府要员全部送进了集中营，而一些日军认为是重要的人物则被送到告罗士打酒店。日军解释说，整个城市混乱无序，把这些人物送到告罗士打酒店集中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免遭误伤和误杀，是对他们的优待。胡文虎也是被集中到告罗士打酒店受到“优待”的对象之一。

胡文虎的确是受到了日军的“优待”，在告罗士打酒店，除了失去自由外，饮食起居待遇都很不错。他在酒店里被“优待”了一个多月之后。获释出来。这期间他的虎豹别墅也受到日军特别保护，胡文虎回到虎豹别墅，但见虎豹别墅在战乱中竟完好无损，客厅里陈设的古董、玉器和家具都安然尚在，这实在是万幸。

虎豹别墅的餐厅里悬挂着许多大幅照片，那都是胡文虎与党国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合影，其中有胡文虎与林森、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杜月笙、何应钦等人的合影，而胡文虎与蒋介石的那张握手照是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这些照片都是胡文虎引以为荣向人炫耀的资本。这些党国要人都是日本人的敌人，正在和日本人对抗作战，照理日本人是不能容忍在他们的占领区悬挂他们的敌人的照片的，但日本人并没有干涉胡文虎，并没有令他把照片取下。胡文虎说，如果日本人不许他挂这些照片，他一定要表示抗议。

胡文虎是十分讲义气的，星系报时常刊登揭露国民党政治黑暗面，抨击当同时政的文章。胡文虎有时候还亲笔撰文。

直言不讳地指出时弊。但是他却对他所属的星系报业的编辑。记者说：“蒋介石称我为朋友的，请我吃过饭，照过相，我的报纸骂他不好，不够朋友。蒋介石不好骂，其他人可以骂。”

当时的香港。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尤其是粮食和副食品，许多市民食不饱肚。但是日军对虎豹别墅里的胡文虎却并不加以限制，胡文虎要什么就给什么。胡文虎还独自拥有两辆私家车，自由出入，这对于当时的香港市民更是天方便谭，因为市民的私家车多半破日本人强占了去，就算没被强占的，也没有汽油。

那时是日本军阀矶谷廉介作了香港总督，他时常与胡文虎见面，还时常

派高级官员来拜访胡文虎。

日本人对胡文虎如此网开一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而是别有用意和企图的。日本人对胡文虎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胡文虎只是一个商人，对此中深意并不想深究，日本人既然不管他，不妨碍他，他就乐得做他的生意，让永安堂运转起来。

如前所述，永安堂这时空前看好，把从前的存货卖光了，万金油还是供不应求。胡文虎便招工扩厂，忙得不亦乐乎，好在从前存下了不少制药原料。

这时，有一家与日本海军有关系的南进公司，看见虎标良药销路这样好，就想插一杠子，他们提出虎标永安堂的所有药品由南进公司总经销。这实际是巧取豪夺，但胡文虎迫于威慑，不能不答应。胡文虎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允许永安堂在门前向市民零售虎标良药，每人限买一盒。几番交涉，才取得南进公司的同意。

听说永安堂门前能买到虎标良药，市民们一传十、十传百，永安堂门前排起了长龙似的长队。那时候，医药极缺，永安堂能让市民一人一次买一盒虎标良药，市民们自然很惊喜，他们在永安堂门前争先恐后，唯恐买不到，又怕明天不发售。药买了来家常备用，心里踏实，就算用不上，还可以转手卖给别的药铺，从中赚点小利。

胡文虎受南进公司要挟，被迫交出永安堂虎标良药的专卖权，心里是极愤恨不平的，但他又无力与日本海军的南进公司对抗，这愤恨只能埋藏在心里。可是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与南进公司斗法的机会。

这天，永安堂门前来了个日本宪兵，排在长龙似的长队里买药。轮到 he 买药了，他一个人要买十打万金油，永安堂的人自然不敢卖给他，南进公司规定每人一次只能买一盒药。这宪兵不依，非要买十打。永安堂的人只好向胡文虎请示。胡文虎马上派了一位懂日文的秘书来。秘书向宪兵解释，永安堂的药已经由南进公司专卖，永安堂不得随便买卖。宪兵非常气愤。就跑到南进公司去质问。宪兵这一去，才弄清楚南进公司原来是海军的一个赚钱的机构。

日本宪兵与日本海军一向不和，两家明争暗斗已久，这买药的宪兵回去把永安堂门前的事一讲，宪兵部正好借题发挥，马上就派人去南进公司拘了经理来讯办。讯办的结果是，永安堂的药品归还永安堂自己专卖，南进公司再不得插手染指。

这一出宪兵买药的戏原是胡文虎导演的。胡文虎明知永安堂无力与南进公司硬斗，但是他知道日本宪兵和日本海军水火不容，争权夺利，这一点正可以加以利用。胡文虎于是暗中托人向日本宪兵司令叫屈，日本宪兵当然不容海军势力扩张，所以便有了宪兵买药这出戏。

胡文虎那时候还做了一桩亏本生意，这桩亏本生意是他有意为之。

胡文虎有个座右铭，叫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以尽国民之职。”永安堂生意兴隆，赚了不少钱，胡文虎便想散散财，做点好事。

当时香港闹粮荒，胡文虎便想做大米生意，从外地购运大米来供应香港市民。胡文虎的想法得到一帮朋反响应，不久成立起一家公司，叫中侨公司。胡文虎投资最多，由他担任董事长。当然，在公司成立之先，已征得日军当局的同意。粮荒使香港市民生活在恐慌之中，能够运些大米来，多少可以稳定人心，日军也就同意。

中侨公司买了两艘机帆船到广州市桥去购运大木。两艘机帆船分别叫做“中侨第一号”和“中侨第二号”，从香港出发。运载着万金油、盐或其他物品，在市桥把这些东西卖了，再购运大米回香港。

那个年代能够做大米生意，肯定是要赚大钱的。但是据有关人士说，中侨公司那时运米来香港卖，的确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中侨公司卖出的米，其价格要比市价便宜得多。中侨公司确实是在做亏本的生意，这亏本的钱全部旧在胡文虎的名下。受益的当然是香港市民，不但有米买了，而且是便宜的米。

第十五章 东京之行 媚敌原是假相

胡文虎的“东京之行”为他惹下一身是非。抗战胜利后，厦门记者公会曾有决议：“《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直到1992年，历史才终于有了“谜”底。

在胡文虎在东京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没有找到之前，胡文虎的东京之行，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争论不休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1946年12月18日，厦门多家报纸同时刊载一则新闻，报道厦门记者公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的经过和决议案。其中第三项决议就是：“《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

照理，这条新闻的主题应该是大会的会议内容，但是，除《星光日报》外，各家报纸都把重点放在了胡文虎身上。

《立人日报》做的是三栏通行大标题：

记者公会昨二次大会决议（仅用3号宋体）

声讨胡文虎媚敌（使用特号宋体，达到突出醒目效果。）

而《江声报》的是双栏三行标题：

新闻记者公会

昨检举胡文虎

充伪华侨代表赴日媚敌

远在这之前，国内外早已是流言沸沸，说“胡文虎和敌人妥协了，准备在香港复办报纸和开设银行”，说“胡文虎允当伪侨代表，赴东京媚敌，准备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堕落为大汉好了。”沦陷区的报刊则宣扬：“查胡文虎氏前系战派中极有力之华商巨子，抱所谓爱国热忱，致力于救国捐输运动。自大东亚战争勃发后，日军攻陷香港，胡氏在港受日军保护，因之幡然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

厦门记者公会的决议案提出后，却未见国防部有“扣留惩办”的行动。盖因“媚敌”和“汉奸”到底不能等同。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曾经颁布《惩治汉奸条例》16条，对于“汉奸”，当依法惩治，但是16条中并未包含“媚敌”一说，对于“媚敌”者是否当惩治，如何惩治，尚无法可依。

胡文虎是否任过香港维持会会长，这个问题容易澄清。据考证，香港沦陷期间，就根本没有过维持会这个机构。但是，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一说，又的确是事出有因。

据说就是在日军攻占香港，胡文虎和一些被日军认为重要的香港人士软禁在告罗士打酒店时，这些被软禁的“重要”人士曾被逼迫组织香港维持会。胡文虎这期间受到特别“优待”，正是因为日军当局属意于他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

胡文虎身陷囹圄，无法直接拒绝，只好推辞说：“我一向做生意，对政治一窍不通，岂能办维持会呢？”

日本人听他悦得在理，不再勉强他，却提出他既然是做生意的，就给皇军做点生意，皇军正缺军粮，让他给皇军筹办军粮。

胡文虎为摆脱香港维持会会长之职，赶紧抓住这个台阶往下溜，他答应

道：“当然，当然，这个我内行，在出米的仰光、西贡、曼谷，都有我的分公司，做大米生意都能用得上。”

日本人给胡文虎提供了运米的船只，船上插上日本旗，胡文虎便开始替日本军队买米。胡文虎替日本人买来的米，时常偷运到中国去卖给中国人。因此抗战胜利之后，胡文虎没被列入汉奸之列。

以胡文虎惯有的爱国之心，不应有“媚敌”之嫌。

胡文虎被软禁于告罗士打酒店，7天之后，东京派来参谋长主持审讯被俘人员。胡文虎是第一个被提审的。

市讯人员问：“你就是南洋华侨领袖胡文虎？”

胡文虎回答说：“是。”

审讯人员又问：“就是你大力捐钱给中国政府抗日？”

胡文虎从容回答说：“是，我是中国人，爱国是我的天职，我当然要捐钱给政府抗日。”

事后，胡文虎对家人说，当时他自度年逾花甲，阅尽沧桑，富贵如浮云。身陷敌中死何足惧，志更不可屈。

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杀人如麻，灭绝人性，胡文虎忍无可忍，愤而往见日军总督矶谷廉介，指责日本宪兵队队长野间贤之助的疯狂行为。亲友们替胡文虎捏着把汗，胡文虎却说：“就算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能再沉默下去。”

宪兵队队长清水，嗜杀成性，素有“杀人王”之称。有一次实行灯火管制，清水率队巡逻，发现摩利臣山道上的崇正总会楼上露出微光，欲登楼捕人，因大门锁住，即捣毁大门玻璃。第二天又把该会秘书抓去宪兵部队。胡文虎得知，气愤填膺，即以崇正总会会长名义致函清水，谴责他毁坏私人财产。并索赔修理费用。清水理屈词穷，终于认错道歉。

在沦陷期间，日军在香港为所欲为，为筹集军饷，他们开赌开娼，甚至要大开鸦片烟禁。1942年秋，香港大道中荷兰行门外竟公然悬挂起“鸦片零卖8所”的招牌，一些人竟获得毒品专卖权，可以公开贩卖鸦片。胡文虎对此充满义愤，在《香港日报》上发表文章，向日军总督提出抗议。迫于舆论压力，日军收敛了公开贩毒的劣迹，那块“鸦片零卖8所”的招牌也最终被摘下。

那么，依的文虎倔强的个性，我行我素的正义感，为什么要赴东京往见东条英机呢？

在日本方面，邀请胡文虎“驾赴东京一晤”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时值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阶段，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日军在作战中不断遭到打击，士气大挫。面对现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开始考虑接受他的顾问佐藤贤了的建议：“展开和平攻势，以求战争体面结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条英机派出“有力人士”到香港，以解决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断水、断电、断粮等问题为由头，邀请胡文虎到东京与东条英机会晤，实际上是东条英机企图把胡文虎纳入“和平攻势”，让他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

胡文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应邀“驾赴”。记者问及此事，胡文虎回答说：“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没饭食，饿死了不少人。我想我也信佛，日本很多人也信佛，我曾做过许多慈善事业，他们都说我是慈善家。为了救人，应该想法运米来分给大家吃嘛。这里的日本军人说，要米需到东京去求，我便毅然前去，后来也便得到救济。”

胡文虎东京之行，轰动海内外。胡文虎自东京归来，不但外界，就是亲友和知交也都纷纷询问他为何赴东京，赴东京又干了什么，言语间充满怀疑，令胡文虎难以招架。这些问询连绵不断，胡文虎没法保持沉默，在无奈中，于3个月之后，写了一篇短文，作一个总的答复：今春有日本有力人士，游虎豹别墅，殷殷垂问余过去从事慈善事业经纬，及今后之所志，余以既往贡献社会极微，尚未实现理想十之一，甚以为歉。今尤不能释于怀者，中国各地民众战时困于粮食，缅甸、泰国、安南，皆在日控制下，三地盛产米，现无销路，甚或投诸海，苟能出此有余之粮，运往各地，米价自跌，纵不举办平糶，民众赖以救济者，当不知凡几。日本当局对此，如予同情，一经划诺，可活无数饿殍也。该有力人士等闻言，颇以为是，返日后，即转述余意于当局。六月间，复来港，谓：“先生救济中国民众恐慌之宏愿，甚为敬佩，可否请驾东京一行。”余因事关民众问题，乃慨然乘机前往，东条首相殆以余为救济民食恐慌而来，特款余于迎宾馆，感慰之情，无以言喻，居留匝月，畅叙甚欢，商谈结果要旨如下：一、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东条首相允拨仰光白米，无代价归余运往各地，实行救济，此事遂行，民食无忧，受其惠者，每饭不忘。至于运输问题，苦无船舶，现正商请有关方面负责与当局协商并期早日助成之。

二、关于华侨爱国分子自由问题，余曾率直向东条首相，慨乎言之，南洋各地爱国华侨，多数忠直有才干，中国人爱中国，为国民天职，日本如以兄弟之谊待中国，必不憎恶富有爱国思想之华侨，此爱国华侨必能拨其囊护祖国之心，以爱东亚，望能恢复彼等自由，勋其将来为东亚全体努力，至各地华侨产业，尚未揭封者，亦望从宽处理，此与恢复华侨商业，开发南洋资源，不无多少补助，首相对此，亦予采纳。

三、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目前各地银行所订送金办法限制数目极小，收款方法，亦多与华侨年素习惯不甚相合，余曾提议集华侨资本筹备办一银行，由华侨自己办理汇兑，在原则上首相亦加赞许，详细办法，自当与各地当局妥议而后实行。

四、关于香港方面，就管见所及，过去多已贡献于总督阁下，亦曾向东条首相言及，归港后，正向当局条陈具体意见，请其实行。

关于第一问题，现仍在协议具体实施方案，一俟船只问题解决，余当趋赴南洋，商请各地当局，同时实现第二第三两问题。现居香港，即以香港为中心，就有利于大众之事，脚踏实地，由近及远，尽力所能及，以求其实现，语云：“登高者必自卑，行远者必自逾。”余服膺斯语，悬为座右铭。

上述为余飞赴东京之事实经过，外间或未全知，故特草此，以告大众，后此若有所问，恕不再答也。

这篇短文当是胡文虎东京之行的翔实注解，但是却很容易被当作胡文虎的“一面之词”，即使在这“一面之词”中，也能读出胡文虎的“媚敌”，诸如：东条英机首相“特款余于迎宾馆，感慰之情，无以言喻，居留匝月，畅叙甚欢。”

但是，如果不拘泥于这些表面文章，而对胡文虎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加以全面观照，且不说胡文虎抗日救国捐资最巨，单看他在香港沦陷时期，当一些附敌得势者获毒品专卖权，准备向市面公开发售鸦片，胡文虎怒而抨击，严正抗议，终致当局禁毒，除下“鸦片专卖8所”招牌；当许多华侨和文化界人士滞留香港，胡文虎对数以千计的人捐助生活费用和返回国内的路

费，仅对香港大学数百名学生，就每人资助港币 500 元，使他们奔赴祖国抗战第一线；当香港人民因为战乱流离失所，胡文虎捐款数十万元，维持香港 20 余个民间团体救济难民的工作，并在香港永安堂内特设慈善部，专门办理救济事项；当香港缺粮，民不聊生，胡文虎筹办平价米救济贫苦人民，他首先要呈请香港日军总督认可，再须向伪粤政权条陈香港同胞应获救援之急，然后要拜会珠江三角洲的米商集团巨头，可说是斩关夺隘，历尽艰辛。

胡文虎委实不易，既要救济中国的饥民，又要拜会日本的首相；既要争取华侨的自由，又要对付敌人的阴谋；既要维护庞大的企业，又要无损自己的名节。一方面，他要有所不为，不隐瞒爱国，不奴颜卑膝，不出任伪职；而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有所为，为正义呼吁，为难胞捐助，为饥民奔走。

从胡文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第一，胡文虎只是一介商人，没有掌握国家主权，因此，无国家主权可出卖；而他在香港沦陷期间，从未出任过伪职，因而指责他为卖国汉奸是不实之词；第二，胡文虎从未损害民族利益，而是乐捐巨款抗日救国及兴办公益事业；他从不坐视国灾民难，而是积极奔走，竭诚尽力。东京之行，不能抹煞他爱国华侨的本色。

历史终于有了“谜”底。

1992 年 8 月初，中国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部副主任洪仁赴日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在日本友人协助下，查阅了日本战史档案中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谈话内容的原始记录。自此，胡文虎“东京之行”真相大白。

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这次谈话，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谈话记录》专题档案记载。

时间：昭和 18 年（1943 年）7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 时至 3 时 30 分

地点：东条别墅

中心内容：东条英机要胡文虎调运缅甸和东南亚过剩的大米到中国，利用与蒋介石的关系换运国统区钨矿（系军用物资）至日本，胡文虎以交通工具无法解决及自己仍在软禁之中而拒绝。胡文虎抨击伪政权的腐败，胡文虎试图探问中日战争何时结束，被在场的东条慕僚制止。

据查东条英机的全部机密谈话档案，东条英机与胡文虎的谈话仅此一次。

第十六章 报业春秋 迢迢星系之路

在汕头报刊上做广告耗资不菲，可不但没有买来好名声，反倒遭指责，胡文虎横下心在汕头办一张自己的报。从今后哪里设有永安堂分行，就把报纸办到哪里。报纸屡办屡停，秀才斗不过兵。“星岛”是胡文虎报业史上最辉煌的一笔，一流设备，兵强马壮，名家荟萃。

汕头的《星华日报》是胡文虎的第二张星系报纸。

1930年，胡文虎在汕头设立永安堂分行，并筹建制药厂。其时，汕头一些报刊对虎标良药批评诸多，令胡文虎十分气恼，胡文虎每年在汕头报刊上做广告耗资不菲，不但没有买来好名声，反倒招来指责，胡文虎便想，倒不如把做广告的钱用来办报纸，既可给虎标良药做广告，又能与那些攻击虎标良药的报纸相对垒。这时候胡文虎已经有了办《星洲日报》的成功经验，《星洲日报》在新加坡办得有声有色，与陈嘉庚的《南洋侨报》平分秋色，使得胡文虎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与日俱增，胡文虎因此时办报纸更有兴趣和信心，他甚至忽发奇想，今后哪里设有永安堂分行，就把报纸办到哪里。

《星华日报》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于1931年7月正式出版，每日出报三大张。其规模虽不及《星洲日报》，但在汕头已是首屈一指，并且内容也还不错，深受读者欢迎。

然而出版不过数月，《星华日报》便被勒令停刊，原因是触犯了当地军阀之忌。胡文虎得到停刊消息，异常愤怒，当即派人去广州交涉。

派去的人持胡文虎的信谒见南天王陈济棠及当地驻军独立二师师长张瑞贵。胡文虎的信息请陈张二位确实保护华侨投资，取消停刊令。陈济棠和张瑞贵经过商量，最终致电汕头有关方面，解除前令，准许《星华日报》即日复刊。

《星华日报》复刊后，销路明显比停刊前增氏，概因汕头百姓见其正直敢言，触怒军阀，遭致停刊，深感同病，而对其复刊表示支持的缘故。

然而仅仅放月之后，《星华日报》又触怒汕头市市长，被勒令停刊5日。触怒市长的那条新闻，列举抢掠之率频繁、烟赌之风日盛的事实，指出汕头市政无人管事的弊端。这原是新闻的正当舆论监督，但在那个专制的时代，一市之长岂容报纸对他指指点点？

日军占据汕头时，《星华日报》宣告停刊，战后复刊。汕头解放后，该报人手不足，自动停刊。《星华日报》的报史就此结束。

星系报的第三张报纸是《星光日报》。

胡文虎在创办《星华日报》之时，便有了想法，那就是要在设有永安堂分行的各大城市都办起报纸来。厦门是福建最大的通商口岸，永安堂在那里设有分行，胡文虎感到很有必要在那里办一张报纸。

1935年初，胡文虎在厦门北中山路购下一幢五层楼建筑作为报馆。半年之后，从这间报馆里诞生出又一张星系报——《星光日报》。这张报办得没有什么特色，到1939年厦门被日军侵占时便停刊。抗战胜利后，该报几经筹划，得以复刊，然而始终办得平庸，未能在厦门的报纸当中拔尖。全国解放时，该报主持人出走香港，《星光日报》自此结束了它平平淡淡的报史。

星系报的第四张报纸——《星中日报》的诞生是缘于新加坡另一家报纸的天折。

这家夭折的报纸叫做《国民日报》，它迟于《星洲日报》数年问世，其股东、董事、编辑部和经理部的负责人都是国民党党员，由国民党新加坡总支部领导，是一家国民党党报。该报筹备多年，投资数十万，起初来势凶猛，谁料是虎头蛇尾，由于经营不善，开办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告关门。

胡文虎这时手头已有“星洲”、“星华”和“星光”三家报纸，三家报纸都办得不错，尤以《星洲日报》声誉鹊起，胡文虎便觉得办报纸这件事既有名，又有利，多多益善，看见《国民日报》倒了，便想把《国民日报》的家当收买过来，再办一家报纸。胡文虎明白自己在新加坡社会中比较孤立，与他敌对的人以及妒嫉他的人都很多，多一家报纸则多一份自我宣传的舆论和力量。

胡文虎跟《国民日报》讨价还价，最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了所有的平版卷筒印报机、铅字、办公用品。

因为《星洲日报》有早晚两报，胡文虎便把这张新报纸放在午间出版，以午报的形式与新加坡读者见面，命名为《星中日报》。

当时，在新加坡一个地方，由一个人同时独资办三家各立门户的报纸，除胡文虎外没有第二人。这也充分显示了胡文虎敢想敢做的魄力和个性。

星系报的第五张报纸《星粤日报》原有可能成为一张极有出息的大报，岂料生不逢时。

1934年10月，胡文虎到广州视察业务。广州是华南的最大都市，又是广东省省会，永安堂在此设有分行。胡文虎感到很有必要在这里办一张报纸。胡文虎遂于长堤择地，兴建馆址，筹办《星粤日报》，并向美国定购新式卷筒印报机。

第二年馆址落成，经过半年多筹备，一切就绪，总编辑和主笔都已聘定，《星粤日报》出版指日可待。然而广州突遭沦陷，《星粤日报》十月怀胎，一朝夭折。日军强占该报馆址，印报机的机件多被拆去，其他设备也被搬毁一空。

《星粤日报》未出一张纸便胎死腹中，而随着汕头、厦门相继沦陷，“星华”和“星光”均告停刊，胡文虎损失惨重，但他办报之“贼心”不死。

那时候东南沿海遭日军封锁，香港便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胡文虎设在香港的永安堂分行更成为永安堂的重要据点。为适应环境形势的发展变化，胡文虎决定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

胡文虎让他的三公子，年仅18岁的胡好出任社长。胡好秉承父亲的旨意，加上少年老成，为人谦和，处事精明，数月之内便将《星岛日报》的筹备工作迅速完成。

1938年8月1日，星系报的第六张报纸——《星岛日报》在香港正式出版，胡文虎开始写下他报业史上最辉煌的一笔。

《星岛日报》的规模在当时的报业中堪称一流。印刷方面，它拥有最新型的高斯卷筒印刷机，配有彩色套印，每小时可印5万份，而在排字方面也采取革新的字盘，技工大部分从上海请来，排字拼版简便迅速，其他如摄影、制版、铸字等，都拥有自己的一流设备，此外，运输报纸的车辆及内地运送报纸的交通网，都有精密的安排。

人事方面更是兵强马壮。

1938年，香港的报业经历了巨大变化，全面抗战展开后，上海、北平、广州各地的报业人员纷纷转来香港，《星岛日报》得以广纳人才。

胡文虎本人对办报虽是外行，但他能信任专家和有经验的报人。这是他办报所以成功之处。编辑部当时聘定了好几位报坛知名人士，如江亢虎、樊仲云、冯列山、祝百英等，个个属“过江名士”。《星岛日报》初出版时，总编辑是樊仲云，樊仲云走后是冯列山，冯列山走后为金仲华。

金仲华来自上海，曾办过一份国际新闻刊物，负有“国际政论家”之盛名。金仲华当总编辑很卖力，下午返社遍阅新闻电讯来稿，晚上亲自挥笔写时事评论，深夜后看完大样才离开报馆。

专栏文章是当时最受读者喜爱的版面，名记者范长江写战地通讯，乔木写国际新闻评述，其他如刘思慕、夏衍、恽逸群等也常在专栏中露面。

穆时英编娱乐版。此君诸熟电影戏剧和其他娱乐性玩艺。每天的娱乐版都有陈桑榆写的麻雀经、桥牌经。擅长漫画的张光宇则是报坛有数的奇才。

副刊最初是由陶亢德先生负责，后由诗人戴望舒继任。戴望舒在上海文坛负有盛名，与文艺界人士相熟，组稿也方便。副刊名为“星座”，除长篇小说连载外，更有新诗、木刻画插图，名作家萧红、端木蕻良、徐纭、萧军等，经常有精彩的文章刊出，深受新文学青年喜爱。

社会服务版是“星岛”的强项，由绰号“万能博士”黎伯挺主编。该版解答读者来函的各种询问，还替读者服务，诸如寻人、求职、解释法律、领请商业牌照手续等等，事务繁琐，牵涉广泛。编者不仅要有乐于助人的心肠，还要脚踏实地地为人奔走，黎伯挺身材高大，说话响亮，性格幽默，自称天上地下无人不识、无事不通，因此博得同人赠以“博士”头衔。

体育版编辑是李次民。香港当年的足球比赛最受市民青睐，当年的“波经：’与今日的马经同等重要，球迷们对一场重要赛事绝不肯放过，赛前预测，赛后批评，临场做拉拉队，其热情不下于今人之于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因此，报纸对足球新闻特别重视，并对排球、篮球及各项田径比赛都予以详实报道。“星岛”除注重体育版外，还自组足球队、男女子篮球队、游泳队，拥有多名体育健将。

“皇岛”还曾聘杨潮（羊枣）为军事记者。杨潮发表的抗日战争军事评论，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给海外及南方各省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星岛日报》后来成为香港的大报之一，是香港政府刊登法律性质广告的有效刊物，每日出版对开8—12张不等，节日多达20多张，内容文字与广告之比约为4比6。该报新闻齐全、消息多，专栏、副刊适合知识分子趣味。并且报社经常搞一些社会活动，如“环岛竞步”、“捐款济贫”、“摄影比赛”“读者旅行团”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日常销量约7万份。

《星岛日报》出版后不到半个月，《星岛晚报》也接踵面世。《星岛晚报》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该报日后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一家晚报，最初其销量却仅1万份。1948年1月16日，广州发生了“广州市民焚烧沙面英国领事馆事件”，该报总编辑唐碧川与编辑部主任郎荫泉知道后，马上通知驻穗记者，雇用直升飞机采访，发回大量新闻图片报道，当天即在该报头版刊出，从此销路直线上升，数十年来，始终雄踞香港晚报销量的首席地位，发行量达16万份，每年都有巨额盈利。

战前的香港报业竞争较烈。日报属于大报一类，张数较多，内容文字与论述层次较高，普通市民尤其是劳工阶层不大爱读。为满足这部分读者的需求，“一仙报”应运而生。所谓“一仙报”是一大张，内容除新闻外，注重

副刊小说，只售1仙港币。当时已出版的有“天光”、“成报”、“南中”、“南强”，“星岛”此时也出版了一张《星岛晨报》。

经营“一仙报”有另一套手法，第一，要争取国际新闻的精华，更要报道内地抗战局势的发展；第二，要力求抢先报道本港新闻；第三，要加强副刊的趣味，迎合大众的追读性。报纸篇幅虽少，但信息量也要尽可能多，删繁取精。《星岛晨报》那时的主编是叶启芳。叶启芳原在广州从政，和广东省政要相交，对内地政治新闻来源颇有把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胡文虎在新加坡马来亚还办了两家报纸，其中一家是星系报的第七张报纸——《星报日报》。

《星报日报》馆址在槟榔屿，该报于1938年着手筹备，1939年元旦正式出版。

槟榔屿地处马来亚之北，暹罗之南，永安堂在那里早就设有分行。新加坡的“星洲”、“星中”两报，虽然每天有报纸发往槟榔屿，但因交通不便，总不能及时送到。胡文虎看准这一点，在槟榔屿办一家报纸，在当地及附近地区是会有销路的。事实上果然如此，《星报日报》虽没有办法和新加坡所出版的报纸相竞争，但除了日本人攻占槟榔屿时不得不停刊外，业务一直都很平稳。

另外一家是胡文虎接办的《总汇报》。

在南洋的华文报纸中，《总汇报》可算得上是老资格了。远在1898年，即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那一年，康有为在国内力倡变法图强，震动朝野，海外有识之士，群起响应。有一位名士邱寂园，待出资创办《天南新报》，拥护康有为的主张。其后康梁变法运动失败，华侨中的急进青年认为满清政府腐败透顶，非推翻了不可，于是趋向民主革命之说。这一派人便合资创办了《图南报》，倡导革命理论，痛斥康梁维新派。因此引起了两派在海外的政治斗争。但是那时还有比较保守的侨胞，同情康梁，诸如许子鳞、沈联芳、陈云秋等，到1904年，这些人创办了《总汇报》。

那时候，维新派与革命派笔墨酣战，而《总汇报》的言论竟每每倾向于革命派，这使同情康梁的股东陈云秋大为不满。到1906年，陈云秋忍无可忍，提出散伙。

当时《总汇报》的股东当中，有好几位都想承接来办，无法解决，经过协议，只好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议定底价，谁抽中归谁承办。

抽签结果，陈云秋独占《总汇报》。

陈云秋接办《总汇报》之后，与维新派中人朱子佩合股，使报纸成为维新派的言论喉舌，康有为的门徒欧榘甲、徐勤、伍宪子先后被请来新加坡主持名政，根据康有为维新图强的主张，与革命派的《图南报》展开针锋相对的笔战。

后来，维新派的主张宣告失败，《总汇报》因之锋芒尽挫。到1929年，该报始转入广东帮侨商之手，更名为《总汇报新报》。此时新加坡又兴起多家新报馆，竞争激烈《总汇报新报》暮气沉沉，光景大不如前。到1938年，因无法维持，决定收盘。

严瑞棠是一位以代销报纸为业的粤侨，眼见历史悠久的《总汇报新报》收盘，甚为憾惜，便与胡文虎合作，组织广东报业公司，将该报全盘承顶过来，继续出版。恢复其《总汇报》的原名。胡文虎长子胡蛟担任社长，严瑞棠担任总经理。《总汇报》就这样纳入了呈系报的行列。

接办后的《总汇报》并不见有什么起色，一年多之后，便自动停办了。

纵观星系报业史，可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抗战前。这一时期是垦系报业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共有七家垦系报先后诞生和出版，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汇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檳榔屿的《星檳日报》，汕头的《星华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而广州的《星粤日报》则由于广州沦陷而胎死腹中。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中。这一时期，因为有星系报的地方都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星系报均先后停刊。其中只有《星岛日报》停刊后，改名《香岛日报》继续出版。而《星洲日报》是在日军侵入新加坡前夕即停刊，之后所出版的《昭南日报》是日军利用《星洲日报》的设备而运作，与胡文虎的星系报并不相干。

第三时期是抗战结束后。抗战胜利，各地光复，星系报也随之先后复刊，新加坡的《星洲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檳榔屿的《星檳日报》，汕头的《星华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都重整旗鼓，只有新加坡的《星中日报》和《总汇报》因原本就不具特色，似乎没有复出的必要，也就不再继续出版了。

第十七章 随商随政 江湖身不由己

战后因到新加坡，永安堂四壁萧条，货物被日寇洗劫一空，连所存的白报纸也被《昭南日报》用得一干二净。《星洲日报》复刊，遭遇“劲敌”——战后报业新秀《南侨日报》。“南洋”和“星洲”都拿不出可与“南侨”的经编人才相匹敌的人物。笔墨交战，昔日二强“南洋”和“星洲”相形见绌。“南侨”虽劲，无奈时运不济。

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外华侨纷纷返家重整旧业。

胡文虎战后第一次回新加坡，踏进永安堂，只见窗户破碎，四壁萧条，连地板都被掘出许多窟窿。永安堂的货物被抢劫一空，连《星洲日报》所存的白报纸也破《昭南日报》用得一干二净。那时候他在香港所存的港币不多，卖万金油的钱，绝大部分换作国币存在了国内。要让各永安堂分行重新运作，让星系各报恢复出版，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星洲日报》不久即告复刊。

20年代，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问世，标志着海外华人报业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海外华人报刊不外是各种政治派系或是政党的宣传阵地，由于先天不足，虽然热心时务，却都难得持久，时办时停。只有《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创立了海外华侨社会具角独立性的纯商务新闻企业。它们部有雄厚的资金作为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它们的创办人都是商人，是远离祖国政治中心之外的海外华侨。除了热忱爱国之外，他们在政治卜是无党无派，处于中立的。

但是，“九·一八”的炮声震碎了这种平和宁静，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东北的土地，也践痛了海外赤子的心。新加坡、马来亚的报刊无不愤怒呐喊，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行为，呼吁华侨捐助难民，抵制日货。许多报纸腾出版面大量报道，甚至出版号外。《星洲日报》促请国民政府从速备战；《南洋商报》指出除非国民政府不惜一切投入抗日，否则东北三省将永远沦丧。

《南洋总汇报》由于激烈鼓吹抵制日货，被英国殖民政府勒令停刊20天。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底新加坡马来亚沦陷，这一时期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各华文报刊无不投入祖国的政治漩涡之中，密切关注国内政局和战争的动态，每有重大事件即出版号外。《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这一时期则增设了晚刊，以便更及时地报道国内时事。

南洋华侨的爱国行为和华文报刊对祖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引起日寇的强烈仇恨。日寇占领新加坡马来亚后，借口“检证”，大肆屠杀华人以泄恨。南洋华侨蒙难者数以万计。

战争结束后，战时海外报刊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不分彼此的精神也随之烟消云散。各报刊或标榜中立，无党无派，或公开亲共左倾，或保守右倾，连战前具有独立性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在所难免。过去的办报人士基于政见，由政治出发而办报；而“南洋”和“星洲”这样正式的商营报纸，它们的投资创办者也仍然不是报人，而是纯粹的商人，他们不懂政治，对政治也没有足够的兴趣，因此决定他们的报纸立场，除了投资人的直接商业利益，面对政治风云，就只能看当时雇用的总编辑或者主笔是什么样的立场了。

战后初期，左派受到欢迎，因此，左翼报刊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两家，一家是檳城的《现代日报》，一家是新加坡的《南侨日报》。

《现代日报》创刊于1936年，出版不到一年，中日战争爆发，该报由于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而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干预，董事主席柯仕楚被驱逐出境。檳城沦陷前夕，该报即停刊。

抗战胜利后，《现代日报》复刊，由洪丝丝主编，不久又恢复了当年的《现代周刊》。由于较能适应时势与潮流，很受读者喜欢，发行量节节上升，在1945到1947这两三年间，《现代日报》在檳城华文报刊中成为最热门的一家。在政治上，该报倾向于中国国内的民主同盟路线，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政策也时有抨击。后来，新加坡《南侨日报》出版，《现代日报》的几员大将相继跳往《南侨日报》，本来就人才不足的《现代日报》更加匮乏，报纸开始走下坡路。之后马来亚共产党暴动事件爆发。马来亚半岛进入紧急状态，英国殖民当局颁发紧急法令，勒令《现代日报》停刊，同时将负责经编的方氏兄弟和几位董事驱逐出境。《现代日报》报史自此宣告结束。

《南侨日报》是战后出现的新报纸，1945年11月11日在新加坡正式出版。它的发起人是陈嘉庚，“南侨日报有限公司”50元叻币资本的股东遍及新加坡、马来亚、苏岛、缅甸和爪哇：追随陈嘉庚的入股者不外是他的亲戚朋友，都是些纯粹的商人。

但是《中侨日报》经编两部的头目却都是本地报界赫赫知名的损人，胡愈之任社长。李铁民掌督印，主笔舍有胡伟夫、洪丝丝、彭赫生、胡守愚等报坛名将。这些人都是当时被指为“反蒋拥共”的民盟大将，他们的报纸内容丰富，敢怒敢言，风格清新，形式活泼，可读性很强，极能迎合读者趣味，因此发行量逐日上升。这个后起之秀眼看就要成为“南洋”和“星洲”两报的共同劲敌，因为“南洋”和“星洲”拿不出实力上可以与“南侨”的经编人才相匹敌的人物。

在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以及以后的内战时期，《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不止一次与新兴的《南侨日报》进行笔墨交战。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攻陷延安的消息传到新加坡。

《南洋商报》在3月22日的社论中说：“消息传来，人心成为之震荡，良以共党平日的每夸称其民力足持，而一班为共党摇旗呐喊者亦每每为之张扬，庸诮知割据形式崩溃如此其速耶！……国军获此大捷，势必乘战胜之余威，于东北一带加强对共军之进迫，如此则关内关外，双管齐下，共军前途之悲观，不言而喻。”

而《星洲日报》3月29日的社论《延安收复以后的时局》如出一辙：“政府收复延安，说明共军军事力量之脆弱，因为再继续打下去。共党的‘胜利’将终归幻灭，所以应谋政治解决，”

远在海外的南洋华侨，由于对国内真实形势的隔障，还没有人能够想象到胡东南如此轻而易举攻陷延安，原是“共军”佯装败北，有意撤退而演出的一出现代“空城计”，只有《南侨日报》在3月20日，即胡宗南攻陷延安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说：“攻下延安的捷报，也许会成为国民政府统治的丧钟。国军攻陷延安，便如吞下了一枚原子弹。”

这位“南侨”的主笔真是料事如神，事态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南侨”与“南洋”和“星洲”只此一笔已见出高下，“南侨”此时已呈超越“南

洋”和“星洲”二强，称雄南洋华文报业市场之势。无奈时运不济，英国殖民地政府半局早有决策，1947年10月查封了新加坡的中国民主同盟支部，1950年9月。《南侨日报》被勒令停刊。一家年轻有为生气勃勃的报纸就这样夭于非命，令人扼腕叹惜。

战争结束后。胡文虎办报的兴趣是有增无减，并且抱有很大的雄心，打算在闰年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汉口、福州和南洋各大都市，如仰光、曼谷、雅加达等地，一一开办报馆，为永安堂的生意展开更大的宣传攻势，也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舆论力量。

胡文虎这些计划得到实现的，只有福州的《星闽日报》，曼谷的《星暹日报》，沙劳越的《前锋日报》，另外就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各办下一家英文《虎报》。有一些是拟定了报名，却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办成功。

第十八章 虎报在兴 却叹虎子身亡

战后的第一张报纸选择在家乡创办。买卷筒印刷机捡了个便宜。办《前锋日报》入不敷出。办华文报说办就办，办英文报却踌躇再三，因为胡文虎认为办英文报，读者是外国人，同业竞争者也是外国人，办不好贻笑外人，坏了国际名声。胡文虎三子胡好出任英文报社长，年轻能干，富有开拓精神，为与英国官方的《海峡时报》竞争销路，买了两架飞机运送报纸。

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八闽人物荟萃的城市，早在战前，永安堂就在此设有分行。胡文虎又是福建人，并且家乡观念极重，因此他战后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便选择在福州，名为《星闽日报》。

《星闽日报》于1946年开始筹办，到1947年10月正式出版。其内容和印刷编排都很不错，颇受读者欢迎。福州解放前夕，该报社长和编辑负责人出走香港，该报宣告停刊，结束了不到两年的短暂报史。

泰国的首都曼谷是虎标良药行销的一个大据点，永安堂在那里也是早有分行。曼谷的华侨相当多，并且胡文虎一年中总有几次到湄公河畔作三五日逗留，与当地侨领杯酒酬酢、“围城”酣战。胡文虎到曼谷办报馆的想法存心已久，直到战后的1951年才成为现实。

1951年元旦，《星暹日报》在曼谷宣告出版。

胡文虎邀请当地几位侨领张兰臣、伍竹林、郭实秋、刘汉华合作，让他们做《星暹日报》的董事，胡文虎自己任董事长。

胡文虎从香港购运了卷筒印报机，这部卷筒印报机捡了个便宜，它原是上海《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购自美国的一部旧印机。印机运到上海时，上海即将解放，马树礼便将它原封不动运到台湾，再由台湾运到香港，存在货仓，指望卖个好价钱，马树礼原以为奇货可居，可卖到港币五六十万元，岂料无人问津。存仓时间一久，所付的利息和仓租难以承受，马树礼再无心待沽，忍痛以港币11万元卖给胡文虎。

《星暹日报》开办之后，胡文虎又在婆罗洲的首府沙劳越创办了一家报纸，原名为《星越日报》。但临到出版的时候，胡文虎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这个报名，而更名为《前锋日报》。照理胡文虎出版的报都冠以一个“星”字，表明是星系报，一望而知是胡文虎的报，为什么现在来个“十二不靠”的《前锋日报》，这始终有些蹊跷。

《前锋日报》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开办不到两年就丢开手不办了。停办的原因很多，其一，沙劳越那边的华侨并不太多，当地已经有报纸，难有大的作为；其二，沙劳越地方小广告少，入不敷出，不但无利可图，还要亏本；其三，内部人事复杂，难以合作，该报总经理秦望山因意见不合而辞职不干。这些都是促使胡文虎放弃《前锋日报》的原因。

接下来，胡文虎办了两份英文《虎报》。

胡文虎对英文一窍不通，为什么要办英文报呢？

胡文虎为人好大喜功，极爱声名，他对当地政府有什么意见，对社会事业有什么看法，或者他本人有什么新闻，他不但总喜欢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有时还请人译成英文，在英文报上发表。能让政府当局和外籍人士闻知他的言行，对胡文虎来说是一件令他感到极有面子的事情。胡文虎事业的两大重

要据点新加坡和香港，都是英国殖民地，华侨称外国人办的报纸为西报，胡文虎自己手头有华文报纸，发表言论和新闻非常方便自如，但是要在西报上发表言论或消息却不那么容易。送去的稿子你认为是很重要的，人家却觉得毫无意义，掷进字纸篓，或者刊发出来也不一定是全文，删节得面目全非，这使胡文虎非常气恼，很感屈辱。而促成胡文虎真正下决心办英文报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战后，特别是中国解放以后，由于政权易主，胡文虎失去了整个内地市场，即万金油的最大市场，时势使然，胡文虎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世界，寻求和开辟新的世界市场，英文报将成为他寻求和开辟新的世界市场的舆论宣传工具。

胡文虎事业的重要据点在新加坡和香港，这两处都是英国殖民地，胡文虎自然就选择了这两个地方办英文报。

英文报筹办之初，对于用什么报名是很费了一番斟酌的。按照胡文虎的意思，是要叫做“虎报”，让人一看而知是胡文虎办的。可是这“虎报”翻作英文便是“Tiger”，恐怕让外国人看了要莫名其妙，经过再三讨论研究，才定下一个方案，中文名叫《英文虎报》，英文名叫《HongKong standard》，中间加入老虎的商标，其下标上“Tiger”这个英文字。胡文虎对这个方案很满意，就此定下。

胡文虎对办华文报向来是说办就办，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似的，办英文报却很费踌躇。因为他认为华文报的读者是中国人，同业竞争者也是中国人，反正都是自家人，办得好坏，不会见外。可是办英文报，读者是外国人，同业竞争者是外国人，这关系到国际名声，不能不慎重行事，办得不好，要貽笑外人。所以，胡文虎虽然早就有要办英文报的想法，却迟迟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的《英文虎报》于1948年出版。两年之后，1950年7月3日，新加坡的《英文虎报》也告问世。这是一对姐妹报、中英文的报名都相同，只是地名不一样，香港的叫作《香港英文虎报》，新加坡的叫作《星洲英文虎报》，由胡文虎的三子胡好任社长。

胡文虎一共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三个为养子，他们分别是长子胡蚊，次子胡山，三子胡好；两个亲生子，胡一虎和胡四虎，系庶出。养子和亲生子取名不一样，从名字上也可看出。

三个养子中以胡好最有出息。胡好聪明能干，很有抱负，很有开拓精神，敢想敢做，又善结交朋友，王孙贵族，三教九流，他都能一混就熟，称兄道弟。三个养子，胡蚊任《星洲日报》社长，胡山任《星岛日报》社长，各自掌握了新加坡、香港两地的主要星系报，胡好则秉承父亲的旨意，另辟蹊径，在此两地开办英文报。

新加坡的《英文虎报》问世时，本地早已有一家代表英国官方的英文报《海峡时报》（Strait Times）。这家报社的存在先于《虎报》，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都非《虎报》可以攀比。

那时的新加坡马来亚同属英国殖民地，虽然在行政组织上所属不同，但实际上新加坡却是两地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两地出版的中英文报刊一般都在两地同时发行。大报多是在新加坡印刷出版，由专门的运报车或是火车、飞机，运往马来亚各大城市。

胡好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为了跟《海峡时报》竞争销路，他特购了两架小型飞机，专门运送《虎报》。这不但在海外华文报界实力壮举，就是在整个东方世界也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充分显示了胡好干事业的雄心和魄力。

然而，谁能想到，福兮祸之所伏，不幸已隐藏在这两架运报机中。

1953年，胡好乘坐他的运报机赴马来亚北部视察业务，途遇恶劣天气，雨暴风狂，运报机坠毁，胡好和伴他同行的编辑主任冯国桢以及机师全部身亡。

冯国桢是一位美国华侨，抗战爆发时回国参战，在重庆担任过中央社的英文部主任，受聘任职《虎报》两年多。冯国桢最忌怕坐飞机，因为他的哥哥原是空军飞行员，在战时坠机而亡。这次胡好要他坐飞机陪同去马来亚北部视察，冯国桢不便推辞，心里却担心飞机掉下来，行前特意去买了人寿意外保险，结果却真的不幸以身殉职。

胡好青年遇难，无疑是星系报业和胡家事业的最重大损失，在那时，胡文虎的子女中，被认为能真正继承和发扬光大胡文虎开创的一代家业的，除胡好，没有第二人。可以肯定，假如胡好活着，胡家事业如今定是另一番景象。

第十九章 拯救星洲 寄文转祸为福

欲加之罪，《南侨日报》被查封。南京国民政府败走台湾，遂令“南洋”“星洲”恨铁不成钢。《益世报》昙花一现，却给新马留下五员报业“虎将”。马来西亚政府明令禁止《星洲日报》进入马来西亚，“星洲”濒临破产。胡蚊得一人而救“星洲”，只一则3000字小文，便令，总理东姑拉曼请入上座。

《南侨日报》被勒令停刊，“南洋”与“星洲”两家报纸因此免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大松了一口气。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往台湾，形成隔海对峙的局面。《南侨日报》在这种形势下，言论更加倒向中国共产党一边，虽然他们自己一再强调该报绝非任何党派的机关报。

1950年4月20日，《南侨日报》在一篇题为《重申本报立场》的社论中声明：“本报所注意的是中国问题和华侨问题，对于当地的政治斗争，本报则决不介入。倘若乖离了这个基本立场，本报宁可关门。”

这一切无助于化解英国殖民当局对该报的反感。由于该报拒绝刊登政府《招降匪徒（指马来亚共产党）的文告》，激怒了英国殖民当局，派遣政治部人员深夜突击搜查报馆，借口“当场破获若干马共文件”，扣留了“在该报馆内作共党活动”的五名职员，封掉报馆。

“南洋”与“星洲”两家报纸过去一直是持拥护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如今国内局面天翻地覆，“南洋”与“星洲”也不得不顺应大势了。

《南洋商报》自战后复刊起一直是毫不含糊地“拥蒋反共”，现在蒋介石灰溜溜地逃往台湾，“南洋”只好改口责骂蒋介石咎由自取，言词间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如在1948年9月29日的社论中道：“国民党执政22年，政治道德堕落，政治信用破产，政治制度虚设，政治效率丧失……如此堕落政党，造成中国为政治真空地带，而导致中国共产党极端主义的大破坏革命。”又如1949年1月14日社论言：“可惜的是蒋总统对于政治哲学，对于时代思想，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更进一步行动。他总揽24年的军政大权，反止于形名的术数，而没有民生政策……他终于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悲剧历史的最后一人。……”

《星洲日报》在战后复刊初期由胡伟夫主持，政治立场倾向民盟左倾。胡伟夫离职后，由胡浪漫接任总编辑，“星洲”随之转向右倾。该报在1947年3月18日的社论中讨论到中国为什么不能达成统一、实行民主时言道：“这全是由于共产党不愿中止其大规模的、有秩序的以武装夺取政权的行动所致。国民党一年以来，对共党的军事行动，已不借再三忍让，以求以政治方法和调解途径来解决。而共党的答复，则是不断扩军，不断扩大其武力割据的区域，断然拒绝恢复和谈，和否认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因而促成政治调解绝望，和平濒于全面破裂，内争局势一天天扩大……”

内战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全面获胜，胡浪漫因为过头话说得太多，改口都没办法改，只好离任下台，一走了之。“星洲”这时才发表社论，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乃“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继任胡浪漫总编辑之位的是新右派人物江锦帆，由于与编辑部的反对派联合阵线不相容，不久便辞职。之后由黄思接任总编辑。黄思立场偏左，但

无力为文，改聘廖颂扬主理笔政。廖颂扬是一位老官僚，世故圆熟，为文极善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且文如其名，每事必“颂”，逢人即“扬”，因此他的社论篇篇都是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这样的社论实在是可有可无。因为这样一位温柔敦厚的主笔，《星洲日报》倒是少惹了许多是非，温吞不火相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

据新加坡官方统计，复刊后的《星洲日报》1946年的发行数为3.5万份，比《南洋商报》同期的发行数4.4万份略少些，但在新加坡华文报刊中已属发行大户了，并且广告也不少，照理应该有盈利，但《星洲日报》实际上却要永安堂赔钱。

这其中原因据说是在社长胡蛟身上，胡蛟是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少爷。

好在胡蛟有一位才力极强的“军师”，他就是《星洲日报》总经理胡资周。

那时候新加坡有一家《益世报》，筹备了五六年，耗资两三百万元功币，网罗了一批国内流亡而来的一流职业报人，然而报纸只办了3个月就关门大吉。这批报人当中有五员虎将，《益世报》散伙后，他们分别被当地侨报高价接聘，总编辑李星可出任法新社新加坡分社主任，副总编辑刘问渠出任槟城《光华日报》总编辑，采访主任赵世洵出任《光华日报》驻新加坡办事处主任，编辑主任钟文玲受聘《南洋商报》，编辑张冰子出任吉隆坡《中国报》主笔。胡文虎没网罗这些卸职人才，是因为他用人总要用客家人，并且最好是胡姓者，是永定的客家同乡。

现在胡资周鼓动胡蛟，只要把原《益世报》总编辑李星可弄过来，《星洲日报》准有办法搞上去。

李星可是新加坡马来亚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学贯中西，精通中、英、法三国文字，在国内早已享有盛名，他以英、法文写作，他的华文作品更常见于新加坡马来亚两地的所有华文报刊，他此时任法新社新加坡分社主任。

胡蛟原本与李星可相识，这时胡资周点醒了他。胡蛟立刻打电话给李星可，约他到酒楼喝酒吃饭。

胡蛟这时候求贤若渴，实在是因为《星洲日报》碰上了大问题。

那时马来西亚政府刚刚成立。所谓马来西亚，是马来亚半岛独立后的新名称。新成立的政府宣布将禁止《星洲日报》进入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的几万份报纸主要发行于马来亚半岛的各州府，新加坡只不过发行几千份，马来西亚政府一旦禁止《星洲日报》进入马来西亚，那无异于切断了《星洲日报》生存的命脉，马来西亚政府为什么要跟《星洲日报》过不去？盖因英国政治部一向以为战后复刊的《星洲日报》是左倾的民盟机关报。马来西亚虽是独立了，但因为是政治上的和平过渡，行政机构和人员实际上并未变动，过去英国人不便做的事，现在却可以让马来人自己来做了。总理东姑拉曼决计禁止《星洲日报》进入马来西亚。

胡蛟在酒楼请的这顿饭，从中午吃到晚上10点，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席间，胡蛟谈及《星洲日报》这件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位法新社分社主任李星可只是拍着胸脯说：“小事一桩，山人自有妙计，只管喝酒！”

第二天，李星可拿来一篇3000字的文章交给胡蛟和胡资周。二人看了，拍案叫绝。

于是，《星洲日报》次日的社论版位上登出了一篇署名“胡蛟”写的文

章，题目是：《向全马华人进一言》。

这篇文章一刊出，《星洲日报》不但进入马来西亚的禁令被解除，还得到总理东姑拉曼的大力支持，扩增一个马来西亚版。李星可究竟炮制了一篇什么文章，竟有如此神效？

原来，此时的马来西亚正面临全国大选，《向全马华人进一言》通过分析马来西亚的社会结构和人种比例，指出华巫（马来）两族人口相当，占全马来西亚人口绝大多数，印度人和白种人则只是少数，如果华巫合作，则大局稳定，如果华巫对立，则两败俱伤。因此，文章奉劝马来西亚华人投票拥护华巫联盟，支持华巫合作，以维护马来西亚的安定和平。

这篇文章原是李星可有意投马来西亚当局之所好。果然，没几天，身为华巫联盟主席的内阁总理东姑拉曼就给胡蛟亲自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东姑拉曼说没想到《星洲日报》原来是我的报纸，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胡蛟你真够朋友，欢迎来吉隆坡玩玩。

内阁副总理顿拉萨紧接着写了一封信来正式道谢，邀请胡蛟到吉隆坡去会面。

胡蛟没想到一篇文章竟收到如此奇效，喜不待言。

吉隆坡之行，胡蛟应约拜访东姑拉曼，并顺便考察“星洲”业务。当东姑拉曼问及“星洲”业务情况及今后计划，胡蛟告知想在吉隆坡办一家印刷所，开办一个马来西亚版，以便“星洲”及时与马来西亚读者见面，而省去运报车运送一环。

东姑拉曼表示支持，当即吩咐有关方面，在城市新开发区白达岭拨出 50 英亩地皮，以约 5 角钱一亩的最低廉价格卖给胡蛟，作为办报的厂址。

胡蛟因此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第二十章 兴学未竟 巨款转眼成空

国币天天贬值，胡文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把存在国内银行的3000万元国币提出，可损失已经巨大，于心不甘；苦心积虑，想出一计，让儿子胡好赴南京面呈一信给蒋介石。胡文虎给蒋介石出了一个难题。

3000万元国币一跌再跌，最后只值55元港币。

却说早在1935年10月，全国运动大会在上海举行，胡文虎率领马来亚华侨队回国参赛，在10里洋场，胡文虎风头十足，豪兴大发，一时许下宏诺，愿在未来10年内资助国内创办小学1000间，并说“如果永安堂生意发达，获利增加，当将期限缩为5年”。

起初两年，胡文虎为实现这一承诺积极奔走。他首先函请福建教育厅郑贞文为之筹划，在福建各地创办小学10所，建筑费由他负担，其他经费则由地方自筹。

郑贞文一番筹划之后，函复胡文虎，已择定崇安、建宁、泰宁、屏南、长汀、永定、明溪、宁化、清流等10县，各设一所小学，按福州时价，每所建筑费需3000元。胡文虎对此感到满意，当即函告郑贞文，请教育厅立即进行。

这年8月，胡文虎又向福建有关方面表示，愿将在福建创建10所小学，改为百所。福建省为此特别成立了由郑贞文等17人组成的“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建筑委员会”。这百所小学都将命名为“胡文虎小学”。

胡文虎捐资兴办小学的事一时传为佳话。其实千所小学的建筑费，每所以3000元计，总共也不过300万元，但是千所小学真能建成，其地点分布于全国各地，那胡文虎的知名度和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胡文虎对于钱财可谓“善于得之，善于散之”。

1936年间，胡文虎派出代表分头向广东、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西等地的有关方面洽谈建校事宜，并将建校巨款350万元汇存上海、昆明、香港等地的中国银行，以供随时拨用。

正当千所小学的建设事宜在全国蓬勃展开之际，芦沟桥的炮声响起，全面抗战爆发了，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兴办小学的事自然搁置一边。

此时，国内已经建成的小学达300多所，耗资150万元。

1939年，胡文虎将存入中国银行建筑千所小学的余款200万元，全部认购了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救国公债。

抗日战争一打就是8年，战后，胡文虎又忙于重整旗鼓恢复永安堂的生意，建千所小学的事几欲淡忘。等到永安堂的事情都理出了头绪，一切又比较稳定下来，建千所小学这桩未竟的心愿便又涌上他心头。

胡文虎战时在香港卖万金油，赚的钱几乎全都兑换成国币，汇到国内，存在国家银行里，数额总计有3000余万元之多，照理，抗战结束了，中国作为战胜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国内的金融形势当有所好转，国币当有所升值。然而现实却正好相反，国内的金融状况日见困窘，国币天天贬值。胡文虎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当初出于爱国之心存在国家银行里的3000多万元国币，想尽数提出，可那损失已经相当大了，真是于心不甘；倘若政府经济出现转机，币值是会跟着上涨的，此时把款提出，只怕日后要后悔。

可是万一形势继续恶劣下去，像眼前这样一天中早晚的时价都不相同，这笔巨款只怕过不了多久便要化为乌有。

胡文虎于苦心积虑之中终于想出一计，他决定让儿子胡好去南京晋谒蒋介石，面呈一信。

胡文虎让胡好面交蒋介石的这封信是什么内容？

胡文虎是要请求蒋介石将他国内所存的 3000 多万元国币，照当初存入银行的价值，尽数拨来兴建小学。

将存款拨来兴建小学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个人存在银行的钱，其贬值的差额要由政府照数赔补出来，这件事却是无法可依、无例可循的，料想蒋介石虽为政府首脑，对这件事也当感棘手，无以回复。

可这事在胡文虎想来却是理所当然，胡文虎存入国家银行的钱，一笔笔有数可记，毫无虚假，至于其价值比存入时相去甚远，那是政府的事，当然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兴建小学，发展教育事业，这本来是政府要做的事，现在胡文虎捐钱出来帮政府这个忙，政府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不支持呢？横竖是将存在国家银行的钱，办国家应做的事。胡文虎觉得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既完成了他捐建千所小学之愿，又免去了 3000 万元国币贬值的烦恼。

然而这到底只是胡文虎一介商人的幼稚想法。在胡文虎想来，他的请求是理直气壮，蒋介石主理一国大政，一点头就行了。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其时国民政府经济陷入困境，国币日益贬值，身为首脑的蒋介石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忧心如焚，胡文虎的请求虽然不无道理，假如国库盈实，由国家赔偿一笔钱也就算了，但眼下蒋介石就算有满足胡文虎请求的心，也没有这分力。国币贬值，该谁负责呢？让国家银行按照存钱时的币值来结算，也就是要由国家赔偿一笔钱。蒋介石虽然大权独揽，这件事却没法裁夺。

胡文虎派儿子面呈信函之后，没等到下文，愤懑之余，只得作罢，他对于兴办千所小学的事也热情丧尽。他想我胡文虎愿将所有存款捐出来办学，政府都不赞成，那能怪我吗？他从此绝口不提兴办千所小学的事。那时还时常有一些不知内情的兴建小学的委员会和当局，来信给胡文虎，希望继续拨款，以利兴建之事，胡文虎心里赌气，置之不理，连信都懒得复就在国币价值一落千丈之际，国民政府于 1947 年 8 月 19 日，以处分命令颁行一种新币制——金元券。命令规定，公民不论官商军民何等身分，一律应将所有的旧法币，限于 10 月 20 日前兑换成金元券，逾期不兑，则成废纸；公民凡存有港币、美金、英镑、叻币等外币，一律限于 9 月 30 日之前兑换金元券；公民凡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也当一律于同期限内兑换金元券。这一限期后改延至 10 月 31 日，这其中包括金银项链、戒指、各种钻石、珍珠、宝石等珍贵首饰也都须兑换成金元券。若有违犯，则以触犯和破坏金融之罪论处。

这项法令一颁布，举国上下尤其是平头百姓甚感惶惑不安。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黄金白银哪舍得去换那前途未卜的金元券，不换，被官查出，则要按律量刑，换了，则不知那金元券是否也和法币一样将大钱化小、小钱化了？

国民政府此举实为孤注一掷。蒋介石为使法令切实执行，封他的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特派员，严守“八·一九”防线，又封他的妻舅宋子文为广州经济督导特派员，固守西南各省的经济大堤，那时宋子文正担任广东省主席。

蒋经国手持尚方宝剑走马上任，在上海中央银行挂起“上海经济督导特派员办公处”的招牌。蒋经国调用他在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任教育长时所训练

过的 1200 名青年团员，组成“戡乱建国工作大队”，在百老汇大厦办公，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

市民们有目共睹，蒋经国为“督导经济”日夜奔忙，不辞辛劳，这使得他们相信国民政府的确是下了大决心要搞好金融，蒋经国治新赣南大刀阔斧埋头实干的工作作风也使人对他很信眼。因此，初期那些日子，市内各银行门口，只见换金元券的市民排着长队，非常踊跃。

当时蒋经国所要“督导”的大致是三件事：其一，管制物价，使所有的物价保持在颁布法令的 8 月 19 日那天的价格，不得涨价，这就是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其二，统管物资，严禁巨商大户囤积居奇导致生活必需品短缺；其三，打击投机，控制所有证券、紧俏商品和一些大仓库，稳定市场。

起先，蒋经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干得有声有色，但是好景不长，“八·一九”防线只挺立了两个多月便自行崩溃了。盖因蒋经国虽有尚方宝剑在手，却奈一个个软钉子不得。

蒋经国所碰的第一个软钉子，是代表浙江财富的地方势力，这些浙江巨商大贾掌握了大量物资，蒋经国和他们斗法的结果，是上海市场上市民的生活必需品开始短缺，物价稳定了，却没有东西可买。

蒋经国所碰的第二个软钉子，是家家户户的主妇。这些主妇看见市场紧张，自然要将柴米油盐拼命地囤积起来，以备一家人的生活。这一种囤积甚至比巨商大贾们的囤积还要厉害。

蒋经国所碰的第三个软钉子，是来自蒋家王朝自家的。上海市场上的大量物资，半数以上是孔宋两家的，蒋经国原想给孔家大少爷一点颜色，来个大义灭亲，棍子刚举起来，却被宋美龄给挡住了。

“八·一九”防线二垮，金元券马上直线跌落。1000 万元国币，只值港币 18 元 4 角。胡文虎存在国内银行的 3000 万元国币，到这时候已是大贬特贬，仅仅值港币 55 元 2 角正。气得胡文虎大骂老蒋。

第二十一章 匿藏美金 虎子遇打虎队

胡好由南京来到上海，夜夜灯红酒绿，宾朋酬酢。朋友借给他3万美金，他不想兑作金元券，准备携带出境。胡一虎机场被搜身，永安堂分行又遭搜查。胡好3万美金不翼而飞少了1.5万元，是失窃？何方有道之贼，窃钞只窃一半？

胡好替父亲到南京去谒见蒋介石，面呈请求信，没能得到下文，胡好自己在南京倒闹出一连串故事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胡好滞留在港。后来他由香港偷偷回到内地，在桂林和重庆都住过一段日子。这期间，胡好结识了许多政界人物，尤其是军统的大小头目，跟他混得很熟，关系十分密切。据说胡好那时候花钱如流水，他在内地能够支取得到的钱，他全都支用光了。

胡好的钱也算没有白花。抗战胜利后，父亲胡文虎由于在香港日治时代受到日本人“优待”，永安堂照常营业，赚了个盆满钵满；并且还应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邀约，赴日本东京一行，令国人误解或费解，不能原谅。报刊舆论界对他的“媚敌”之嫌大肆抨击，予以制裁的呼声很高；二公子胡山还被政府通缉。多亏胡好在政界和军统等处多方活动，替父亲胡文虎解释、证明，并使通缉胡山的命令得到取消，才保得一家平安。而这一切胡好都是瞒着父亲进行，他深知父亲倔犟的脾气，假如他知道别人对他的怀疑和蔑视，他必将如一头愤怒的狮子般不顾一切朝别人扑过去，那势必将把事情弄得更糟。

胡好的性格与父亲胡文虎迥然不同。虽然父子俩都是事业心强，很有魄力和开拓精神，但是胡文虎为人认真，脾气倔犟，胡好则为人随和，宽容大度。在花钱上，胡文虎是锱株必较，分文要用在刀刃上，胡好则恣意挥霍，有多少用多少，对朋友有求必应，极其慷慨大方，朋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波士”。

胡好晋谒过蒋介石之后，由南京来到上海，一道随行的有他的尚未成人的弟弟胡一虎。上海有胡好的许多酒肉朋友，兄弟俩在上海逗留了10几天。

这期间恰逢蒋经国在上海出任经济督导特派员，组织“勘乱建国工作大队”，人称“打虎队”，胡好、胡一虎两位“虎子”巧遇“打虎队”，惹起一场风波。

胡好极爱结交、玩乐，在上海玩得开心，夜夜灯红酒绿，宾朋酬酢。他的一位极有财势的朋友知他豪爽大方，花钱如流水，丢给他3万美金，叫他只管随意用，到香港还他即是。胡好并不缺钱，要钱只须在上海永安堂支取来用，但不知怎么他还是收下了这3万美金，并准备带到香港去。

胡好知道带外币出口是犯法的，就到南京路汤必生皮箱店里订做了一个带夹层底的手提旅行箱。旅行箱取来之后，他便将3万美金一沓一沓铺在箱底的夹层里。胡好这样一番折腾之后，觉得自己把这旅行箱携带去香港应当不成问题。这并不是他觉得自己藏钱的手法多么高明，而是他的确有些有恃无恐，他是胡文虎的儿子，到南京晋谒蒋总统来，送他上飞机的朋友都是军统的人物，谁能把他怎样？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胡好订好了回香港的飞机票，许多朋友挽留他，让他多住几天，但是胡好的弟弟胡一虎在香港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学校早已开学，不好再延宕。临到启程这天，胡好还有些事尚未办妥，一帮朋友又再三劝他多留几日，胡

好是个极随缘的人，经不住朋友的热情挽留，便答应送弟弟胡一虎先回香港，自己再逗留两天。

胡一虎走的那天，胡好和几位军统的朋友送他去机场。胡一虎只带着两只普通的旅行袋。乘客依次经过机场检查处，都只按照例行手续，打开行李袋，略略翻查一下就过去，唯独轮到胡一虎，检查人员格外仔细。两只旅行袋翻了又翻，查了又查，连袋里都翻开来看。检查过旅行袋，又对胡一虎搜身，衣袋裤袋翻了个遍，前后足足折腾了半小时。胡一虎还是个14岁的少年，平常很少出门旅行，哪见过这种世面，早吓得面色发白。这天的检查人员特别多，除了海关的关员，还有几位穿西装的青年，想必是所谓“打虎队”的队员了。这些人没有从胡一虎身上搜到犯禁的东西，显然很失望。

为什么这些人今天只专门冲着胡一虎来？胡好觉得好蹊跷。他看着这检查的阵势，真是出了一身冷汗，庆幸因为朋友们挽留而没能跟胡一虎一道走，不然今天那一箱子美金，准要招致大祸。以前只听说蒋经国厉害，这回是亲眼目睹了。

那时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在证券交易所做事，被“老虎队”查出有投机取巧的勾当，蒋经国便下令把他拘留起来。杜月笙有个大徒弟叫万墨林，有囤米之嫌，也被“老虎队”抓了去。

杜月笙的儿子，蒋经国都敢打，胡文虎的儿子，蒋经国难道不敢打？胡好越想越害怕，那一箱子美金还带不帶出去，就很犹豫了。

假如把那3万美金送到中央银行去换金元券，那他就很吃亏，金元券存在上海毫无用处，将来如何贬值还很难说，而他回到香港又要拿港币或美金归还那位朋友。胡好左思右想，实在为难。

胡好从机场回到国际饭店，便接到永安堂伙计打来的电话，告知永安堂来了几个警察，要搜查永安堂，并让他赶紧去一趟。

胡好听了电话，心里不由慌乱起来，因为他那只藏着3万美金的旅行箱还放在永安堂里，要是查出来可怎么办？他奇怪的是自己藏美金的事一直都是很隐秘地进行的，为什么却好像被人察觉，死死地把他盯上了。

胡好叫了辆车开到南京路后街宁波路永安堂。几个检查人员问过他姓名，向他出示了检查证，便在永安堂内开始搜检。

永安堂有三层楼，店面不大，货物也不多，检查人员对那些东西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是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到了楼上，当看见胡好那只新定做的旅行箱，检查人员一下便围上去，像发现了重大的猎物。

汤必生皮箱店的皮箱做得再巧妙，也经不住一群检查人员训练有素的细致检查，那一沓沓美金转眼就从箱底夹层里掏了出来。

“这是你的箱子吗？”检查人员问胡好。胡好只得故作但然状回答：“是的。”

检查人员便说：“你难道不知道，无论什么人，凡有外币，都要拿到中央银行去兑换金元券？”

胡好说：“知道，我正打算这两天去兑换的。”

检查人员说：“你把美钞藏在这特制的旅行箱里，不像是兑换，倒像是要携带出口似的。”

胡好说：“岂敢，我如此存放，只为防人偷窃而已。”

检查人员便开始清点那堆美金的数目。胡好不知将得到怎样的处置，心想可能要强制他把美金全部换成金元券。

检查人员清点完毕，问胡好一共有多少美金，胡好回答有3万。检查人员一愣，重新点过，却只点出1.5万，胡好肯定他说是3万，检查人员再数一遍，还是1.5万。

这就奇怪了，胡好想。3万美金是他自己亲手一沓一沓放进旅行箱的夹层内的，怎么会变成1.5万呢？难道是有人偷走了？可是既然要偷，何不3万元一起偷走，却还留下整整一半呢？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之中又有故事。

第二十二章 奸贼密报 胡好险陷申城

对永安堂再次搜查的结果，从货仓里搜出一包美金，14500元，与胡好所税的数目只相差500元。审讯结果令胡好大为震惊，他自认为的心腹之人竟是窃贼。事情还不仅仅如此，这当中蕴藏着更大阴谋。申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胡好见大势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蒋经国急命擒拿“虎子”，胡文虎得知隔海怒骂。

上海永安堂这时候真像是在上演一部惊险侦探故事片，一干检查人员刚搜出胡好旅行箱里秘藏的美金，还不知如何处置，却忽然又冒出了一个美金失窃案。

检查人员只好又重新询问胡好。这一回询问得更加细致，从永安堂的经理到煮饭的大师傅，个个都查问了一番。

上海永安堂规模不大，只发售四种药品，所以店员不过三五个。不久前店里人事上有些变动，经理胡桂庚因与胡好在诸多事情上意见不合，拂袖而去：胡好征得父亲同意，从外地新调来一位姓郑的青年作上海永安堂的司库。这位郑司库是胡文虎发妻郑氏的胞侄，即是胡好的表宛弟，自小受到胡家的提携，来上海之前是在汕头虎标永安堂任司库之职。郑司库时年不过20来岁，性格沉稳，不苟言笑，胡好感觉他是个忠实可靠的人，又是自家亲戚，因此十分信任，把他当作心腹。

当胡好把美金藏入旅行箱时，就是郑司库在一旁帮忙。

检查人员问胡好：“你藏放美金时，除了郑司库，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好回答说：“只有郑司库一人。”

检查人员若有所思地点头，稍顷，提出还需要对永安堂重新检查一遍。

胡好说：“无所谓，想查就查吧。”

检查人员这一次检查和上一次全然不同了，上一次似乎就是专冲着胡好的那只旅行箱来的，这一次，他们对永安堂内所有的房间都进行了认真搜查，货柜，衣橱，各个抽屉，店员的床上床下，被褥，皮箱，尤其是郑司库的房间，更是搜查得滴水不漏。然而都一无所获。

最后搜查货仓。货仓里堆满了一包包虎标良药，检查人员竟在一包包装得如虎标良药一样的纸包里，拆出一包美金来。

检查人员一清点，一共是1.45万美元，跟胡好所说的数目，只相差500美元了。

检查人员认定郑司库有重大嫌疑，把他带去局里审讯。胡好虽然觉得郑司库不可能是行窃者，但此时的胡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也无心替郑司库申辩了。

审讯的结果令胡好大为震惊，他特意自汕头调来的心腹，原来却是他为自己找来的一颗定时炸弹，1.5万美元正是郑司库偷的、藏的，郑司库已经花去500元。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郑司库不但是一个窃贼，还是一个阴谋家。

回想一下，为什么胡一虎在机场受到特别检查，为什么紧接着警察局就派人搜查永安堂？为什么那些人对整个永安堂的兴趣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好的行李箱上？

原来，郑司库在偷窃了胡好行李箱中的美金之后，就到警察局去密报，说胡好暗藏美金在特制的行李箱里，准备偷带去香港，这只行李箱现还放在

永安堂。警察局获此密报，对郑司库大加奖赏，立刻通知有关方面对此事密切注意，严加防范。

胡一虎在机场受到特别检查，就是因为机场得到警察局通知的缘故。机场搜查落空，胡好临时退票，改期离沪，警察局担心已经打草惊蛇，怕胡好会把美金转移，因此赶紧抢在胡好之前，赶到永安堂搜查。

那么，郑司库为什么要到警察局密报胡好，又为什么3万美元只偷一半？

郑司库的确机关算尽，无奈天不成之。当时郑司库眼见着胡好将3万美元亲手藏入行李箱夹层之中，料想他临行之前不可能再取出来重新点算，郑司库便偷一半，留一半，然后到警察局去密报。警察得了密报，必然通知有关方面，胡好到飞机场那一关肯定过不了。行李箱中的美金一旦被搜查出来，1.5万也好，3万也好，横竖是全数充公，胡好决不会申辩他的美金不止1.5万，而是3万，说得越多，还不是越增大自己的罪名？这种情况下，出事的人都是恨不能往少处说的。如此，郑司库所偷的1.5万美元不就神不知鬼不觉稳稳当当地落进口袋里了吗？并且，郑司库还可以在警察局那儿须得一笔辑私奖金。

郑司库聪明反破聪明误，最后是鸡飞蛋打，美金没有捞着，还坐了几个月监牢，丢了永安堂这份美差。怨谁呢？都只怪自己一时利令智昏。郑司库感到很羞惭，愧对亲戚朋友，从监牢里出来之后，便悄然离开上海，回缅甸老家去了。

却说那时警察局的检查人员把郑司库带走，又将前后查得的2.95万美元归还胡好，办好交代手续，责成他尽早去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元券，胡好总算有惊无险，回到国际饭店。

胡好的朋友们琢磨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觉得形势险恶，“打虎队”连日来在上海翻云覆雨，申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蒋经国铁面无情，假如不小心再碰上他的“枪口”，岂不倒霉。

朋友们决定赶紧送胡好离开上海这是非之地。那时候上海飞香港的航班很多，胡好的朋友跟航空公司很熟，要买机票随时随刻都能拿到。

10月5日清晨，也就是胡一虎离沪，永安堂遭搜查的第二天，当大上海还在睡梦中尚未醒来，胡好在两位朋友陪同下，悄然离开国际饭店，为了不引人注目，连行李都没有携带，开车直奔飞机场，临时买了张机票，夹在乘客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飞离了上海。

就在胡好搭乘的那架飞机起飞只一个多钟头之后，一十“打虎队员”分兵两路杀向胡好的业务据点永安堂和他下榻的国际饭店，他们是奉蒋经国之命来擒拿“虎子”。

原来，警察局在审过郑司库之后，即按照手续，将胡好匿藏美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记于卷宗，呈交经济督导特派员办公处审核，以示处置之法。

上海经济督导特派员办公处的主任秘书高理文，是蒋经国留学苏联的同学，也是蒋经国在赣南做专员时候的得力干将，此番蒋经国来上海“督导”，特招他来助一臂之力。高理文看过警察局送来的卷宗，认为胡好匿藏美金企图偷带出口呈未成为事实，但是他藏有美金不换金元券却是事实，他在汤必生皮箱店定做夹底皮箱，将美金藏于箱底，那也是永安堂店员亲眼所见、人证物证俱在的事实，如果对这种明知故犯挺而走险的行为不律之以法，势必违背了“打虎”精神。但是胡好毕竟是个有相当背景的人物，对他如何处置，高理文不敢擅作主张，高理文便呈明事情经过和拟定处理办法，转请蒋经国

裁度。

蒋经国就是在胡好悄然离开国际饭店之际的一大早，于他的办公桌上看到这宗案件，他当然不知道胡好正由他的两位朋友陪同坐着小车奔往飞机场。

蒋经国为了提高“打虎队”的威信，使金融管制能够有效地贯彻实行，的确是想打几个真“虎”给世人看看，杀一儆百。现在出了个胡好，是家喻户晓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儿子，虽算不上“老虎”，但也是个真“虎子”，要能把他打了，全国甚至海内外都要轰动，其宣传惩戒作用自不待言。

蒋经国决心一下，立刻下令捉拿胡好归案，从严惩办。

“打虎队”接利命令，当即分赴国际饭店和永安堂分行，不料两头扑空，便又追赶到飞机场，一番查询，才知胡好已先一个多钟头飞往香港。

“打虎队”虽然没拿到“虎子”，可是打“虎子”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广见于报端。胡好回到香港，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身后那段凶险，庆幸之余还难免心有余悸。那详情却不敢告诉父亲。

胡文虎是从报纸上读到胡好在上海险遭“打虎队”扣留的消息，他感到惊愕，胡好没跟他说起过。胡文虎叫来胡好，询问详情，胡好深知父亲的脾气，仍然不敢把真实情形说出，只道是并没有这回事，只是蒋经国故意拿他做文章搞宣传。胡文虎听了，雷霆大怒，即命人写一篇他对于“打虎队”拘捕胡好一事所发表的重要谈话。

那篇谈话怒气冲天，对蒋经国一番痛骂，说蒋经国在上海恃势凌人，为所欲为；并对国币贬值致使人民怨声载道表示愤慨；断言金元券也将于世无补，回天无术。谈话中有不少火药味很浓的言语，譬如说，你蒋经国恃势也好，凌人也好，休想欺凌我胡文虎，胡文虎是天不伯地不怕的。又说，我胡文虎有的是钱，几万美元，于我好似沧海一粟。还说，虎标良药是利国利民良药，如果政府再这般无理取闹，我的虎标良药就不再运销国内……胡文虎这篇谈话见诸报端之后，蒋经国在上海便立即予以回敬。蒋经国当妓不会跟胡文虎直接对骂，而是让他的主任秘书高理文开记者招待会，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对胡文虎的谈话给予反驳。

高理文的答记者问言及，胡好企图偷携美金出口，人证物证俱在，是不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政府对于违犯金融管制的人，以法治之，理所应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能因为是胡文虎的儿子就可逍遥法外；现在胡好本人逃往香港。作为父亲的胡文虎不但不对其儿子严厉督责，反而对政府执法人员大肆谩骂、对国家的金融政策极策诋毁中伤，实在是无理取闹。有关华侨领袖之尊。高理文的话也是毫不客气，他说，视数万美元如沧海一粟，那是你胡文虎自己的事，但可以肯定，没有万金油，不会死人。

一场隔海吵骂拉开了阵势，料想你来我往回合少不了。然而“八·一九”防线的崩溃来得出人意料得快，距胡好事件的发生相距仅10多天而已。胡氏父子那时已请好律师，准备在上海大打官司。可是“打虎队”的人马突然间销声匿迹，胡氏父子想打官司也无从打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十三章 不堪赤字 虎报关门大吉

胡氏家族家大业大，人手不敷，胡文豹的幼子胡清德初出茅庐，担负《星洲英文虎报》大业。晴天一声霹雳，《虎报》停刊，连两位主笔都蒙在鼓里。10年间，《虎报》亏损赤字累计达800余万元。胡清德年轻气盛，不肯认输，又筹办一份中文《虎报》。

胡好乘运报机到马来西亚北部视察业务，遇难丧生之后，《虎报》由谁来主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按照胡氏家族不成文的家规，“肥水不流外人田”，社长从不聘用外人，只能由家族中的成员担任，可是这时候胡氏家族已是家大业大，人手不敷。长子胡蛟主持《星洲日报》，还须借助外力辅助；次子胡山主持《星岛日报》，因为与一位著名影星过从甚密，挥霍无度，致使《星岛日报》严重亏损，被胡文虎盛怒之下赶出大门，流落到新加坡，在纳西路玉器馆后面的胡氏家族收容所吃闲饭；胡文虎的两个女儿胡仙、胡星，和两个儿子一虎、四虎，尚在学校念书。胡文豹的长子胡请才在永安堂总行统管一切事务；胡文豹的女婿李志诚则在管理新开张的崇侨银行。只有胡文豹的幼子胡清德刚刚成年，尚未担任具体职务，于是胡清德便继承了胡好的位置担任《虎报》的社长。

胡清德会驾车，刚刚上任，年轻，有热情，时常亲自驾了运送报纸的卡车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去视察业务。可是他实在不懂得办报，《虎报》勉强维持着。

1959年7月31日，新加坡《英文虎报》突然在自己的报上，于头版显吾位置，刊登一则通告，正式宣布该报于明日，即1959年8月1日停刊。

通告说：“我们遗憾地宣布，《星洲虎报》和《虎报星期天》将于明日即1959年8月1日起，暂时停止出版。……我们要向所有我们的读者、广告客户和拥护者在过去给予我们的支持致谢。”

《虎报》突如其来宣布停刊，真如晴天里的一声霹雳，不但使外界惊讶唏嘘，就是本报的内部员工也毫无思想准备，停刊之前竟没何一点风声，就连该报的两位主笔也完全蒙在鼓里，他们7月30日晚上还在为该报撰写第二天即7月31日的社论，懵然不知道自己原是在炮制“最后的晚餐”。

7月31日早晨，《虎报》的员工们照例按时来报社上班，可是奇怪，报馆大门紧闭，却有保安在旁把守，大门之侧贴有停刊通告，才知道有停刊这回事。7月31日该报刊出的停刊通告，是于凌晨5点，突然将排好的新闻抽下，而改发停刊通告。

员工们在紧闭的报馆门口领到了解雇通知书，由于事先毫无心理准备，突然遭到解雇，员工们非常激愤，想要跟报社问个明白，讨个说法，又不得其门而入，于是三五成群，在门外徘徊、议论。解雇通知书声明发给遣散费一个月，员工们大感不满，要求多发几个月。报社显然无力满足员工们的要求，只有把报馆门紧闭了。

新加坡《英文虎报》从诞生到停刊，经历了9个春秋，在英文报同业竞争相当激烈的新加坡能够生存9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由于《虎报》停刊突然，其原因令新加坡马来西亚各界人士关注，猜测很多。其实，《虎报》停刊，既非受到外来压力，也非其他方面的影响，而纯粹由于报社本身经济状况所致。

《虎报》是由胡好主持创办的，创办之初，胡好野心很大，决计要超越本埠最具影响和实力的英文报《海峡时报》。因此筹办时期就定下高规格，购置各种设备都唯求先进、新式，耗资甚巨，最令人瞩目的一项是胡好为及时快捷地运报，竟购下两架运报的飞机，成为当时东方报业破天荒的一件壮举，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就可想而知。

《虎报》出版之后，员工的薪资和经常开支也为数很大。据内中人说，报社员工人数竟达 250 余人之多，会计室就有 10 多个工作人员，该报负责人对于各方介绍的员工，尽量接纳，以致冗员繁多，人浮于事。一般来说，办英文报，因为是用机器铸字和排字，简单快捷，不像中文报纸的排字工作那么繁难，因此办英文报，人手本应比中文报少一些，但《虎报》却非如此，员工既多，付出的薪资也就很多，这也是造成亏损的一个原因。

《虎报》诞生之前，新加坡既有多家英文报，其中以《海峡时报》、《马来亚报》最具声望。这两家报纸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内容丰富，新闻翔实，评论颇具权威，编排和印刷都很不错，因此发行量很大，广告收入自然不少，营业上颇有盈余。《虎报》一问世，就面对如此强劲的同业对下，注定业务发展举步维艰。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显然在于该报的上持者。《虎报》初创时期，胡文虎尚还在世，在经济上可以作强有力的后盾，社长胡好也很有魄力。假如胡好活着，也许《虎报》不至于关门。一家英文报，由胡清德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全权负责，实在显得势单力薄。无论是学识经验还是经济实力，抑或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魄力，胡清德都没有到能独挑大梁的时候。况且此时，胡氏家族成员之间都是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各谋生存和发展，胡清德有困难，胡氏家族中其他成员也无暇伸手扶助。《虎报》关门也就在所难免了。

《虎报》自筹办到停刊，10 年间，累计亏损赤字为叻币 800 余万元，胡清德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尤术，除了关门大吉，恐怕别无选择了。

胡清德到底年轻气盛，《英文虎报》办垮了，不肯认输，又筹办一份《中文虎报》。

《英文虎报》刚刚关门，遣散员工，清理债务，一团乱麻还没理出头绪，债务都没办法理清，胡清德又哪来的钱办《中文虎报》呢？据说是“贵人”相助。胡清德不单得到有关方面强有力的支持，香港方面还有铅字和印刷工具等运到吉隆坡去，作本入股，还有人免费赠与新闻纸。胡清德突然间关了新加坡《英文虎报》，又突然间在吉隆坡开了《中文虎报》，也算是很会折腾的了。

《中文虎报》在吉隆坡出版，起先是下午出版的晚报，后来又改为早上出版的日报，许多马来西亚各地的代理人和通讯员，都是《英文虎报》的旧人，印刷机也是由新加坡搬来，原先印《英文虎报》的。

胡清德原以为《英文虎报》难以发展，主要是因为缺乏读者市场的缘故，那时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发行量全部比英文报纸的发行量大。可是胡清德的《中文虎报》推出后，由于缺乏特色，内容平淡，仍然没有赢得读者青睐，广告等业务也因而无法展开，亏损严重。原先寄予厚望给予大力支持的各方面大为失望，不再鼎力相助。《中文虎报》也就后继乏力，终于步《英文虎报》后尘，关门大吉了。

胡清德两次失败，无法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再呆下去，只好到香港去投奔他的堂姐胡仙。胡仙起初让他主持《香港英文虎报》，后来《香港英文虎报》

归了胡好的儿子胡督东，胡仙便让胡清德改任《星岛日报》的负责人。

第二十四章 捷足先登 金铺当铺破产

胡文虎几十年如一日做万金油生意，这时他的一个同乡好友却怂恿他另辟蹊径，创办银行。胡文虎派了胡文豹的女婿李志诚任崇侨银行经理。李志诚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实际上林师万就成了真正的经理。林师万自己有金铺、当铺，自然是胳膊时要往里拐……

胡文虎的事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从全盛走向式微。战后的永安堂再不曾有新的发展，不但如此，由于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国内政权易主，永安堂在中国国内的巨大市场完全丧失，注定了万全油再不可能超越昔日的辉煌。与战时的热闹火爆相比，这时的永安堂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况味。

而胡文虎几十年如一口都是做的万金油生意，从未涉足过别的领域，此时他年事已高，当然也不可能再转行去干别的事情。

这时他的一个问乡好友却怂恿他另辟蹊径，创办银行。

这位同乡好友名叫林师万，自己开有金铺、当铺，在新加坡的当行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金铺和当铺部经营高利贷以及私人存放款，实际是一间未注册的金融公司。

林师万虽然有些实力，但资金当然远比不上胡文虎雄厚，所以很多时候免不了有求于胡文虎。因为是客家老乡，胡文虎还是乐于相助的，钱财上你来我往，两入的交情便越来越深。

因为战后永安堂明显地冷清了许多，胡文虎便采纳了林师万的意见，在当时的新加坡银行街罗敏中路开办了一家银行，名叫“崇侨银行”。

取名崇侨银行是因为客家人的会馆叫作崇正总会的缘故。崇侨银行顾名思义就是客家人的银行。

胡文虎用人的原则一向是“任人唯亲”，这恐怕是基于他“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老土的观念，他甲人首选当是胡氏家族中人，其次便是同乡同姓的人，外人即便丙有才干，胡文虎也断不肯启用，大概是不能信赖的缘故。胡文虎的这个作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事业的发展。

胡文虎派了胡文豹的女婿李志诚任崇侨银行的经理，也不管李志诚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反正是自家人，放心。

李志诚对银行业务一无所知，所以只好找林师万来做业务主任，实际上林师万就成了真正的经理。

林师万有他自己的金铺、当铺，进行着不挂牌的金融业务，这些业务显然与崇侨银行的业务相冲突。

有一次，银行有一项抵押放款债务，借款人逾期无力偿还债款，只好割舍他向银行抵押的房产。那是一个仓库，胡文虎想要收买，谁知林师万竟利用银行业务主任职务之便，捷足先登，抢先购得，令胡文虎不胜恼怒。胡文虎因此罢去林师万的银行业务主任之职，并且一刀两断，从此不再给他任何金融上的支持。

林师万失去胡文虎的支持，他的私人存放款业务陡然发生挤兑，周转不灵，金铺当铺竟同时破产。林师万气急攻心，一病不起，辞世而去。

林师万在金融上毕竟是个内行，崇侨银行失去他做业务主任，生意更趋冷淡。崇侨银行除了做永安堂和《星洲日报》的生意，其他营业几乎谈不上，因而始终没能有大的发展。

胡文虎这时候作为南洋客属总会会长，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客属总会的各项事业。

客家先祖原是居住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因战争与社会动乱，多次大批南迁，先是徙居于今赣南、闽西、粤东三省边区以及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后又移居海外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日本、美洲、澳洲等地。东南亚一带客家人最多，有“海水到处都有客家人足迹”之谓。

客家人的特点是极能吃苦耐劳，顽强敢拼，并且很团结。

早在 20 年代，虎豹兄弟研制成虎标良药，稍有盈利，便捐资兴建了在缅甸仰光南勃陶的永定会馆。这个永定会馆，成为缅甸的客家华侨聚会的场所。

1923 年，新加坡客属华侨组织总会兴建会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款最多。谢佐芝主编的《世界客属人物大全》有记载：“尤其胡文虎胡文豹昆仲之慷慨解囊，大力资助，巍峨壮丽之会所，遂于 1926 年春动工兴建，1928 年冬得庆落成。”

后来，南洋客属总会正式成立，胡文虎被公推为第一任会长。

胡文虎积极领导，大力捐赠，使南洋客属总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总会自办华文学堂，开设图书馆，成立体育部、俱乐部、福利互助部，还附设招待所招待外地来新加坡的客属同乡住宿。南洋客属总会一时名扬天下。

20 年代中期，胡文虎在新加坡初步发达，赴香港开拓业务，首先就捐助巨款，推动和组织香港崇正总会。

那时香港崇正总会正积极筹备自建新会馆，所筹购地与建筑经费距所需相差尚巨，胡文虎得悉，慷慨捐资两万元。

香港崇正总会后来成为占香港人口 1/3 强、近 200 万客家人的总团体，也是海外几千万客家人的联络中心，这其中胡文虎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5 年，胡文虎蝉联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这期间，他独资捐办民众义学，将总会二、三、四层楼辟为教室。总会聘有教职员工 30 人，分日夜班授课，学员 1500 名，一律免缴学费，胡文虎和总会承担全部教育费用，目的在于对广大客属华侨及子弟普及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尤其是惠及那些由于贫困而无缘迈进学校门槛的人。

1937 年，胡文虎和总会其他领袖组织策划，推动东南亚各地组织了 52 个客属公会，各客属公会隶属客属总会，而总会成为当时南洋各地客家社会团体的总机构。

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文虎带领南洋客属总会广大成员，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总会和所有公会迅速开展起援助祖国抗战的群众活动。

在 1939 年 3 月召开的各地公会代表大会上，胡文虎发表演说，号召广大华侨积极筹赈，“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大会期间共筹得抗日义款 30 多万元。

胡文虎同时又是香港崇正总会会长。作为香港崇正总会会长，胡文虎为维护香港民众特别是客属人士的正当权益，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香港沦陷期间，面对日寇暴虐横行，胡文虎不畏强暴，坚决斗争。当他被拘审讯，已本人问他：“你就是鼎鼎有名的南洋华侨领袖胡文虎？”

胡文虎坦然回答：“我就是。”

日本人义问：“你是否大力出钱捐助中国政府抗日？”

胡文虎毫不回避，直言道：“我是中国人，爱国是我的天职，当然要出钱捐助政府抗日。”

亲友得知，无不为他后怕。胡文虎却说：“打起客家人的旗号，拿出客家人的硬气，我浑身是胆.有什么好怕！”

马来西亚檳城客属公会成立于 1939 年。由于没有会所。缺乏活动场地，会务难以开展。1948 年冬，胡文虎到檳城访问，席间谈及建造会所之事，胡文虎表示极力赞成，他说：“一个公会，没有一个立脚之地怎么成，建会所是件大事，一定要想办法建成。”胡文虎说着，当场便捐款 1 万元。

在胡文虎的激励下，客属人士也纷纷为建造会所出钱出力。公会成立筹建所委员会，募得建所基金 5.7 万多元。

1950 年 10 月 22 日，檳城公会会所大厦终于落成，胡文虎亲自赶来剪彩，该大厦因设计合理，礼堂宽敞，设备完善，且地点适中，交通方便，因此当地凡有庆典活动、婚姻喜庆或文化展览，都前来租借，为公会增加不少收入。公会因此得以扩展会务，为什会多作贡献。

第二十五章 笔墨官司 得一人得天下

李星可一气之下，投奔胡蚊，却没想到吃了大亏，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堤内损失堤外补”，李星可到处兼职。李星可打破惯例，把本地问题作为他评说的主要对象。“星洲”扶摇直上，“南洋”挑起笔战，声讨“星洲”主笔“挂羊头卖狗肉”，驾了两个月，才知做了傻事，付出三四十万元，为“星洲”主笔作了宣传。

胡蚊在吉隆坡的收获令他大喜过望，一篇3000字的短文《向全马华人进一言》，不但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取消了对《星洲日报》禁止人口的禁令，改开绿灯，并且还拨得一块50英亩的廉价地皮，允建印刷所，办马来西亚版。

得一人即得天下，胡蚊懂得人才至关重要。回到新加坡，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位给他炮制《向全马华人进一言》的笔者李星可网罗到《星洲日报》来。

胡蚊先与李星可商量，让他兼差，李星可并不立即答应，只说看看是否得空。

事情发生却分明是该着胡蚊走运。没过多久，李星可突然接到法新社总部通知，把他调往吉隆坡，新加坡将另行派人。李星可已经在法新社服务10年，在重庆时他是法新社的原始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在新加坡创办法新社东南亚总分社的创办人。总部毫无商量余地的决定令他愤怒，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投奔胡蚊。

李星可事先也没跟胡蚊谈好职位与薪水，因为辞职来得突然；而他又自以为《星洲日报》给他的薪水无论如何不会低过法新社，因为他已经给《星洲日报》立下大功，胡蚊本来就想把他网罗过去，并且他的资历和名声都明摆在那里。

等到发薪的时候，李星可才有如当头一棒，《星洲日报》给他的薪水还不及法新社的1/3。

李星可到这时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并且由于他不是客家人，他的名义只是“副”主笔，李星可明知吃了大亏，但一时又没有更好的“槽”可跳，他毕竟对“星洲”有功，胡蚊对他还是要恭敬几分的，强过到别的地方。

李星可一旦呆下来，心也就平静了。《星洲日报》每周不过三篇社论，对他来说只需3个钟头三瓶啤酒就可以对付。其他时间他只管到外面兼职，“堤内损失堤外补”。他很快就有了好几份职，在师资训练班教标准华语；在南洋大学当教授，接替凌叔华的职位；在法国总领事馆当新闻顾问。

《星洲日报》的社论长时期以来都处于一种“聋子的耳朵——摆样”的状态，不过是一些见风使舵、模棱两可、八面玲珑的文字。现在李星可一来，社论完全换了一副新面孔。李星可是个多产作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内行的新闻记者，他的文章直面现实，针砭时弊，敢怒敢言。《星洲日报》有了这样的社论，摇身一变成为南洋华侨社会中一份绝无仅有的“替华人说话，为华人社会服务”的报纸。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向来把华人视作“华侨”，报纸对“华侨”只谈国际新闻和中国问题，对于本地事件绝口不提。《星洲日报》的新主笔却打破这种惯例，把本地问题作为他评论的主要对象，即使是谈国际问题，

他也是以亚洲人的眼光出发，立论不俗，所见独到，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业史上都是空前的。

自从有了这位新主笔，《星洲日报》的发行量眼看着扶摇直上，直逼一直排在它前头的《南洋商报》，势头劲猛，似要与《南洋商报》争夺本地报坛之魁首。

《南洋商报》眼见着《星洲日报》春风得意，十分眼热，起初是旁敲侧击冷言冷语，后来终于按捺不住，挑起一场公开的笔战。

战后以来，英国殖民地当局排斥华文华教成为既定政策，新加坡马来西亚分别独立之后，华文华教的维护与发展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星洲”的立场是主张华人不能数典忘宗，极力提倡华语，维护华文教育。“南洋”是华文报，当然不会公然反对，但在“读者来函”中，却系统地对华校作出诸多批评。“星洲”针对“南洋”刊发的“读者来函”，一连写过两篇社论，对“南洋”提出公开质问，使“南洋”无言以对。“南洋”的总编辑恼怒之下，每天拨出一整版作专栏，“声讨挂羊头卖狗肉的社论主笔李星可”。

“南洋”公开抨击“星洲”的新主笔。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质问李星可为什么一面提倡华语，一面却要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外国去留学？

这本来是成问题的问题，可是社会上不乏一些无聊：“读者”，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见报，“南洋”一声“号令”，他们便纷纷上阵。

有些小报为了争取读者，便也加入笔战，站在“南洋”一边，把矛头指向“星洲”的新主笔。

李星可面对雪片般纷飞的谩骂等闲视之，他对人说：“你在路上走着，路旁的狗会莫名其妙冲着你吠叫，你总不能因为它冲着你吠叫，你也趴下来朝它吠叫吧。”

“星洲”对于四面喧嚣和“围剿”镇定自若，根本不予理睬和还击。“南洋”则每天登载一版或半版“声讨”檄文，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有人给“南洋”算了一笔帐，若以广告收费的价目计算，“南洋”至少付出了三四十万元，为《星洲日报》的新主笔作了免费宣传。难怪“星洲”悠悠然“坐以待批”呢。

由于笔战热闹，“南洋”和“星洲”两家报纸在这段时间里发行量急剧增加，“星洲”原先发行量略低于“南洋”，这时候增长到与“南洋”不相上下。等到“南洋”察觉形势不妙，主动鸣金收兵，《南洋商报》已掉了两三万份，这两三万份当然是由他们亲自拱手转赠给了《星洲日报》。“星洲”不战而胜，一跃而执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华文报坛牛耳。

李星可在此之前便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家喻户晓的人物，虽然他的文章那时候就常见于报刊，也难免跟人发生一些笔墨官司，但使他真正出名的却是另外一个机缘。

有一件令海外华侨轰动一时的大事，那就是中国拍摄的越剧舞台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放映。海外华侨终于能在电影院里看到来自家乡的传统舞台片，思乡的游子无不像能回国探亲似地激动不已。《梁山伯与祝英台》因此在电影院连映3个月，打破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影院有史以来的上座率。

《梁山伯与祝英台》触发了一股“思乡热”，一时间，中国戏剧影片大量涌入，各电影院争相放映，英国殖民当局虽然决定把引进《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商人驱逐出境，也无法遏止这股热潮。几乎任何一部中国戏剧影片都

能在电影院放映一两个月。那时候还风行“刘三姐”的山歌唱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上市便是几十万，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刘三姐”的歌声。

可是在南洋懂中国传统戏的人不多。李星可却恰好对中国古典戏剧颇有研究，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中国古典戏剧的文章头头是道，通俗有趣，深入浅出，大受读者欢迎。随着中国戏剧片的流行，李星可的介绍文章也流行，人们读了他的介绍文章去找电影看，或者看了电影找他的文章读；他谈戏的文章，大学生剪下来夹在课本里当课外读物，店伙计剪了来贴在墙上闲来玩读。李星可这个名字自然不胜而走。

现在，承蒙《南洋商报》两个月大加挹伐，这个名字更是捧得如日中天。《星洲日报》也因此销数日增。

但是，李星可这支神笔也给“星洲”惹过不少麻烦。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有关南洋大学的问题，一次是《给苏联大使的一封信》。

南洋大学的问题发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各自独立后不久。教育部有一份尚未正式发表的文件《王质武南洋大学报告书》，忽然在本地华文报上刊登出来。它的内容是工虚武替教育当局审查南洋大学的教学水准的报告。这位出身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父母皆是华文教育界知名人物的王质武教授，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南洋大学偏重华文，不适宜于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种族社会，应该改华文教学为英文教学。

李星可针对这一观点，在“星洲”社论中指出，如果王教授说得在理，他的结论同样也应适用于当时的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大学只用英文教学，应该改成用什么语言教学呢？如果说只有英文才是沟通中西、学习科技的唯一最佳工具，那么日本、西德、苏联、法国等国家的科技并不逊于英美，某些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大学里并不用英文教学的，他们为什么不改作用英文教学呢？

“星洲”一连两篇社论抨击王质武的报告书，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当局担心问题闹大，马上召集各华文报负责人开会，宣布“王质武调查委员会”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分家以前任命的，他的报告书未经合法手续正式发表，先行在报刊披露，是不合法的，这个报告书已经过时，不再生效，各报从此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另一次是苏联的《消息报》、塔斯社以及《真理报》先后抨击东南亚华侨不是中国的就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李星可立刻发表《致苏联大使的公开信》，质问苏联当局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种族主义者”？

苏联大使向新加坡当局提出抗议。当局遂警告“星洲”主笔，是想吊销公民权，还是让报纸关门？

其实，李星可本人无党无派，非左非右。他自幼上的洋学堂，后来又留学西欧，久居南洋，是人你“二毛子”的那种华人。

但是《星洲日报》报头上印着一条标语：“唯一替华人说话，为华人社会服务”。李星可作为《星洲日报》主笔，他的责任心和社会良知使他朝着“星洲”的宗旨去努力，他的确是在这样做，“唯一替华人说话，为华人社会服务。”自从李星可担任主笔，印在《星洲日报》报头上的这条口号不再是一句空话。

《星洲日报》因此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胡文虎在新加坡的实业当中，《星洲日报》由亏损赔钱一变而为赚钱最多，竟胜过永安堂和崇侨银行等纯盈利单位。

第二十六章 妻妾成群 晚年多得贵子

对于胡文虎在她之后纳娶三位太太，郑炳凤从不嫉妒，所以三位太太对她都很敬重。胡文虎凡有对外应酬或出席大的场面，总是携陈金枝同往，所以外界的印象，陈金枝倒更像是胡文虎的“第一夫人”。第三位太太是胡文虎一见钟情所得，但她对胡文虎却是冷若冰霜。然而槟城传来佳音，三太太喜怀身孕，胡文虎对这迟来的儿子将信将疑。第四位太太起先只是“地下太太”，生下一女，始由“地下”转向公开。

胡文虎一生娶有四位妻室，元配郑炳凤，庶室陈金枝，其后有黄玉谢和邱秀英。一共有五子二女，儿子胡蛟、胡山、胡好、胡一虎、胡四虎；女儿胡仙和胡星。

胡文虎 24 岁结婚，元配郑炳凤是广东惠阳客籍人，生长于仰光。郑炳凤是一位贤德的女人，她和胡文虎结婚时，永安堂尚未发达，她不但要承担所有家务，还要做制药包药等工作。她体格健壮，孔武有力，勤劳俭朴，为人随和，是一位典型的贤内助，因此胡文虎后来发达之后，对这位糟糠之妻一直非常敬重。

胡文虎娶了庶室之后，对郑炳凤便敬而远之，因为毕竟郑炳凤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对于胡文虎生意上的事无法给予更多的支持。而郑炳凤对胡文虎外面的事也从不过问，她是个不多事的女人。虽然胡文虎发达之后，郑炳凤夫贵妻荣，养尊处优，但待人接物依然是平易谦和，从不居高自傲，盛气凌人。

对于胡文虎在她之后纳娶的二位太太，郑炳凤从不嫉妒，有说有笑地共同生活，如姐妹般相待。所以三位太太对她也很敬重。

胡蛟和胡山是郑炳凤的儿子。郑炳凤生就宽容随和的性格，所以对儿子管拉也不甚严格，放任自流。胡蛟后来任《星洲日报》社长，还算出息。胡山曾经任《星岛日报》社长，因为吃喝玩乐，挥霍过度，被胡文虎盛怒之下撤职查办，扫地出门。

郑炳凤中年之后，生活悠闲，时常是和亲友打打麻将，或是去看赛马，消遣度日。她后来患上糖尿病，很受折磨。胡文虎 1954 年逝世，那之后郑炳凤一直被病魔所纠缠，辗转呻吟于病榻，直到 4 年之后才永远地结束这痛苦。

胡文虎的第二位太太是陈金枝。陈金枝性情温柔，聪明灵秀，最懂得胡文虎的心理和脾气，对胡文虎体贴入微，照料周全，因此深得胡文虎的宠爱。胡文虎凡有对外应酬或出席大的活动，总是携陈金枝同往，所以外界的印象，陈金枝倒更像是胡文虎的“第一夫人”。

陈金枝有一儿一女，儿子胡好，女儿胡仙。胡好也是五个儿子当中胡文虎最宠爱的一个。胡好具有非常难得的人缘，在家里跟兄弟相处都十分融洽。他待人接物很有办法，能够因人而异，避免冲突和积怨；在外面他更是朋友遍天下，他对朋友很肯帮助，只要他袋里有钱，一定是有求必应。胡好不仅人缘好，而且非常能干，有魄力，具有开拓精神，可惜不幸年轻早逝，不然胡文虎的事业当在胡好手上更加发扬光大。胡好遇难身亡，使陈金枝精神上受到重创。

胡文虎年轻时候就好动，喜欢出外游历，这种习性伴随他一生。他每年总有几次到各地去旅游。这种时候多半是由陈金枝作他的旅途伴侣。1935

年，胡文虎曾作为期4个月的环游世界之旅，全部旅程都是陈金枝相偕而行。

陈金枝虽然是胡文虎最亲密的生活伴侣和旅途伴侣，胡文虎事业上的事她却从未涉及，她既不知道永安堂生意和各地星系报的经营，也没有在名义上挂个董事、经理之类。可是后来，胡好死了，胡文虎也过世，陈金枝不得不从后台走到前台。陈金枝这个过去连写字楼都没有坐过的女人，一下子成为香港永安堂的老板，虎标永安堂药厂的主持人，香港星系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香港虎豹别墅的主人，胡文虎遗产的管理人。是苦是甜，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

胡文虎的第三位太太黄玉谢，据说是胡文虎一见钟情所娶，在胡文虎的四次婚娶中本来是最有浪漫色彩的一次，可是，这位太太后来竟是最失宠的一位。

据胡文虎自己说，他是经朋友介绍认识黄玉谢的，最初见面，只觉她如花似玉，异常美貌，不禁怦然心动，之后俩人便在槟榔屿同居。

黄玉谢是位很有个性的女性，性格十分倔犟，对胡文虎从不殷勤逢迎。胡文虎不喜欢她这种冷若冰霜的性格，很快就失去初识时的好感。胡文虎说他有一次将要远行，特来跟她辞别，还带着不少钱打算给她作零用，谁知她听了毫无反应，似乎胡文虎的远行与她并不相干，胡文虎见她如此冷淡，想要给她的钱都懒得从口袋里掏出来了。

胡文虎后来在槟榔屿给她租了座房子，让她独住，嘱槟城永安堂分行每月支给她家用开销而已。

谁知到1937年，这位几乎是打入冷宫的太太，忽然给胡文虎生下一个儿子来，这个喜讯真来得石破天惊，胡文虎时年55岁，自24岁结婚，娶有两房妻室，一直没有生育，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领养。

这个迟到的儿子连胡文虎自己都难以置信。那时候胡文虎因家庭中发生龃龉，生气之下便去槟榔屿消愁解闷。他在槟城住在豪华的酒店里，只是小作逗留，便又返回新加坡。3个月后，胡文虎忽然接到槟城来信，说他在槟榔屿的太太已经喜怀身孕。胡文虎大喜，立刻叫人把永安堂附近武吉巴梳街的一座房屋布置停当，将这位三太太从槟榔屿接到新加坡住下。

当这个孩子呱呱落地之后，亲友们纷纷登门向胡文虎表示祝贺，一些朋友闹着要胡文虎请满月酒，大家好热闹一番。胡文虎竟然半真半假地予以推托，他说，他去年那次去槟榔屿，是住在酒店，只有一天下午，到过三太太那里一趟，怎么那么巧，就生下孩子了呢？日子算来虽然不错，但我还是将信将疑的，所以这回是不打算请大家喜酒的，大家要饮酒，就等下回吧。

胡文虎这样坦率，在场的朋友听了不由哄然大笑。

为这个孩子，外界还引起一番骚动。当时永安堂从德国订购了一种药丸，由永安堂包装一番推向市场，名为“虎标大力丸”。这种药丸在报纸上广做宣传，说是壮阳补肾，强筋健骨，经常服用，定能生儿育女，子孙繁衍，许多人读到这些宣传，讥笑道，有这样好的药丸子，胡文虎自己为什么不多吃几粒，也好多生几个儿子出来。不料胡文虎的三太太还真生下一个儿子，大家服了，想这“虎标大力丸”还当真有用，那些听怕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训的华侨，一时间争相购服，以期多生子女。

更奇特的是，黄玉谢于1937年年头生下一子，时隔不到一年，也就是该年年尾，居然又生下一子。这一下胡文虎真正开心了，因为这第二个儿子是百分之百信得过，是他胡文虎的亲生子，第二个既然信得过，那第一个也就

假不了。

这一回儿子满月时候，胡文虎大宴宾朋，一连三晚设筵欢庆，第一晚宴当地官绅名流，第二晚宴社团领导和工商界人士，第三晚宴亲戚同乡。席间伴有文艺表演，歌舞升平，杯觥交错，热闹非凡。这也是胡文虎有生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宴客。

两个儿子取名为胡一虎和胡二虎，与养子的取名有所区别。

母凭子贵。自从生下两个儿子，胡文虎和一家人对黄玉谢都刮目相看。原先三太太住的地方，胡文虎难得光临，现在却是常来常往了。两个儿子相差不到一岁，长大一些后，便一般高矮，像双胞胎一样，有时候胡文虎在办公室里，一对娇子相携而来，胡文虎总是欢喜得丢下手头的工作，跟他们亲亲嘴，与他们亲热一阵。

胡一虎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在香港、新加坡、缅甸、美国读书。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学习驾驶飞机。他后来以 6000 美金购置一架小型飞机，自己单独驾驶，由伦敦飞到新加坡，沿途多是未航行过的地方，上落一共有 60 余次之多，充分显示了敢想敢作的冒险精神和现代人独立有为的个性。

胡二虎则不幸死于非命。新加坡沦陷前夕，日军敌机日夜轰炸新加坡。那时胡文虎在香港，胡文虎的大太太、二太太等人和胡文豹一家人都逃往缅甸，胡文虎的三太太却执意要留在新加坡。胡一虎因自小多得大太太郑炳凤抚养，由郑炳凤带去缅甸。胡二虎则随同母亲留在新加坡，遭轰炸之厄而亡。

胡文虎的第四位太太邱秀英，自 1939 年与胡文虎同居，起先一直是位“地下太太”，后生下女儿胡星，遂由“地下”转向公开。

邱秀英生下胡星之后，又生有一个男孩，名叫胡三虎。胡三虎也是夭亡于新加坡沦陷时期。那时胡文虎不在新加坡，胡文虎家人多去了缅甸，邱秀英虽早已正式纳娶，但与胡氏家人甚少往来联系。胡三虎生了病，起先只是有些腹泻、但因为战时混乱，难以求医，邱秀英身旁又无人相助，孩子照料不周，终于病重致死。

邱秀英后来还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胡四虎。

胡文虎最感痛心的是在战争期间丧失两个亲子，每言及此，他都深感憾痛。他说，生死虽是有命，但也是人谋不周，倘若家室和谐，一道同行远避，此灾祸或可避免。

第二十七章 家有千金 只作布衣素食

胡文虎两只耳朵又厚又长，奇人异相，令星相术士无不称奇，视作富可敌国者。除了到外地各分行去视察业务，胡文虎随身带的钱一般不超过5元。家中饭桌上出现率最高的是咸菜汤和“蚬鬼子”。为了不浪费，胡文虎一口气吃下6个鸡蛋。

胡文虎的身材算不上魁梧，但健壮结实，给人短小精悍之感。他面容端正，五官显赫；尤其是两只耳朵，又厚又长，可谓奇人异相，令星相术士无不称奇，皆曰此人定为富可敌国者。

胡文虎文化程度有限，幼时回福建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因为贪玩，所学不多，等觉悟到要读书时，又回到仰光，替父亲掌理药铺，之后更为生计和生意所迫，与读书无缘了。

胡文虎发达之后，对于读书就没什么兴趣了，因为他觉得赚钱比读书更为重要，“有钱能使鬼推磨”，读书有什么用呢？有了钱，读什么书的人都可以为我所用，我又何必去读死书和死读书呢？但这只是就他个人而言，对社会而言，他认同“富国强民，教育先行”的主张，鼎力支持祖国和海外华侨的教育事业。

胡文虎时常在华文报上发表文章，论及自己对于时局和经济、教育、慈善等问题的看法，那些论述大致代表他的观点和意见，执笔却不一定是他了。

胡文虎看报只看大标题，与他没有关系的新闻，他一般不看内容。对于别人的来信，措词平白浅易的，他或许一读，如果跟他舞文弄墨，四骈六骊，让他读来吃力，不知所云。他会顺手把信扔进字纸篓。所以，一般来信，总是秘书摘要读给他听；至于复信，也全是由秘书根据他的意思拟写。没人看见过胡文虎握管挥毫。

但是没人能替代的事，胡文虎一准干得很漂亮。比如签名，“胡文虎”这三个字，就没谁能比胡文虎本人写得更漂亮。单看他的签名，人家多半会认为他是个书法家。

胡文虎对于给虎标良药做广告宣传和捐助公益事业，时常是千金一掷，十分慷慨大方，而自己的日常生活却朴素节俭。除了到外地各分行去视察业务，胡文虎随身带的钱一般不超过5元。

胡文虎家里的饭桌上很少见山珍海味。胡文虎最喜欢吃的是酸咸菜汤、“蚬鬼子”（盐水浸的蚶子）和盐水螃蟹。每当有同乡亲友来新加坡或香港看他，他总是请人下次来时带上家乡的“蚬鬼子”和咸菜。亲友们诧异地问他：“你现在有的是钱，干嘛还要吃乡下那种咸菜？”

胡文虎说：“我小时候在家乡，那时还很穷，总靠‘蚬鬼子’和咸菜下饭，所以养成了习惯和嗜好。请你们带点来，一则是让我回味一下幼年的生活，二则是让我的子孙们也尝一尝艰苦的滋味。”

胡文虎早餐在家里吃，有时午餐或晚餐有应酬，需要去茶楼酒店，点的菜食也很俭省。原《星岛日报》编辑部主任罗铁贤在回忆他和胡文虎的交往时说：“记得我同他和一位国民党官员去茶楼午餐，每人只吃两小碟小菜，结帐时仅值三四块钱。”

胡文虎爱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活还是简朴一点好。”

胡文虎虽然有线，但对一分一厘还是看得很重。据说有一回他和太太陈

金枝到外地游览，住在一家大饭店。饭店的早餐，除了牛奶面包之外，每人的定量还有3个鸡蛋。那天陈金枝胃口不好，一个鸡蛋没碰，胡文虎已经吃下自己的3个鸡蛋，又接着把陈金枝的那一份吃了，一口气竟吃下6个鸡蛋。胡文虎并非特别爱吃鸡蛋，只是他认为吃也要付钱，不吃也要付钱，不吃就太浪费，不划算了。由此可知众人常说的“有钱人最小器”确实不假。

胡文虎衣着也很简朴，在家只穿一般的衬衫，外出才加一件普通的西装。

胡文虎对子女严加管束，他有一句家教名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时偷针，大了偷金。苟不教，性乃迁。年轻人如果不严加管束，前途是不妙的。”

胡文虎的日常消遣只是打打麻将，对音乐、跳舞、电影、赛球、赛马、下棋等等，都没有兴趣。他每天清晨起床，早饭后9时半，到永安堂办公，中午之后，便要放松一下，在新加坡是去威基利俱乐部，在香港则去太极俱乐部，与会员们作“围城”之戏。他的牌艺算不上高超，但打得多了，算是很娴熟；但他打牌的涵养却不够深，喜怒皆形于色，碰到手风不好的时候，脾气也就不大好了。

胡文虎生长于缅甸，缅甸是一个信佛教的国家，而胡文虎的父母又都是佛教信徒，胡文虎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中，对于佛教便比对于其他宗教来得亲近一些。

胡文虎虽然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对于佛教事业还是大力赞助的。胡文虎捐给建筑佛寺的钱相当可观。在缅甸，和尚的地位很高，一般人参见和尚。都要跪拜，胡文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在缅甸只有三个和尚年尊道高，值得他崇拜。别的和尚则没有资格让他行跪拜礼。

胡文虎认为值得他崇拜的三个和尚，其中一位是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是一位百龄高僧。胡文虎认为一个人能活到100岁是不容易的，虚云老和尚已经超过100岁，而且精神矍铄，耳聪目明，非得道者，莫能达到如此境界。所以虚云老和尚每次来香港，胡文虎都要主动去拜访他，并迎接他到虎豹别墅，设素筵款待，真是毕恭毕敬。

胡文虎是个有名的孝子。在海外，凡是胡文虎自建的别墅或风景园林区，都建有他父母的纪念碑，上嵌双亲遗照。胡文虎每天清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走到父母纪念碑前鞠躬。每年清明节，胡文虎无论身居何地，业务多么繁忙，都一定要赶到仰光去祭扫父母坟墓。胡文虎在这一点上是深受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浸淫，他认同“不敬长者不成大事”的古训。他到晚年还经常吟诵幼时在私塾里习读的《弟子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胡文虎是个家乡观念极重的人，到晚年，他思乡之情更切。胡文虎一直保持与家乡的联系，他每年收到来自家乡的信竟达万封以上，这些信件中，一半以上是跟胡文虎要钱要物的。

抗战胜利的那年秋天，胡文虎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双挂号家书。他拆开一看，这并非一封普通的书信，白纸黑字只是一首歌谣：

中川是个好地方，
村头有座马山岗；
村尾狮象霸水中，
唯恨虎豹不回乡？

这首歌谣勾起胡文虎绵绵的思乡之情，令他心潮起伏，夜不能寐。

胡文虎的家乡中川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清代文人胡治青写的《试韵蛟潭八景》，赞的就是中川的风光。中川八景乃是：峰岗宝塔、汤阁温泉、骊岭朝凤、马山夜月、灌头渔钓、寨尾樵歌、西觉纳凉、月亭观月。此刻，胡文虎仿佛又回到家乡美丽的山光水色之中，他听见了家乡情意深长的呼唤，是啊，“虎豹”怎能不回乡？他要给美丽的家乡再添上动人的一笔。

胡文虎激动地与家人一商议，那首来自家乡的歌谣就变成了：

中川是个好地方，
材头有座马山岗；
村尾狮象霸水中。
虎豹别墅建中央。

家乡人的呼唤，使胡文虎动了归乡的念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不妨在中川建一所虎豹别墅，既可作晚年归乡的栖身之所，又可为家乡增添一景。

胡文虎很快找人设计出了建筑图案。那是一个中西合璧，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建筑，江南的小桥流水，客家的雕梁画栋，唐代的院墙古塔，南洋的自动喷池，融为一体，相映成趣。

不久，胡文虎就把设计图连同 45 万元建筑费汇寄家乡。

第二十八章 溘然辞世 慈善精神永存

胡文虎是一个富翁，更是一个慈善家。有钱使他能够行慈善，行慈善使他得以名扬天下，名扬天下使他能够赚更多的钱，更多的钱使他行更多的慈善，扬更大的名……胡文虎一生有幸处于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之中。

要说有钱，像胡文虎这样的富翁，普天之下还是不乏其人的，但是有钱而能够宅心仁慈，广济博施，惠利群众，爱国爱乡，如胡文虎者，则属罕有。胡文虎是一个富翁，更是一个慈善家，据估计，他一生的慈善公益捐款多达2000万美元。这在他所处的时代，近乎天文数字，有钱使他能够行慈善，行慈善使他名扬天下，名扬天下使他能够赚更多的钱，更多的钱使他行更多的慈善，扬更大的名，胡文虎的一生有幸处于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之中。

胡文虎曾对人说：“鄙人先父临终时，曾以‘做人要有志气’为嘱。鄙人自少即谨记此言，欲做有志气之人，以求不负先父之遗训。然则志气从何立起，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自从永安堂业务稍有寸进后，即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

对胡文虎来说，这绝不是一些场面上的话，而是他毕生都在身体力行的信条。

胡文虎给自己规定，永安堂每年听得赢利25%，作为救国救灾公益事业的费用，后来又由25%增至60%。

胡文虎兴学义举，为中外所瞩目。他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职志，长期捐赠巨款兴办各类学校。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学院、广州仲恺农业科学院、上海女子体育专门学校等大专院校，都先后得到过他的赠款。1935年10月，胡文虎率领马来亚华侨选手赴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时宣布，捐资350万元，10年内。（后改至5年）在全国各地兴建1000所小学。至1938年，全国各地相继建成小学300余所，耗资150万元。因日寇入侵，抗战爆发，建校工程遂告停顿。1938年9月，胡文虎将建校余款200万元转购抗日救国公债，表示抗战胜利后，将凭债券向银行抵押现款，继续进行建校。

胡文虎广济博施，热心慈善公益事业，更为世人称道。早在30年代，胡文虎就捐建了南京中央医院、汕头医院等12所医院，他还捐款创办和资助许多国内外的慈善事业机构，如九龙安老院、广东老人院、福建惠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广州圣婴医院、云南炳蔚孤儿院、仰光孤儿院等。

1934年11月，胡文虎在参观上海淞沪广慈孤儿院时，当场慨捐1500元为孤儿添置冬衣；同年还捐资11万元兴建上海市立卫生化验所。胡文虎对祖国民众缺乏医药的惨状分外忧虑，他致函国民政府，计划在全国兴建县级医院100座，并捐资1000万元汇回国内。胡文虎还多次赈灾救难，济弱扶危，捐赠巨款筑路修堤，修葺名胜古迹。

“忠于国家为先”，“爱国观念不敢后人”，这是胡文虎处世的座右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胡文虎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救国筹赈活动中，他首捐2万元支援东北军民，后又电汇1万元给十九路军，作为淞沪救伤之用，并且捐赠虎标良药、纱布等大量急需物资。1941年2月20日至3月1

日,胡文虎飞抵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式,捐献国币 250 万元,其中 200 万元为战伤救济款,50 万元认购抗日公债。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日历史研究巨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书,对此有所记载:“新加坡爱国华侨胡文虎,一次慷慨捐国币 200 万元;爱国华侨李俊承捐款 10 万元购买救国公债;华侨领袖陈嘉庚按月捐献国币 2000 元,直至抗战胜利为止。”

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胡文虎捐赠的财物为华侨之最。英国人称之为“巨大的天文数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财政部授予胡文虎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也颁给胡文虎海陆空军一等褒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胡文虎三次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表示竭诚拥护新中国人民政府,愿一如既往为祖国的公益事业尽力,他在给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信中写道:“中南区友人来港见告,政府为免除通货之多,举办折实胜利公债案,国民党多年之通货膨胀弊政,已洗劫全国同胞资产,压榨人民,使尽成赤贫,遂有现时商业萧条、社会不景之现象。文虎对救济社会,既多年尽力,兹于政府展开新政,自当竭诚拥护,率先提倡。已令广州永安堂即日首先认购公债两万份,略表提倡……”

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胡文虎的爱国呼唤未能得到回应。

然而胡文虎却仍然执着地献身于人类的慈善事业。50 年代初,胡文虎又为槟城岭六拜中山中学、修道院学校、公民学校、客属公会、永定同乡会等捐款上百万港元,为曼谷三仑学校和泰国肺病医院捐款 50 万铢(泰币)。

1953 年 7 月,日本九州发生大水灾,灾情惨重,胡文虎捐汇 1 万英镑救济难民。同年 12 月,九龙深水埗发生严重火灾,胡文虎捐款 3 万港币,办理急赈,并建石屋百间分配灾民居住。

著名客属研究专家谢佐芝在他主编的《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中,对胡文虎作了充分肯定:“公宅心慈善,慷慨好施,生平捐输社会慈善公益教育事业,不计其数;而且不分国域,不论宗教,咸沾其惠。以是善声远播,遐迩同钦,博获国际大慈善家之美名,世界各国政府,暨慈善机关赐颁勋衔奖章者不胜枚举。”

1954 年 9 月 5 日,胡文虎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医院溘然与世长辞。

自 8 月 30 日胡文虎入住檀香山医院,合众国际社檀香山分社逐日报道胡文虎的病况,足见世人对这位大慈善家的深切关注。

合众社檀香山 9 月 5 日的电讯传来噩耗:“星港报业巨子胡文虎先生在世界标准时间 5 时 45 分,突因心脏机能发生障碍,而在此间医院逝世,享年 72 岁。”

胡文虎于年初由太太陈金枝陪同,到美国波士顿的医院治病。住院期间,胡文虎一直念念不忘永安堂及他正在努力的各项事业。到 8 月初,胡文虎基本康复,医生劝他在医院再多住一星期,但胡文虎自我感觉良好,又急于返回香港,遂于 8 月 5 日即出院。

胡文虎写信告诉《星报》经理胡榆芳说:“余病状已佳,现计划于 8 月 19 日离波士顿,归港途中,拟于纽约、旧金山、檀香山及东京等地逗留数天,预期 9 月 3 日即可抵港。”

但是,这一回胡文虎却再没能回到香港。

当胡文虎乘坐的飞机经西海岸跨太平洋飞到夏威夷的檀香山,檀香山机

场上，200 多客籍华侨领袖，带领各界民众，早已恭候于机场，热烈欢迎。胡文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刚刚病愈，一路旅途劳顿，这时他走下舷梯，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兴奋之际，突感心力交瘁，胡文虎当即由机场被送进檀香山医院。

救治之初，稍告好转，然而一星期后，即 9 月 5 日，病情恶化，胡文虎终告逝世。

噩耗传来，会址在新加坡的南洋客属总会当即电报通告，“各地客属公会应即先下会旗（下半旗）志哀”。

许多国家外交使节纷纷发表谈话，沉重哀悼世界性的大慈善家胡文虎逝世。

《星岛日报》9 月 7 日发出悼文，沉痛悼念胡文虎先生，其情至深，令人感奋：现在胡先生虽不幸弃我们而长逝，但是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为着继承胡先生的事业，本报同人今后决当秉承遗志，以为民众服务。至于胡先生的伟大精神，就是仁慈与博爱，这一点如何发扬光大，乃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海内外仁人君子，与社会贤达，共同匡扶，以期于成，同人不敢，窃愿永久追随。

我们仅以此意敬告胡先生在天之灵，最后高呼：“胡先生精神不死！”

第二十九章 身后是非 拨开历史迷雾

就在胡文虎蒙受莫大不幸的时候，首先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的竟是陈嘉庚——这个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有意与之作对，之后又长期与之“斗法”的人。胡文虎在中国内地的名声遭到毁灭性破坏，他在内地的资产全部被没收。生前有口难辨，死后含不白之冤。一句盖棺定论的话，斟酌了38年。

胡文虎逝世后，按他本人遗嘱，遗体在檀香山火化，将骨灰携回香港。

长子胡蛟在新加坡闻讯，飞赴迎接，把骨灰带到香港；先安置于虎豹别墅，凭吊之后，葬于万金油花园，上竖一纪念碑，名为“灵照之塔”。一代华侨中的天之骄子，从此影寂声沉，长眠于地下。

但是对胡文虎一生如何评价，几十年来，是是非非，一直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抗战时期，胡文虎领导南洋客属总会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他本人捐资最多；但同是这个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时期受到日本人“优待”，并应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之邀赴东京一行。胡文虎是“爱国侨领”还是“媚敌汉奸”？这是争论的焦点。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地政府曾以胡文虎在日寇入侵时期有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合作的传说，而禁止胡文虎的行动自由。

就在胡文虎蒙受这莫大的不幸的时候，首先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的竟是陈嘉庚——这个胡文虎初到新加坡时有意与之作对，之后又长期与之“斗法”的人，这情形就仿佛一对不太和睦的兄弟，碰到外侮时却不由自主地一致对外，皆因血浓于水。

1949年1月，陈嘉庚的《南洋商报》刊出一篇社论，题为《为胡文虎请命》。这篇文章引英军降将都要在日军刺刀下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为例，为胡文虎作为一个平民身分的商人、慈善家，在日军淫威前更无反抗之力做辩解；然后假给英国人戴高帽子，称颂其让中东及非洲殖民地独立，对待其他殖民地人民的宽宏；然后提出质问：以胡文虎先生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关系之深，贡献之大，尚不能见容于英国政府，“则星马400万害群之马人，哪一个有保障？”文章最后指出：英国殖民当局不要以此一举“影响及英国政治的稳定性”，应权衡利害，“不要因限制胡文虎一人而引起全体华人的反感”。

这篇社论一刊出，《星洲日报》即将全文转载，以4号字全版刊发于头版，一时间轰动东南亚。英国殖民当局迫于压力，宣布解除对胡文虎行动自由的禁令。

胡文虎获得自由后，香港总督还给他颁发了圣约翰爵士勋位，这也就是英国殖民当局以他们的委婉的方式给胡文虎平了反，落实了政策。

而在中国内地，对于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时期与日本人的“亲善”关系，国人也多有误解或费解，不能原谅。许多报章都有要惩办胡文虎的呼声，胡文虎的儿子胡山还被国民政府通缉，幸亏胡好一向与军统人物关系不错，经多方周旋活动，惩办之事才不了了之。

1954年胡文虎在美国逝世之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潮的横行，胡文虎在中国内地的资产全部被没收。

胡文虎生前有口难辨，死后含不白之冤，只怕他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安息。但是偏见和错误的迷雾终究不能永远掩盖历史的真面目。

30年之后，中国内地排除“左”倾，拨乱反正，胡文虎始得公正的评论。

1983年1月31日，福建省领导人项南在接见香港《文汇报》负责人时说：“胡文虎是我的老乡，他是一个捐资兴学的爱国华侨。以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胡氏一家的评论是不公平的，对胡氏一家财产的处理是不当的。现在，我们正在纠正过去的错误。”

1984年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上海社会科学》的长篇文章：《济物利群，爱国爱乡——纪念胡文虎逝世30周年》。该文在详述胡文虎的功德之后，具有说服力地指出：“长期以来，胡文虎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忠于国家为先’、‘爱国观念不敢后人’的诺言，从而成为爱国华侨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1986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炎黄儿女》一书，其中《胡文虎：爱国是华侨的天职》一文，热情地赞扬了胡文虎一贯爱国爱乡的精神：“胡文虎先生虽然长期旅居海外，但他不忘祖国，总是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强大起来。他认为爱国是华侨的天职。”

1989年10月12日，在胡文虎的家乡福建召开了“胡文虎专题研究讨论会”，新华社当天向世界发布了消息，中国《华声报》也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的现场报道。这次会议，引起海内外瞩目，各报刊纷纷作了报道。

就是在这次“胡文虎专题研究讨论会”上，胡文虎研究专家蔡冬需在详述胡文虎爱国史实后，大声疾呼：“纵观胡文虎的一生，他视爱国为华侨的天职，他把祖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看成高干党派的利益，大量事实说明：‘万金油大王’、‘报业巨子’胡文虎先生，不但是精明的企业家、世界性的大慈善家，而且是杰出的爱国侨领。”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故乡就对它的海外游子有过中肯的评价，民国13年甲子重修的忠坑乡《胡文虎谱》这样写道：

尚义文虎公家传

公字文虎，序功之子，生于南洋缅甸埠。及长承父亲之业而益扩充之。创立永安堂药务及虎豹行大药局，所制药水、药油及药膏药粉等项，无不驰声远近，凡海内外之知名者皆争购之，是以数年之间身享富贵，现又移驻新加坡，建筑房屋，创立药局，与缅甸互相辉映。然公虽身处厚实，而待物爱人毫无德色（客家语谓毫无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之意。），如施医、施药及施棺、施衣、兴学堂、办报馆，以及修路筑桥等事，倾囊相助，不吝所求。岁甲子，梓乡米贵，又与重益、日初诸君谋设平糶，获益良多，人皆谓其富而好善，不以封殖自矜者也。于是乎传。

区区200言，写尽胡文虎一生，到底是故乡最知故乡人。

胡文虎的故乡金丰里，奇峰异岭，绿海茫茫，松青柏翠，泉奔瀑泻，灌木丰盈，山花烂漫。令地理学家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地球上与此同纬度的地区都是炎热干旱的“回归线荒漠带”，独有金丰里山青水秀，气候宜人。这里虽然地处偏僻，历代却出了不少大富翁、大学者和大政治家，可谓人杰地灵。

胡文虎一生都怀有浓郁乡情，他认为乡情不但能为他增添事业拼搏的力气，还能为他除病消灾。因此，胡文虎在海外发迹后，心头时常思念的就是家乡建设。晚年之际，他的思乡之情更为殷切。他在《永定经济建设》一文中深情写道：“文虎永定人也，虽年来因商务羁迟，别已多载。然主家坟墓所在，家族戚友所居，青梅竹马之交，渔牧田猎之地，回忆童年生活，即莫

不低头回想之。”

胡文虎辞世转眼近 40 年。时光没有磨蚀人们对这位为祖国和人民作出巨大奉献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的深刻记忆，他对事业的进取开拓精神，他爱国爱乡的执着深情，以及他悲天悯人的慈善心怀，在这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中，反而与日俱增地深入人心。

1992 年初春，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吴泽教授，以古稀之年，攀越层峦叠嶂的闽西群山，来到胡文虎的故乡永定县中川村，在胡文虎的故居“庆福堂”挥笔写下八个苍劲大字：“爱国侨领，汉史流芳！”

这是一位饱学历史、阅尽沧桑的老人对胡文虎的褒奖和肯定，也是祖国和人民拨开历史迷雾之后对胡文虎的认可和礼赞。

“人生就为一口气，佛爷也争一炉香。”胡文虎终于不枉一生的奋斗。胡文虎如若九泉有知，当感欣慰，可以安息了。

第三十章 承业有人 可叹后继乏药

她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女报人、一个女企业家，可是就在这时候，她分得了父亲的遗产，她身不由己被推向另一扇命运之门。关于胡仙的身世，很久以来一直是个谜。胡文虎的企业总司令部——永安堂，除了胡文虎本人经营，从来都是交托给他的侄儿胡清才。胡清才年纪轻轻登上永安堂董事长宝座，自是想有一番作为。

当父亲胡文虎于美国檀香山突然辞世，22岁的女儿胡仙还只是一个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大学生。

一个生长于豪门富家的闺秀，自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胡仙的世界一直是纯净而蔚蓝。她就读于香港圣士提反女校，极其喜爱绘画和文学，她的画作和文章已经显露出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天赋。这个清纯而娴静的女孩，自然满脑子只是幻想着做女画家或是女作家；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女报人、一个女企业家。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分得了父亲的遗产，获得了《星岛日报》、《星岛晚报》的全部控制权，她身不由己被推向另一扇命运之门，推向一条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不知深浅的人生道路。

关于胡仙的身世，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谜。以前曾经认为她主于缅甸仰光，是胡文虎的独生女，这一点已经被研究者否定，胡仙是胡文虎的养女，但是出生何处呢？

据一位在马来亚《华商报》署名为“长弓客”的笔者从各方面探悉，胡仙乃是马来西亚大山脚人，她的亲生父亲叫胡亚提，她的亲生母亲是泰国勿洞的华裔。当胡文虎领养胡仙时，胡仙还只有3个月大。

当年，胡文虎30出头，精力充沛，年轻有为，时常到马来西亚各地推销虎标万金油，和各地中药店结下不解之缘，非常受人欢迎。

有一回，胡文虎来到大山脚推销虎标万金油。胡亚提在大山脚开着一家中药店。当胡文虎把药品送到胡亚提的中药店时，偶然看见胡亚提才出生3个月的女儿。胡文虎那时已经抱养了3个儿子，胡蛟、胡山、胡好，还没有女儿。看见这个白白胖胖的女婴，胡文虎觉得十分可爱，心里特别喜欢，便开玩笑说，要胡亚提把这孩子送他做女儿。胡亚提没有拒绝，胡文虎便当真了，郑重其事跟胡亚提提出要抱养。

胡亚提也是客家人，跟胡文虎是同乡同姓，又因为开中药店，与胡文虎业务联系来往频繁，熟知胡文虎的身家品性。现在胡亚提见胡文虎一片诚意，便慨然答应。

一位著名的中医师、张姓客籍老前辈称，他是当年亲眼看着胡文虎把襁褓中的胡仙抱走的，他的药店就和胡亚提的药店斜对面，只隔三四间店面。

据知，这位张姓老中医和胡亚提是老友，他对胡亚提家中的大小事情都很清楚。

而这位张姓老中医还特别强调，关于胡文虎抱养胡亚提女儿之事，除他清楚之外，老一辈的永安同乡们也都知道得很清楚。

胡文虎当然没有想到，他从大山脚抱回的这个女婴，日后竟成为他七个儿女中最有出息、真正能继承和发扬他胡文虎所开创的事业的一位，可谓“一枝独秀”。

胡文虎的子女，照年序排列是：胡蛟、胡山、胡好、胡仙、胡一虎、胡

星、胡四虎。胡文虎逝世后，他的事业以及遗产自然就由子女们接管，这一切当然是按照胡文虎本人的遗嘱来办。

胡文虎的遗嘱，早在他逝世前 10 几年，就已到律师楼办好。胡文虎在遗嘱中有关遗产的分配，对于他的几位太太和他的儿孙是有所厚薄的，胡文虎对于所喜欢的人，遗产的配额明显多很多，而对于他不喜欢的人，遗产的配额则明显要少得多，二者之间的差额是相当大的。并且自遗嘱立下后，10 多年间，随着胡文虎对家人喜怒爱憎的变化，遗嘱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比如他对其个儿子做的事深感不满，便在遗嘱中将给他的遗产配额大大减少；或某个媳妇不够孝顺，家翁不便面责，他就暗中削减原拟定给她的遗产。如此，一份遗嘱改来改去，竟成为 10 多年来胡文虎对家人喜怒爱憎的晴雨表。

三个养子，胡好过早去世，不然，胡好生前作为胡文虎心中最宠爱的儿子，胡好当是遗产配额所得最多的一位；胡山由于一向胡天胡帝，不务正业，胡文虎对他厌恶至极，所以一分钱遗产也不给他。胡蛟分到了《星洲日报》、《星暹日报》，胡好的儿子胡督东分到香港《英文虎报》，胡仙则分到《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胡一虎、胡四虎和胡星因年幼或系庶出、没能分到太报接管。

四房室中，胡文虎明显偏向于陈金枝这一室，陈金枝是胡文虎最宠爱的太太，胡好、胡仙是陈金枝的儿女，也是胡文虎最喜爱最着重的一对儿女，因此陈金枝这一室所分得的财产比重之多，胡文虎的发妻郑炳凤都远不能比。胡文虎如此感情用事的结果，是为他的太太和儿女们留下了一桩日后轰动香港的遗产纠纷案。

胡文虎的亲生儿子胡一虎、胡四虎系庶出；胡文虎在世时，他们又尚年幼、因此胡文虎一向是把弟弟胡文豹的儿子当亲生儿子。胡文虎的企业总司令部——永安堂，除了胡文虎本人经营，从来都是交托给他的侄儿胡清才，胡清才是潮大豹的长子。

胡文虎的遗产相当一部分还分给了他的侄子。胡文虎去世后，按照遗嘱，胡清才继承了永安堂的董事长宝座，财政大权实际上就握在了胡清才一人手中。

胡清才像他的父亲胡文豹一样宏厚老实，头脑却不是太机敏、精明，但是不管怎样，“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年纪轻轻登上永安堂董事长宝座，还是想有一番作为。

那时候万金油已不是太红火，胡清才便想另辟蹊径，创制一种新药。这种新药名叫“虎油”，其实就是万金油改制成液状，用瓶子装。这种瓶装“虎油”并不新鲜，民国初年就流行过，那时叫“如意油”。

为了推销“虎油”，胡清才曾像当年胡文虎推销万金油一样，不借血本，大作广告宣传，但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虎油”只是万金油的改头换面，而非改良、进步，更不是什么新发明。

胡文虎在他那个时代知道通过办报纸等手段使虎标良药广为销售，与他同辈和同类的商人相比也算是先进的；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胡文虎却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广告宣传，虎标良药本身还须不断改良、进步，他应该成立一个医药研究室，延聘专家，根据时代发展、市场需要，推出新的拳头产品。

如果说推出新的拳头产品在胡文虎的时代还不至于迫在眉睫，到了胡清才接手永安堂的时候却是刻不容缓了。此时万金油已不能畅销，因为它丧失

了广大的畅销市场，不仅中国大陆，缅甸、印度、印尼等地方都发生了政治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有了自制的与万金油类似的药品，而永安堂除了万金油，后继乏“药”。

胡清才也许隐隐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对形势估计不足，对市场分析不够，错误地认为万金油不能畅销，是因为它已经过时，而消费者多会喜新厌旧，所以他便把万金油改头换面成“虎油”，企图以液体瓶装的新形式博得用户的重新青睐。这种换汤不换药、避重就轻的改革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胡清才大张旗鼓把“虎油”推向市场，可是市场对“虎油”的反应却冷淡得很。胡清才初次披挂上阵便摔下马来，然而这只是他悲剧的刚刚开始。

第三十一章 “太阳”出世 胡蛟再发横财

《太阳报》是胡蛟自父亲去世后，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从前的浪荡公子，而今变作雄调心万丈的事业家，福焉？祸焉？胡蛟经人介绍贷到巨款之后，并未拿来办报，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所大房子。人只知他会赌马，而不知他在做房地产生意。胡清才施展新招，成立“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结果是让胡蛟美美地发了一笔横财。

胡文虎逝世之后，胡蛟没有分到房产，他那时住的海滨别墅还是殖民地政府时代向政府租借的。胡蛟是分到一小部分现金，及分到新加坡的《星洲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报》、泰国的《星报》和《星泰晚报》的管理权。

胡蛟分得的这四个报纸都不赚钱。《星洲日报》是星系报业的王牌报纸，可是胡蛟接管的时候也不赚钱。胡文虎在世时，每年都要从永安堂拿儿子元叻币贴补，现在胡文虎去世了，永安堂由胡清才掌管，《星洲日报》再要赔钱，胡清才肯定是撒手不管的，况且永安堂本身也已经不赚钱了。

天无绝人之路，胡蛟在这困窘的关头找到了一个替他扭转乾坤的人，这就是李星可。自从李星可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星洲”的发行量直线上升，从一张亏本的报纸变为盈刊的大户。

“星洲”的巨大成功刺激了胡蛟办报纸的胃口，使池雄心勃勃，意欲扩大和发展办报事业。

胡蛟起先聘请李星可来，除了要他在“星洲”任主笔写社论，还曾经答应李星可，让他主办一份英文报。可是李星可任“星洲”主笔之后，他敢怒敢言的犀利笔锋虽然大受读者欢迎，却令政府当局反感，所以胡蛟对英文版出版准许证的申请一直没能够批下来。

这时候的《星洲日报》真可谓鸟枪换炮，非昔日可比。李星可因为曾经主持过外国通讯社，对于战后国际新闻界的技术改进有所接触。在他的建议下，“星洲”购买了英国和日本的设备，用有线电话线传真把“星洲”的电版直接电传到吉隆坡，在吉隆坡印刷，成了马来西亚版。吉隆坡的增改版面则用日本的照相排字机排版、改版和填补。如此，一是赢得了出版时间，二是节省了由新加坡到吉隆坡的运输费用。这一技术在当时的海外华文报业遥遥领先。

胡蛟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遂积极筹备英文版，名之为《东方太阳报》（Eastern Sun）。报馆地址设在林德金路永安堂的排屋里。这地方楼下从前是永安堂的仓库，楼上是永安堂的职员宿舍。房子虽然是永安堂的产业，报纸却不属于永安堂，而属于胡蛟个人，与胡清才没有关系。

《星洲日报》虽是作为遗产分给了胡蛟，但是经济大权却不在胡蛟本人手上，而是由胡文虎指定的继承人、星系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清才掌握。“星洲”每天的收入全部缴给崇侨银行，所有支出，一概由胡清才一个人签字。胡文虎这样安排，大概是对胡蛟不放心，怕他一味吃喝玩乐，胡天胡帝，败掉家业。

《东方太阳报》才是胡蛟自胡文虎去世后，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从前的浪荡公子，而今变作雄心万丈的事业家，福焉？祸焉？

《星洲日报》这时候不单在华人社会里家喻户晓，就是在外国新闻通讯

员和使领馆人员的心目中也成了不能不重视的本地人民的声音。几个重要的驻新加坡的外国使馆拍回本国的新加坡政情报告，常常只是《星洲日报》社论的整篇译文或摘要。日本东京的电视台每年的“一年回顾”节目照例都有李星可的访谈，而法国电视台也常常有这位“星洲”主笔的专题访谈节目。胡蛟借助“星洲”的声誉，经由一位日本政坛元老的介绍，在香港一家美国银行借到了400万港币作为办报资金，贷款利息只有年利四分，并且无需任何担保抵押。

同时，台北当局也给胡蛟以支持。一家兵工厂替他仿造了两部美国高斯式卷筒印刷机，一部送到吉隆坡，印《星洲日报》的马来西亚版，一部运到新加坡，印《东方太阳报》。

可是胡蛟从香港的美商银行贷到巨款之后，并未拿来办报。他用这笔钱在离市区中心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幢大房子，做起了房地产生意。这幢大房子后来转手变卖，成为一家中型的现代大旅馆。

胡蛟办报的事却一拖再拖，他并且以办报为借口向更多方面募股、借钱。当然，股是一份也没募到，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钱就会赌马。这多少是有点把他看扁了，其实他这时是在做房地产生意。而且他又借到了300万贷款，还是那家美国银行，还是年利四分。银行只是催他赶紧把报纸办起来。

胡蛟这时不好再拖下去，可是因为投资房地产生意的缘故，报纸还没出版，胡蛟的资金周转已是捉襟见肘。为了赶着出版，胡蛟的太太竟然要屈尊亲自动手布置报址，扫地抹窗。永安堂把林德金路的职员宿舍和仓库腾给胡蛟，铸字机和许多其他设备都是赊来的。

《东方太阳报》总算出版了。

因为当局不同意李星可任《东方太阳报》主编，由李星可介绍了一位总编辑主持“太阳报”。胡蛟依照“星洲”成功的经验，让李星可每周也给“太阳报”写一篇社论，跟本埠最具影响的英文报《海峡时报》唱对台戏，就好像当年“星洲”和“南洋”公然较劲那样。胡蛟并请人把《星洲日报》上的社论翻译了，转转转到“太阳报”。

“太阳报”的编辑部人马大多是原来《马来亚论坛报》的旧人，因为都是熟门熟路力报纸的人，所以办出“太阳报”来还像张报纸，但也仅仅是像张报纸而已，思想既不够活泼，视野也不够开阔。内容单调，枯燥无味。

那时候美国人跟越南人打仗，自是热门话题。李星可当然逮住这个话题大作文章，不料胡蛟竟冲他说：“什么题目不好做，专要做越南文章。”李星可真是个聪明人，立刻听出了胡蛟的弦外之音，社论才做了两篇，李星可便弃“太阳报”而逃。

细心的读者能够察觉，自“太阳报”问世之后，“星洲”在悄悄地变，除了社论还是锋芒依旧，别的版面无不陆续地转头向右看齐，言论之正统，俨然一份非正式的政府公报。

胡蛟独资创办“太阳报”，在胡氏家族中震动很大，这其中尤其是胡清才感到忐忑不安。胡清才辖下的永安堂、《星洲日报》、崇侨银行及大众保险公司四个单位，除了资本最少的大众保险公司略有盈余，赚钱多的只有胡蛟主持的《星洲日报》。《星洲日报》每年有400万叻市的纯利润。现在胡蛟另起炉灶，独立门户，胡清才自然感到难过和不安。

这时，胡清才身旁的帮闲谋士给他想出一招聚财的办法。当初胡文虎、胡文豹在世时，为便于管理起见，把所有永安堂名下的产业，包括药厂、药

店、报馆、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一切房地产业，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虎豹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现在何不蒋胡家的私人有限公司变成一个公众公司，公司发行股票，把股票卖给永安堂所辖各机构的现任职员和职工，每人限买1000股，每股1元叻币；胡氏自家人及亲友的股额则根据具体情况由董事长胡资周裁定。

永安堂所辖机构的职员和职工，据统计约有2000人，如果每人认购1000股，则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股额就增加叻币200万元。

认购股份时，胡蛟提出他全家要每人备认购100万股。胡蛟一家5口人，一下就购得500万股。

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股票正式发行，第一天在交易所开盘，是每股1.6元叻币。这个市价一直维持着，并且呈有起无落之势。胡蛟认为时机到了，他趁着“虎豹”新股旺市，一下把手里的500万股抛了出去。“虎豹”陡然大跌，由1.6元跌至8角，跌落一半，从此一蹶不振。

胡清才听人怂恿发行股票，可是他不懂得股市，不知道如何扶盘，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扶盘，这时候眼看着“虎豹”股一落千丈，也只能是干瞪眼了。

胡清才原是个老实忠厚的人，如果伯父胡文虎只是略给他留点薪资房产，凭着这点薪资房产，还有父亲胡文豹留下的遗产，他完全可以过着富足日子，安度此生，可是伯父胡文虎偏把永安堂大业这副重担交给他，压在他肩上，使这个老实人难以胜任，不堪其累。胡清才继“虎油”失败之后，又兵陷股市，他事业的自信心无疑受到重创，由此看来他日后自杀便并不突然了。

胡蛟这时美美地发了一笔横财，自是得意非凡。

第三十二章 登报拍卖 虎豹别墅谁属

陈金枝和胡仙母女俩，事先没有听见任何风声，陡然看见报纸登的广告，招人承买别墅和花园，震惊不已。再看广告所登的接洽处竟是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前去洽登广告的正是胡文虎的亲生儿子胡一虎，不禁万分愤怒。胡仙的快速反应是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呈一项诉状，要求法院下令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收盘，结束业务。

1961年10月间，香港一家西报上，刊登了一则篇幅很大的广告，内容是招人承买香港大坑道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

消息传开，整个香港为之哗然。

说到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香港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万金油大王胡氏家人的起居之处，更是香港公众闲来游玩的风景名胜，不仅香港人，外地来香港的人，大多都要到此一游。

虎豹别墅，位于香港岛北部，隔海相望便是九龙半岛，后枕查甸山、毕拿山，东北望太古城，西北望铜锣湾，花园建在半山腰上，远远看去好像一个五颜六色的聚宝盆。香江新八景中有所谓“虎塔朝暈”一景，说的正是港岛大坑道虎豹别墅的七层白塔沐浴在晨曦中的壮丽景致。

谁都知道，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乃是胡文虎兴建。时间要回溯到1937年，那时候，胡文虎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香港，每次他邹下榻于思豪酒店。

有一段时期，胡文虎患脑病，需要静心休养，他因此寄住于大坑道一位亲友家中。大坑道那地方据山面海，环境宜人，胡文虎觉得很适合居住。恰好这时有人要出售大坑道的一块地皮，价格还比较低廉，胡文虎便把它买下了。

胡文虎原先只是想给自己建所别墅，以便往来于香港时小住，后来却忽生妙想，何不同时建一个大花园，供游客游览赏玩。游客游过花园，知道这花园是胡文虎修的，而胡文虎正是万金油大王，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广告，有益于游人，又有益于万金油的销害，可谓一举两得。

所以，别墅就名之为“虎豹别墅”，花园就名之为“万金油花园”，让人一望而知是胡文虎兴建的。

虎豹别墅的后面原来只是一块荒山，胡文虎向政府购来，辟为花园，这块荒山地价十分低廉，一方尺仅值5毫而已。

花园如何建设，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全凭胡文虎的喜好和兴之所至，起先不过随山势而辟曲径，遇隙地而植花木，建若干亭榭，点缀于其间；后来则是胡文虎看见什么地方宜于建一个亭子，便招工来建；看见哪面墙壁宜于画上些什么，便找画匠来画，日积月累，万金油花园一天天丰富起来。有时候胡文虎看见某个亭子或是某幅图画不合他心意，他会即刻叫人拆毁或涂抹掉。

因此，万金油花园基本上代表了胡文虎的文化品味和审美趣味。胡文虎读书不多，耳熟能详的是儿时听来的故事，诸如老鼠讨亲，唐僧到西天取经，白蛇精水浸金山寺，十殿阎王，赌徒夜归，上刀山、下油锅，过奈何桥等等，这些通俗传说胡文虎感到非常有趣，便特向潮州雇来几位泥水匠，让他们把这些故事绘成壁画，把故事中的人物雕塑成像。这些作品非常通俗，令一般

游人尤其是妇人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由于胡文虎经年累月的装点建设，万金油花园成为一个饶有趣味的景点，这里既有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碧波荡漾的私家泳池，又有群芳斗艳的庭院花园，面目狰狞的泥塑雕像；花团锦簇的别墅中点缀有奇岩异洞与连环壁画，鲜花盆景与妖魔鬼怪相杂，富丽堂皇和恐怖迷离兼而有之，大雅与大俗共存，构成一种十分奇特的风格，吸引着八方游客。

虎豹别墅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虎塔，巍峨素雅的白色虎塔高达 145 尺，是香港唯一的高塔，成为虎豹别墅的标志。

在花园的半山上有有一个亭，亭中有一尊正襟危坐，穿满清朝服，戴花翎红顶的泥塑像，那是林则徐。胡文虎在花园中树立林则徐的雕像，足见他对这位虎门销烟声震天下的伟大人物的尊崇。胡文虎对人说，他自小常听父亲讲林则徐的故事，印象至深。

万金油花园中，有一座纪念碑，是胡文虎为纪念父母而立，牌坊上刻着“有怀二人”四个字，以表达胡文虎及后代孝思不匮的意思。据说胡文虎驻留香港期间，不论谁邀请，再好的宾馆也不去住，就喜欢住在虎豹别墅。只因他有一个独特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一大早起床便沿着大坑山的石阶，一级一级往上登，一直走到父母纪念碑前，默然肃立，低头叩拜。即使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

胡文虎说：“悼念父母，是为了激励自己，父母恩德无量，我永生都不能忘。”

耐人寻味的是，胡文虎尚还在世的时候，就叫人在花园半山中建了一座“胡文虎先生纪念堂”，堂中供有他自己的泥塑像。花园里建有胡文虎的铜像，铜像之下是他请人替他撰写的一篇歌功颂德的文字。胡文虎嘱人在他死后将骨灰安置于花园中，建一塔以藏之。这些都足以见出胡文虎对身后声名是极为重视的，归根到底，胡文虎一生都在为声名而活着。

虎豹别墅是胡文虎生前居住的地方，胡文虎死后，由太太陈金枝和女儿胡仙居住。

陈金枝和胡仙母女俩，事先没有听见任何风声，陡然看见报纸上登的广告，招人承买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震惊不已；再一看广告所登的接洽处竟是新加坡虎豹兄弟有限公司，负责向西报洽登这段广告的正是胡文虎的亲生子胡一虎，不禁万分愤怒。

胡仙很快便采取了反击行动，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呈一项诉状，要求法院下令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收盘结束业务。

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是于 1933 年 3 月 30 日，由新加坡政府公司注册署正式准予成立，并发给注册执照的。注册资本额为叻币 1000 万元，但实际资金只有 188.21 万元。当时由胡文虎自任董事长，胡文豹任常务董事，李社松任秘书。公司办事处设于虎标永安堂总厂所在的新加坡尼律 85 号。

胡文虎兄弟俩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公司呢？盖因兄弟俩在经营思想和方向上有所不同。胡文虎平生对于物业最不感兴趣，除了与他自己业务有关的房屋和自己的住宅，他是不购买地产和房屋的；他并且对保险不感兴趣，他认为把钱交给保险公司保水火刀兵人寿之险，倒不如省下这笔钱来自己给自己保险更直接了当。所以他从来不买保险，碰到保险公司经纪人向他兜揽生意，大谈买保险的好处，说到海枯石烂，他也是铁石心肠不动。胡文虎坚决不买保险，每年倒也的确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

可是胡文虎的弟弟胡文豹的想法就不一样了。胡文豹是个求安稳的人，头脑相对保守一些，他认为做生意流动性很大，赚的钱是浮财，不如买了房屋变成固定资产，每月可以收租，包赚不亏，没有风险。所以有一段时期，胡文豹总是向胡文虎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兄弟俩感情一直比较融洽，胡文虎虽然对购置房地产没有兴趣，但为了顺一顺弟弟的心，也不加以反对。因此在 1931 年至 1936 年期间，由胡文豹经手，先后在新加坡买进了不少房产。

这样，兄弟俩除了永安堂的业务，又多了一项房地产业务。为了便于管理，使帐目和银钱不致混乱，兄弟俩决定成立虎豹兄弟有限公司。

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成立之初，业务很简单，只是收收房租，或偶尔买进一两所房屋，除永安堂总经理李社松兼任秘书之外，没有一个专门职员。

按照公司的章程，原来规定由胡文虎和胡文豹共同董事主持。胡文豹逝世之后，章程乃修改为由胡文虎主持该公司，全权董事。后来胡文虎逝世，公司乃由胡文豹子女分任董事职务，并推举胡文豹的儿子胡清才为董事主席。公司的股东全是胡氏家庭的成员，股份的转让也只限于家庭成员内部，不得出卖给外人。

胡仙于 1952 年被委为虎豹兄弟有限公司董事之一。1961 年公司召开董会议，议决卸去她的董事职权。此后该公司有董事 8 人，胡文虎胡文豹的子女各占一半。

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为什么突然公开出卖香港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在以胡清才为首的胡氏家族成员这方面看来，顾名思义，虎豹别墅，当然是胡文虎和胡文豹所共有。如果是胡文虎所独有，那肯定要叫作“文虎别墅”了，而花园是命名为万金油花园，万金油是永安堂的药品，胡文豹自然是有一份了。

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第一，在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所签订的合约上，明文规定，新加坡和香港两地的虎豹别墅和花园均属于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第二，香港虎豹别墅的地契，最初是用的胡文虎的名义，公司成立后，即改为公司的名义。第三，关于胡文虎曾言明新加坡和香港两地的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将永久保留为两地居民的游乐之所云云，公司予以否认，因为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既属公司所有，公司便有权对别墅和花园加以控制，并有权出卖。第四，登报出卖虎豹别墅，是石过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议，由全体董事一致表决而作出的决定，而全体董事 8 人中有半数胡文虎的子女，说明这并非胡文豹的儿子胡清才个人的意思。

有这么多的理由，胡清才等兄弟姐妹当然就理直气壮以公司的名义登很出卖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

而在陈金枝和胡仙母女看来，香港的产业绝大部分是胡文虎的，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当然包括在内。胡仙在申诉书上说，父亲胡文虎生前明明白白说过，香港的别墅和花园及新加坡的别墅和花园，将永远开放，作为两地居民游览之所，所以是万万不能出卖的。

胡仙想，你胡清才既做得出初一，我就做得出十五，你们会假借虎豹兄弟公司的名义来出卖祖业，那我就申请法院下令将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收盘结束，来它个釜底抽薪。

胡仙的诉状递上去，法院拟定该案于 12 月 10 日在高院第二庭开审。

第三十三章 孤芳独立 庭对众兄弟妹

双方都请了一流的律师。到了开庭这天，高院内外分外热闹，法庭里坐无虚席，法庭外还站着许多人，在那里侯听消息。胡氏家人出席旁听的就有四五十人，黑压压坐了一片。女皇律师问胡仙：“你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反对你，你完全地孤立了，是不是呢？”胡仙点头默认。

当以胡清才为首的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在香港一家西报上刊出大幅广告，招人承买本港大坑道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胡仙的快速反应是向法院提交一项诉状，请法院下令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收盘，结束业务。

胡仙以何理由提出这样一项诉状，她有什么权利请法院终止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营业？

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叻币 1000 万元，实际到位的资金只有 188.21 万元，所有股东都是胡氏家人。其中胡文虎是最大的股东，他的股额共计 76.347 万元，其次是胡清才，他的股额为 51.921 万元，而胡仙的股额较少，只有 5.1 万元。

以胡仙这样少的股额当然不可能有提出收盘的权利。但是在胡仙这方面认为，已故胡文虎名下所占有的 76.347 万股，应归于她和她的母亲陈金枝分享，胡文虎名下的股额连同胡仙自己的股额，则代表了大多数股权，胡仙作为一个拥有大多数股额的该公司股东，当然就有权提出收盘了。

在招买广告刊出两个月之后，这桩案子在高院第二庭开庭审理，时间是 1961 年 12 月 10 日。

双方都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胡仙这一方聘的是新加坡阿伦及格烈喜律师楼的布克，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律界声重名著，另有高尔律师从旁协助。胡清才这一方所聘的律师来头更大，是来自伦敦的史特朗曼，他原是英国女皇的御用律师，另有新加坡布拉德兄弟律师楼的格云律师担任助理。除了这两边的律师之外，还有一位卡森律师，代表虎豹兄弟有限公司 11 位股东到庭聆讯。这 11 位股东是胡蛟、胡山、胡一虎、胡清才、胡清德、胡星，还有胡文虎胡文豹的 5 位孙子。主审法官是陈亚达先生。

到了开庭这天，高院内外分外热闹，听说是胡氏家族争夺遗产，人们趋之若鹜，法庭里坐无虚席，法庭外还站着许多人，在那里候听消息。

光是胡氏家人出席旁听的就有四五十人，旁听席上黑压压坐了一片，这当中有胡蛟夫妇、胡山夫妇、胡一虎夫妇、胡四虎、胡星和她的先生、胡清才夫妇、胡清德夫妇、胡文豹的女儿女婿，还有胡文虎的三太太黄玉谢、四太太邱秀英及胡文豹的太太。

这些胡氏家人，他们多数是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有六七位还是该公司的现任董事，他们与这起案子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起官司的胜负与他们利害攸关，所以他们还请了律师坐庭聆讯，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作证人，出席作证。

胡仙作为该案唯一的申诉人，特由香港飞赴新加坡亲自出庭，她的私人秘书苏金莲女士作陪，年方 29 岁的胡仙小姐孤身一人，面对胡氏家人强大的阵营。

其实，这之前胡氏家族间已先有了两场官司。

第一场官司，是胡清才代表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在香港控告胡文虎的太

太陈金枝和女儿胡仙。控告的焦点是胡文虎在香港的产业的归属问题。在陈金枝与胡仙母女这方面，认为举凡香港的产业，包括虎标永安堂、星系报业、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都是胡文虎遗留下来的遗产和事业，与胡文豹的子女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胡清才兄弟方面，则认为不论在任何地方的胡氏产业，胡文豹的后裔均有其份。所以当胡文虎逝世之后，胡清才便对此问题提出异议。

有一回陈金枝到新加坡，胡文豹的太太当面对陈金枝说，她的子女认为伯父生前处理产业不公平，深为不满。陈金枝听了，涕泪以对说，不会的吧，文虎为人一向公平正直，当不会有所偏私的。

胡清才再三提出这个问题，陈金枝母女俩又不肯相让，亲友们从中调和都不管用，最后只好上法庭了。

第二场官司，是陈金枝和胡仙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和新加坡虎标永安堂应偿还她母女叻币 113.75 万元，其中陈金枝母女以“胡陈仙”名义寄存叻币 60 万元，陈金枝存入公司投资计叻币 26.875 万元。

这两场官司都在诉讼之中，尚未开庭研审，第三场官司倒抢先一步开庭了。

开庭之初，虎豹兄弟有限公司董事主席胡清才代表公司方面提呈答辩。胡清才指出该公司已故股东胡文虎名下的 76.347 万股，至今尚注册于胡文虎名下，并未有任何人提呈转让过户；并称事实上胡文虎的股份，除 13 万元属遗产之外，其他 60 余万元已分别以信托方式，给予胡好、胡一虎、胡四虎、胡仙、胡蛟等子女，胡文虎只是名义上仍握有支配权。

胡清才在答辩书中还指出，胡仙只能代表她自己的股权，而不能代表已故股东胡文虎的股权；并且全体股东，除胡仙之外，均反对她收盘停业的呈请，均同意胡文虎胡文豹的所有遗产和事业部属于虎豹兄弟有限公司。

所以，在法庭上，代表公司一方的女皇律师史特朗曼这样问胡仙：“胡仙小姐，你看今天出庭的胡氏家人，都是你的亲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是吗？”

胡仙回答：“是。”

史特朗曼便问：“他们全部反对你吗？”

胡仙又回答：“是。”

“那么，你认为他们全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是吗？”史特朗曼问。

“不……”胡仙蹑嚅道。

史特朗曼便说：“除胡陶陶外，所有的股东都反对你的呈文，而胡陶陶也并未表示支持你，包括你的母亲陈金枝女士也没有参与你的呈文，你完全地孤立了，是不是呢？你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反对你。”

胡仙点头，默认这一点。

女皇律师一下就抓住胡仙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

胡清才以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名义，刊登广告，招买香港虎豹别墅和万金油花园，此举不仅宣告该别墅和花园不是胡文虎个人独有，而是胡文虎故文豹共有的物业；并且表示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不但拥有对该别墅和花园的控制管理权，而且可以不通知陈金枝和胡仙便将其出卖。

女皇律师史特朗曼对这一焦点提问道：“胡仙小姐，你是否同意香港虎

豹别墅及万金油花园是新加坡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产业？”

胡仙不假思索道：“是的，我同意。”

史特朗曼又问：“据你所知公司是在 1938 年置得该有关产业？”

胡仙回答：“不，我当时不知。”

“你意思是当时你太年轻而不知此事吗？”史特朗曼问。

胡仙说：“是。”

史特朗曼进一步问道：“目前你和你母亲居住在该别墅内，是吗？”

“不错。”胡仙道。

“你们是否交付租金？如果交付，是给谁收呢？”史特朗曼问。

胡仙告诉说，租金支付给虎豹兄弟有限公司。

史特朗曼听了胡仙的回答，立即提醒她务必谨慎作答，因为这是在法庭上宣誓作供，每一个回答都具有法律意义。

史特朗曼继续问道：“那么，你所交租金的数额是多少呢？”

胡仙说：“每月港币 500 元。”

“如何支付交接呢？”史特朗曼问。

胡仙说：“不是我亲手缴交，是由香港永安堂按月交给虎豹兄弟有限公司。”

史特朗曼要求她说得更具体一些，胡仙的回答是，她和她母亲并未亲自为居住虎豹别墅面向任何人缴付过租金，香港永安堂替她们缴付给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每月港币 500 元，她不能说出该笔租金是如何入帐，因为香港永安堂不属她管理。

史特朗曼听了胡仙的回答，说道：“我认为你们母女俩从来就没交过房租。”

胡仙说：“真实情形如何，我也不清楚。”

在女皇律师和胡仙小姐的一问一答之下，香港虎豹别墅的产权归属于谁，已经有了明明白白的答案。那么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对于自己的物业，是留是卖，当然有权处置，这一点也就无可争议了。

胡仙出师不利，先输一着。

第三十四章 薄弱防线 难挡层层盘诘

女皇律师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战果，意欲乘胜追杀。史特朗曼召请新加坡公司注册署的一名执行官出庭，呈示一份合约。这合约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俩的秘密文件，局外人很少知道，胡氏家人也多不清楚，胡仙还是第一回看见。而在胡清才这方面的确是甩出了一张王牌。

胡仙向新加坡高等法院呈状，要求下令虎豹有限公司收盘，开庭不利，在代表虎豹有限公司一方的律师史特朗曼的敏锐盘诘下，胡仙不得不承认香港虎豹别墅是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产业，承认她每月须缴纳租金 500 港币给该公司。

那位女皇律师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战果，进而乘胜追击。

下一天开庭，史特朗曼又对胡仙提出一连串问题。

“你认为香港永安堂公司是归你和你母亲所有吗？”史特朗曼问。

胡仙说：“不，香港永安堂公司属于遗产。”

“你的意思是指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与香港永安堂无关吗？”史特朗曼问。

“是的。”胡仙道。

“你父亲及你叔父一直沿用永安堂这字号，在新加坡及其他地方经营业务，是冯？”

“是的。”

史特朗曼更说：“我人为相当明显，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是组织来接管你父亲和你叔父在香港、仰光、上海、汕头、曼谷、檳城及新加坡所创下的事业的。我这样说，你同意吗？”

胡仙稍作沉吟，道：“我不能苟同，这点我无法证实。”

史特朗曼更转而问道：“设在香港湾仔道的生意，是不是用的永安堂这字号？”

回答说：“是的。”

“一直是吗？”

“一直是，”

史特朗曼问：“香港永安堂的电报挂号是‘虎豹，吗？”

胡仙回答：“是。”

“注册商标是虎标吗？”

“是。”

史特朗曼便说：“那么，你仍然认为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与香港永安堂毫无关联吗？”

胡仙这次沉思良久才作答：“我承认二者存在利益关系。”

“你是否承认香港永安堂是属于虎豹有限公司的呢？”史特朗曼问。

胡仙称是。

女皇律师追问到此，已经又取得一个回合的胜利。因为香港永安堂是否属于虎豹兄弟有限公司，这个问题是胡氏家族争产的三场官司的焦点。

此时恰好法庭退堂时间已到。

可是第二天出庭时，胡仙也许经过一夜深思熟虑，语气明显有所转变。当律师再次提到香港永安堂与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关系问题，胡仙的说法

是：“香港永安堂是属于新加坡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但香港虎标永安堂药厂则不属于该公司，虎标永安堂药厂与香港永安堂，是两间不同的营业机构。”

史特朗曼问道：“虎标永安堂药厂可是在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香港湾仔道建筑物内营业？”

胡仙承认是。

这时，史特朗曼召请新加坡公司注册署的一名执行官出庭，呈上一份在1933年3月30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成立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时，呈交新加坡公司注册署的证书原件。

这是一份合约，由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在1933年3月20日所订。合约内容是说明兄弟两人以前在仰光、新加坡、曼谷、香港、汕头、上海等地永安堂总行和分行的生意，以后全部移交归于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合约上有胡文虎、胡文豹的亲笔签名。

这合约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俩的秘密文件，局外人很少知道，连胡氏家族中人也多不清楚，胡仙这回还是第一次看见，而在胡清才这方面可谓是甩出了一张王牌。

律师请胡仙看过合约之后，便问：“胡仙小姐，你对证书上属于你父亲和你叔父的签名，可有什么怀疑之处？”

胡仙道：“没有。”

“毫无怀疑，是吗？”

胡仙说：“是的。”

史特朗曼得到胡仙的肯定回答，便请人将新加坡和香港两地出品的八卦丹、清快水之类呈堂，他从中拿出两包虎标八卦丹，指着其中一包对胡仙说：“这包，是香港永安堂的出品，是吗？”

胡仙看了看，说：“是的。”

史特朗曼说：“纸包背面所印的厂图，并非香港永安堂药厂，而是广州永安堂药厂的厂图，是吗？”

胡仙答是。

史特朗曼又指着另一包八卦丹问胡仙：“这包，是新加坡永安堂的出品，对吗？”

胡仙看了看，说：“是的。”

史特朗曼说：“纸包背面所印厂图，也是广州永安堂药厂的厂图，是吗？”

胡仙答是。

女皇律师的用意是要证明香港永安堂所出品的虎标药品和新加坡永安堂所出品的虎标药品并没有什么区别。史特朗曼并指出，香港虎标永安堂药厂所出品的清快水，其药瓶上的标头纸，原是新加坡永安堂的，只不过将其下端印有“新加坡永安堂”字样的部分切掉了，而在某些没能切割好的标头纸下面，尚显出“新加坡”的字样。

史特朗曼这时以委婉口气说道：“胡仙小姐，请你别误会我有其他含意，请问小姐芳龄几何？”

胡仙回答说29岁。

史特朗曼道：“这么看来，这些药品标头包纸上所用的特有图案，都大过你的年龄。数十年来，经历过诸多困难和变更，但永安堂药厂所出品的药品，其标头图案，却始终未变。由此看来，是不是可以说香港永安堂的业务是属于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一部分呢？”

“是的。但是香港永安堂与虎标永安堂药厂却是两个不同的营业机构。”胡仙强调说：“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在香港湾仔道设有注册的办事处，那即是香港永安堂，但虎标永安堂药厂则是有别于香港永安堂的营业机构。香港虎标永安堂药厂，是先父胡文虎于1940年开始独自经营的。”

女皇律师听胡仙如此说来，立刻反诘道：“胡仙小姐，据我所知，1940年间，你父亲胡文虎已经身为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如你所说，则你父亲在身为该公司董事长时，竟用与公司同样的营业字号，在同样的营业地址，开始经营另一个同样的业务，是吗？”

史特朗曼的问题十分刻薄，胡仙一时语塞。她沉吟着它要作出解释：“可能是这样，因为……”

但是女皇律师打断她的话，提醒她要小心作答。

胡仙遂转向法官请示，她是否可以收回刚才所说的话，而代以另外的回答。

承审法官不置可否，只随即加以记录注明。

史特朗曼却又转问道：“胡仙小姐，你为什么前日既已承认香港永安堂属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所有，现在却又说在香港永安堂内的虎标永安堂药厂不属于该公司呢，你是自食其言，还是对前日的问题感到混乱？”

胡仙说她的确是有些混乱。

史特朗曼冷冷道：“胡仙小姐，恕我直言，有关虎标永安堂药厂的主意，是你昨日退堂之后才想出来的，目的是要推翻你昨日已经承认下来的事，不是吗？”

胡仙回答说：“并非如此。”

史特朗曼却接着说道：“胡仙小姐，我已经说过你此次诉讼的目的，意在阻止公司出售虎豹别墅及万金油花园，你也承认了。现在我还要再指出你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阻止公司在香港法庭起诉，向香港永安堂追讨款项，你说呢？”

胡仙说：“不，我另一个目的，是要指责公司董事没有按照公司法则行事。”

胡仙这里所指的是，她于1952年被委任为虎豹兄弟有限公司董事之一，但于1961年10月公司所举行的董事会议中，被议决免除她的董事职权。这次董事会议举行期间，她在香港，事前并未接到将举行董事会议的通知；并且就是在她被委为公司董事的任期间，自1954年起，即未收到有关该公司的业务帐目的报告，而自1958年起，她即未自该公司收到应得的股息及董事费，她因此完全不知该公司的经济状况。胡仙认为这种种事情，表明虎豹有限公司的在任董事漠视了各股东的权利，将该公司转变为私人企业。这也是此次胡仙向法院呈递诉状的主要理由。

女皇律师听了胡仙所言，只问胡仙可是香港星系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胡仙回答是。律师又问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是否也拥有公司法，胡仙说当然。史特朗曼这时狡黠一笑道：“胡仙小姐，据我所知，你从来没有派送资产负债表给公司内的股东，你本人也正是把香港的星系报业有限公司视为私产呢。”胡仙承认史特朗曼所指系事实。

女皇律师又呈了两件证据，一件是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为创建永安堂药厂，购买香港湾仔道的一块地皮的契据；一件是1938年7月7日香港永安堂所发出的信件，信笺上印有虎豹的字样及老虎的贸易商标。这样，虎豹兄弟

有限公司对于水安堂的权益关系就几乎无须争议了。

胡仙现在所能坚持的就是，她承认香港永安堂属于壳豹兄弟有限公司，但是虎标永安堂药厂则是姓父亲胡文虎所独自创办。

史特朗曼因此问道：“胡仙小姐，你说香港虎标永安堂药厂是你父亲独自创办，与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无关，那么，你是把‘虎标’这一公司的注册商标当作自己的商标来使用，是吗？”

胡仙说：“向来的出品，都是沿用这注册商品。”

史特朗曼问：“你有权力使用这商标吗？”

胡仙一愣，不知如何回答。

陈亚达法官提醒她，证人在法庭内如果回避提问，法庭将可能采取不利于她的见解。

胡仙这才说道：“我本人没有这权利。”

史特朗曼露出得意的笑意对胡仙说：“是的，你和你的母亲都只是你父亲遗产的管理人，并没有赋予使用这注册商标的权力，对吗？”

胡仙点头默认。

史特朗曼继续追问道：“你既然无权使用这商标，为什么却又要使用呢？”

胡仙无言以对，但是法官催促她必须作答。胡仙沉吟一刻，才说：“只是因为壳标永安堂药厂一直是沿用虎标的注册商标。”

史特朗曼说：“这不是理由，你和你母亲都没有权力，但虎标永安堂药厂却一直使用它。”

胡仙想了想，补充说：“‘虎标’是在没有权力使用之下被使目的，是在未被授权之下去使用的。”

史特朗曼说：“那么，就是说你是将公司的产业当作自己的来使用，你自己做的事，反而在你的诉状中起诉别人。”

胡仙沉吟道：“我虽然使用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商标，但却没有将由此所得的利润归为己有。”

“这些利益归谁所得了呢？”史特朗曼问。

胡仙答：“虎标永安堂药厂保存了全部的营业利润。”

史特朗曼以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对胡仙说：“那么，就是说虎标永安堂药厂虽然使用了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而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你说是吗？”

胡仙承认是。

律师问到这一步，胡仙已经是全线崩溃。

第三十五章 秘密泄露 五月风暴乍起

事情闹到政治部：那位编辑在中央警署关了 100 天，胡蛟则每天上午都要去政治部报到，接受讯问。振胡蛟本人称，他曾由中共方面挪借过港币 720 万元。胡蛟“只字不改”的承诺发生变化，李星可愤然辞离“星洲”投奔“南洋”。“南洋”挨李光耀总理警告，李星可被迫写答辩词，惹下大麻烦。

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在胡清才张罗下，股票开盘发行。胡蛟要他全家每人各买 100 万股，一共购得 500 万股。看准新股市旺之际，胡蛟把手里的 500 万股全抛了出去，一下就发了一笔横财。

胡蛟发了财，高兴，得意，带了一家人去香港渡假。然而就在这期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胡蛟向美国银行借款，和联系台湾制造的两架卷筒印刷机，都是由《星洲日报》妇女版的一位编辑经手接洽的。因为这位编辑奔走有功，胡蛟还特将他提拔为《星洲日报》副总编辑，并兼任《垦曜日报》和《星泰晚报》的驻新加坡特派员。胡蛟每有交际应酬，必定叫上这位老兄，同吃同喝，共商大计。

台湾定造的印刷机也是这位编辑经手的。他告诉胡蛟对方条件是交货后分期付款，该厂有一个人长期驻在新加坡，每月收取各次的分期付款。

胡蛟对此一直信以为真，可是他突然发现原来分期付款纯属这位编辑的虚构，分期所付的款并不是印刷机制造厂的代理人收去，而是落进了这位他认为“有功之臣”的编辑的腰包。

胡蛟受此蒙骗，勃然大怒，马上撤去那位老兄新封的副总编辑之职。

这位编辑也同样感到愤怒和委屈，因为他觉得自己给胡蛟赚了那么多钱，胡蛟分文没给他，他因此才搞了个“分期付款”，现在胡蛟对他前思后弃，扫地出门，他当然也不能善罢甘休。

这件事最终闹到政治部。那位编辑在中央警署关了 100 天，胡蛟则每天上午都要去政治部报到，接受讯问。

据胡蛟本人所答，他曾由中共方面挪借过港币 720 万元。

· 利息为周息 0.1%。这就是 1971 年的“5 月风暴”的真正起因。

胡蛟在政治部受讯的事，起先是秘密进行的，外人不知道，“星洲”本社的人也不知道，后来最先知道的是该报主笔李尽可李星可在进《星洲日报》时，虽然没有跟胡蛟谈定经济收入之事，业务上却是有言在先，他要求凡是写的文章，任何人不得更改一字，如确有必要更改，必须经他同意。李星可自进《星洲日报》后，这一条的确是多年如一日，雷打不动的。

然而，自从胡蛟被政治部传讯之后，胡蛟原先对李星可“一字不改”的承诺却发生了动摇，总编辑开始有权改动李星可的社论了。

李星可因此质问胡蛟，胡蛟只说是外面风声不对，“并且总编辑的地位到底要比上笔高”。

“岂有此理！”李星可愤然道。

因为就普遍的情况而言，当时各报的主笔都是高于总编辑的。李星可是《星洲日报》的顶梁柱，总编辑凭什么高他一头？

“因为我不是客家人？我们从前的协商是否从此无效？”李星可冲着胡

蛟一连串质问。

胡蛟招架不住，只好把政治部传讯他的事如实讲出。

李星可是个忠实干事业的人，10多年来他作为“星洲”的主笔，一直遵循“星洲”题于报头的办报宗旨：“唯一能替华人社会服务，唯一能替华人说话。”李星可对“星洲”可说是倾注了全部的真诚和热情，准想到胡蛟身为“星洲”老板，为了个人私利，就这样让一份好不容易才办得深入人心的报纸，失去公正独立的本色。李星可顿然感到心寒。

这之后，有一次日本大使郑重其事地邀请胡蛟夫妇赴晚宴，并约请李星可作陪。日本大使打电话给李星可，李星可当即辞谢了。到晚宴时候，日本大使对胡蛟夫妇提起这事，深感不满，胡蛟忙赔不是。

胡蛟第二天便责备李星可，为什么故意使他为难。李星可竟没好气他说：“我拿‘星洲’的薪水，我的工作写社论，不是交际应酬，交际应酬是我自己的私事，有人请我，要看我有没有空，高兴不高兴去。”

胡蛟听了这话自然满心不悦。这两个人内心的隔阂至此便公开化了。

李星可和胡蛟最后的决裂，其导火索是那年年底的加薪。当时“星洲”的在职员工全部加了薪，李星可也加了，但是他对所加的数额不满意，因为他在“星洲”工作了12年，为《星洲日报》鹤立新加坡马来西亚报坛立下汗马功劳，他对“星洲”的贡献可谓巨大，然而时过数年，他在“星洲”所拿的薪金还未超过他当年在法新杠工作时的薪金，他心中自是愤愤不平。

胡蛟却不打算满足李星可的要求，他认为李星可在外面有兼差，他都从未过问和干预，也算对他李星可够意思。可是李星可觉得自己现在年岁日高，已没有足够精力在外兼职，他需要胡蛟给足薪金，够他生活。

胡蛟说：“如果你嫌薪金低，可以另谋高就嘛。”

李星可说：“说实话，《南洋商报》早跟我打了招呼，我什么时候去，他们什么时候欢迎，薪水至少比我现在多一倍。我不去，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给‘星洲’干，干出了感情。我是北方人，重的是义气，不是钱。”

两个人这时候感情已经完全破裂，相互都说了些不客气的话，胡蛟最后说：“干不于是你的自由，钱只能加这么多。”

李星可没话可说了，从口袋里掏出预先写好的辞职书，递给胡蛟。

第二天的《南洋商报》就以醒目字样刊登了该报聘请李星可为主笔的预告。

由于李星可辞职“星洲”，投奔“南洋”，《星洲日报》发行数陡然跌落，而原本就周转不灵的“太阳报”此时更是举步维艰，因为胡蛟利用“星洲”的声誉弄来的钱全花在了他个人购置房地产和赌马上，而没有用于《星洲日报》和“太阳报”的事业发展。

现在这两张报纸如何继续生存下去，胡蛟全然没有对策了。他在寄希望于那家借钱给他的银行再借些钱给他的同时，只是不断责备他的总编辑和那个接替李星可的新主笔无能。

这些人端了胡蛟的饭碗，就总还是要替他干点事情，左思右想，设计出一招来，当然所谓的“招”，不外乎是要打击他们的对手《南洋商报》。这一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正当的报业竞争，他们是要利用接近当局的机会，向最高当局进言，让当局钳制“南洋”的社论主笔“免开尊口”。

总理李光耀本来是受的英文教育，对于华文报看得少，不大注意新加坡华文报，听人煽动蛊惑之后，他终于在一次公开讲演中对《南洋商报》的言

论提出警告。

《南洋商报》在受到警告的当天，立即召开了社论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针对政府的这一对私营报纸所施行的胁迫，予以严词声辩。

“南洋”的社论主笔有好几位，所以设有社论委员会。李星可现在虽然是“南洋”主笔之一，却不是社论委员会委员，因为他新来，旧主笔们暗自排挤他。可是现在临到这挥戈上阵的紧急关头，谁来主笔？社论委员们却一致认为非李星可莫属。

李星可善写这一类答辩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有目共睹的。李星可1962年的《敬答马歇尔先生》、1965年的《敬答新加坡教育部》、1966年的《敬答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1971年的《敬答新加坡厂商公会》等，均为轰动一时的名篇。

但是，这一回当社论委员会通知要由他执笔来写这篇答李光耀演讲词的社论时，李星可却不答应。

那天，社论委员会开罢会已是中午。社长打电话找李星可，李星可恰巧被人请去吃饭，不在家。下午，社长李有成请他到社长室来，面授机宜，让他按社论委员会决定的内容来写这篇答辩词。

李星可不同意写。李星可虽然是敢怒敢言，对政府当局没少提批评和建议，但是现在要他直接点名道姓地批评李光耀总理，他在直觉上感到不妥，并且也有违新闻界的一般原则。但是李有成执意要他照办，李星可只得遵命。

李星可不情愿地伏案秉笔，冥思苦想，字斟句酌，总算凑出一篇文章来，其内容并未完全遵照社论委员会的意思。他送去给社长李有成看，李有成已经回家，他便交给总编辑，让总编辑跟社长联系。

虽然李星可担心和预感到这篇社论会惹麻烦，因此行文时尽量冲淡了社论委员会较为激烈的意思，但是这篇社论刊出的第二天就出了大事。

那天清晨时分，《南洋商报》三员大将——刚卸任总经理的李茂成，新上任的总编辑同道章，社论主笔李星可，突然被政府当局拘捕。紧接着，对外联络主任郭隆成也受到牵连被捕。

这就是轰动新加坡的“5月事件”，人谓之“黑色的5月”，或“5月的风暴”。

第三十六章 南洋龟缩 先驱孤舟触礁

胡蛟恰好是一个“陪绑”对象，用来佐证政府当局之所以对华人报纸采取行动，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真凭实据。“南洋”老板只想保住报纸发行量，不愿花钱花精力打官司，他对弟弟说，你暂时受点委屈在监狱里住两年，我赚的钱分一半给你。李光耀在赫尔辛基由“被告”反败为胜，他向记者声称，回到新加坡要对“南洋”两位编辑提出诉讼。

《南洋商报》祸从天降，政府当局根据内部治安法令，拘捕了“南洋”的三员大将。所谓“内部治安法令”，就是不必提出犯罪证据，也不必经由正式法律程序，先将指定嫌疑人扣押，俟后听凭发落。

这之前，由于李星可辞离“星洲”，投奔“南洋”，《南洋商报》的发行量仅一个月内便上升了3万份，令《星洲日报》大惊失色，黯然无光。现在《南洋商报》于风头正健之际遭此一击，“星洲”难免有些窃喜，这至少免去了“南洋”发行量突飞猛进的巨大威胁。

然而，“星洲”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南洋”受挫而变得好过起来。《南洋商报》被指控从事对政府不利的“黑色活动”，证据只有见诸于该报的新闻和社论，而胡蛟的来历不明的境外援助，却是早在“南洋事件”爆发前好几个月就由他的本报人士密报了政府当局，胡蛟数月以来一直在接受政治部的秘密传讯。胡蛟恰好是一个“陪绑”对象，用来佐证政府当局之所以对华人报纸采取行动，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真凭实据。

5月8日，李光耀总理在信立新村民众联络所成立第8周年纪念席上发表讲演，指责《南洋商报》“执行对新加坡的利益或安全有害的政策”，因此政府不能袖手旁观，“黑色活动正在新加坡的报界中进行，有些人想搅得我们这里不安。有几个大国想见到新加坡的事情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他们对此深感兴趣。”

李光耀总理特别指出，某方曾以700万港币支持新加坡的一家英文报（即胡蛟的《东方太阳报》），新加坡的《先驱报》也“接受香港方面的资助，自去年出版以来就一直抨击政府。”

对于政府的指控，胡蛟原想聘请律师，在报纸上刊文声辩。但是在律师的建议下，胡蛟最终采取了既不否认，也不声辩的态度。只要政府当局不对他个人采取行动，他就低头认输，逆来顺受。

胡蛟的这种态度使他的底下人深为不满。不到一星期，《东方太阳报》从暹罗聘来的总编辑和六位外籍编辑，声称“无法在由于总理的指控而来的怀疑阴影下工作”，提出集体辞职，并要求政府证明他们的无辜。《东方太阳报》就此停止出版。

《南洋商报》声称政府所谓“黑色活动”与该报无关，要求释放该报被捕人员，但也仅仅是刊发几篇表示抗议的官样文章，没有其他积极活动。

“南洋”方面开始曾经请过大名鼎鼎的马歇尔律师，替三位被拘捕者申请人身保护。马歇尔原先担任过新加坡首席部长，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他的努力未能奏效。马歇尔主张到伦敦去上诉。

而这时候的《南洋商报》虽被指控从事对政府不利的“黑色活动”，证据只有见诸于报端的一些文字，充其量也只能说它“运用影响力，加剧种族、语言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甚至“美化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等等，而

政府的意气用事、偏激行动，拿不出真凭实据来依法起诉，徒惹是非，反倒使该报地位陡增，发行量剧升。

报馆老板李有成因此只想保住报纸发行量，不愿花钱花精力打官司。他对被扣押的弟弟李茂成说，要他暂时受点委屈在监狱里住两年；只要李茂成照他说的办，日后出来，他这些年所赚的钱一定分给李茂成一半；李茂成的太太已经去世，李茂成的两个儿子他一定会照管妥善。

《星洲日报》在“南洋事件”发生之后，曾在5月5日的社论中指责政府任意拘人乃属不当，认为被拘人士“应在法庭受审讯，而不应当无限期的受拘禁”。但是“南洋”既然在一度要求“政府急速释放被拘留的三位同事”后，即哄若寒蝉，放弃争，“星洲”自然也识相地改变立场，乐得袖手旁观了。

这时候反倒是出版不久的英文《先驱报》不甘寂寞。在《南洋商报》人员被捕的第二天，该报就在社论中指责政府的行径违反新闻自由。针对李光耀5月8日演讲中所指《先驱报》“接受香港方面的资助，自去年7月出版以来，一直抨击政府。”《先驱报》立即在社论中答辩道，该报所获香港方面的投资，早已取得政府高级官员的谅解，他们的经济来源并无神秘可言。

由于政府当局只能怀疑《先驱报》的外国投资者的动机，提不出该报从事“黑色活动”的真凭实据，《先驱报》因而理直气壮，先是大声疾呼：“除非我们被证明有罪，我们是无辜的。”继而呼吁广告客户的支持，口号是：“我们不‘黑’，请在《先驱报》登广告！”

《先驱报》的发行量因此扶摇直上，从1.3万份增至3.1万份，再增至5.8万份，到了5月30日，首次增刊《星期刊》，印了3.8万份，当天便销售一空，开创了该报以及新加坡报业史上新报销数的最高纪录。

《先驱报》跟胡氏家族是有关联的，胡仙是它的香港投资者之一，投资额为50万元。《先驱报》与政府当局发生争执，胡仙专程从香港飞到新加坡，拜会李光耀总理，对有关问题进行商谈。但是胡仙也终没能挽回《先驱报》的命运。

就在5月20日，《先驱报》停止出版的前3天，李光耀总理还一直说：“《先驱报》的空谈无碍大局”。他认为，“《先驱报》的事件所引起的新闻自由问题的争论，不致引起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安”，因为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人不会制造暴动。

李光耀总理对于英文报及英文报的读者的这种另眼相看，使得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站出来，设法接办《先驱报》，政府当局声明，除非在5月28日以前，《先驱报》的所有权转移到新加坡本地人的手上，政府将撤销该报的印行许可证。

这期间，除了胡仙，新加坡的大通银行经理汉奎克，东马来西亚的拿督斯蒂芬，亚洲报业基金会主席罗萨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黄祖耀，一个自称为“人民阵线”的新政党，以及5位由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组成的所谓“新加坡专业人士”，都作过试图挽救《先驱报》的努力，然而接踵失败，终于又都知难而退。

这样，《先驱报》便在5月29日被迫停刊。1971年的新加坡“5月风暴”，以“《南洋商报》事件”起始，以“《先驱报》事件”告终。

《先驱报》跟政府的对立完全是起于《南洋商报》人员被捕。《先驱报》为《南洋商报》打抱不平，《南洋商报》自己倒俯首缄默。当《先驱报》关

门在即，“星洲”和“南洋”虽资金雄厚，并都有有力的金融后台，但它们都见死不救。

“星洲”和“南洋”是两家纯商业性的投资企业，它们都只看重眼前的现实利益。其时，由于“南洋事件”的发主、政府的指控，时局热闹，两家报纸的发行量与日俱增，利市3倍。“星洲”和“南洋”看见有利可图，便想委屈求全，能忍则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星洲”采取这种态度还情有可原，因为胡蛟这时已经下台，由胡山接任社长，内部紊乱，人心涣散，可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别家的危难无暇顾及。

“南洋”的态度却使外界难以理解。它这时还有三员大将关在监狱里，它也不是不赚钱或没有钱，可是在赫尔辛基举行国际新闻会议讨论他们的案件的时候，《南洋商报》不但没有代表出席，甚至连个列席旁听人或采访记者都没有派。他们有的是钱，至少可以请个律师代表出席。

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新闻会议，原本主题是“有关《南洋商报》经理与报人未经审讯而遭扣留的事情”，但是《南洋商报》的最高当局既不派人出席，也不肯花钱请常年的法律顾问马歇尔或其他人代表出席，这样，辩论《南洋商报》的事情使被一笔掠过，会议主题一变而为《先驱报》的资金来源问题，与新闻自由的讨论风马牛不相及。

李光耀本来是以被告身分出席赫尔辛基的国际新闻会议，可是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控方《南洋商报》竟没有任何代表出席，只有一两名“陪绑”，而且是已经关门大吉的《先驱报》的残兵败将，既非雄辩滔滔的律师，也非能言善辩、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而李光耀，他本人是律师出身，又身为政府总理，代表一个国家，带有随行的全班人马。双方实力之悬殊，这场辩论的胜负已经能见分晓。

果然，李光耀不但由“被告”反败为胜，还在赫尔辛基出足了风头。他在转赴伦敦的时候，对新闻记者声称，他回到新加坡将对《南洋商报》的两名编辑提出诉讼。

第三十七章 新法出台 “半百老人成婚”

李光耀总理改了主意，“南洋”“星洲”的本家王朝不推自倒。两位与报业素来无缘的人士却被拥上这两大“无冕皇帝”集团的第一把交椅。李星可、同道章刚获释放，社长李有成却被政府拘捕起来，传言说是由于李星可、同道章的出卖。有人建议《联合早报》应改作《商星（伤心）日报》。

李光耀在赫尔辛基向记者声称，他回新加坡后要起诉《南洋商报》的两位记者。但他回新加坡后，却改变了主意。

李光耀修改了国内的出版法。按照新的规定，凡是日报，不得由一家一姓独占垄断，必须改为公众有限公司，每个股东所拥有的资本总额不可超过30%。

这个新的规定一出台，“南洋”的李家王朝和“星洲”的胡家王朝便不推自倒，土崩瓦解了。《南洋商报》的新董事长是潮州帮的华联银行董事长连流洲，《星洲日报》的新董事长是福建帮的后起之秀大华银行董事经理黄祖耀。连流洲和黄祖耀从来跟报业无缘，不知怎么竟被拥上这两大“无冕皇帝”集团的第一把交椅。

“星洲”和“南洋”沦落到这一步，都因为起初的唯利是图，临阵退缩，假如一开始便步步为营，与政府当局据理力争，而不是委屈求全，为保住报纸发行量，保住一点眼前利益，则断不致最终落荒而逃，全盘败北。

“南洋”的三位被捕人员这时候几乎已被人遗忘。

李茂成是他的哥哥社长李有成有所交代，让他受些委屈，坐两年牢，外面有李有成给他赚钱，给他照管好儿子，李茂成没有异议，安心坐牢。

律师马歇尔曾去探视李星可，他们是那种由敌而友的挚友。在李星可入狱之前，他们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同桌进餐，研究讨论世界局势和政治时事，交换一些清谈未议。马歇尔说：“事到如今，你只有自己出面。”

李星可苦笑道：“我身陷囹圄，如何出面？”

马歇尔说：“我代表你去伦敦上诉。”

李星可说：“我没钱请你。”

马歇尔说：“我不收费，可以记帐。”

李星可笑了笑说：“你还是跟李有成去商量吧。”

马歇尔跟李有成商量的结果，李有成不同意上诉，由于《南洋商报》发行量直线上升，“南洋”与政府当局的对立当由正面冲突改为“打太极拳”，这个主张是社论委员会所剩余的三位委员中，资格最老的陈振夏所提出的。就是这个陈振夏，主张对政府态度要强硬；三员大将被捕后，他继续主张要强硬抗议。可是文章不是由他写，另一位胆小怕事的社论委员连士升被吓得赶紧告老退休，不久便一病身亡。冯烈山继任主笔，社论委员会让他写抗议文章，他写了一篇，声明要等到退休之后才可发表。他很快也退休。

轮到陈振夏自己任总编辑和主笔，他竟一改往昔的强硬态度，打起“太极拳”来。

陈振夏对老板李有成说，报纸发行量增加已达到目的，官司就不必再打下去了，而且政府也不会再找李星可他们麻烦，他有一个女婿是政府官员，可以从中帮忙。

李有成听从了陈振夏的主意，放弃了打笔墨官司，也省下了去伦敦上诉的开支，连赫尔辛基为了“南洋事件”召开的国际会议，他也没有派人参加，或请人代表出席。

同道章是回教徒，李星可是天主教徒，他们两人都不属于任何政党或者政治信仰，他们只是忠于职守、不乏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当他们蒙难之时，报馆对于他们未犯法而坐监，对于他们的家庭，全都置之不顾而只贪图报纸发行量上升。本来事关公益与公道，却无人挺身而出，为正义说话，而是袖手旁观。李星可、同道章当然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替报馆受罪了。

而这时他们的家庭又都陷入困境。李星可的夫人精神失常，已经被送入“板桥疯人院”，他们在澳洲读书的儿子不得不停学一年，回到新加坡照顾母亲。同道章家中儿女众多且年幼，同道章夫人失了业，并且患了心脏病。

在这种情况下，李星可、同道章二人同意签署了政府指定的“自白书”，刑期未满足便获释出狱。

李星可、同道章刚获释放，社长李有成却被政府拘捕起来。传言说是由于李星可、同道章的出卖。

事实上李星可、同道章二人既没有出卖别人，也没有出卖自己。李星可但承《南洋商报》答李光耀的社论是由社论委员会决定的，李星可本人并不是社论委员，这是事实；李星可同时声明所有其他由他撰写的社论，题目和内容都是由他自己决定，应由他负全部责任。而同道章所言李有成曾命令他多报道中国新闻，那手谕是公开粘贴在报馆编辑部的告示牌上的。李星可、同道章的“自白书”并无任何不实之词。

李星可出狱后，离开新加坡，流亡海外；同道章则在不久之后，再度被捕入狱。

“南洋”和“星洲”换了连流洲和黄祖耀两位新董事长，人事上有部分变更，但却没有什么大的变革。两家报纸除了继续彼此的传统对立，有所变化的是两家报纸的内部都发生了少壮派对元老派的斗争。元者们一个接一个被迫离退，重要职位都由后起的少壮派接任，而撰述与编辑方面的水准也随之一步步下降。由于维护华文教育、华人文化的大旗被砍，华文中小学校一个个部改为英文学校，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大学，改为英语教学，而且最终关门，华文报的写作者与编辑人才因此后继无人。

1983年初，政府当局勒令“南洋”和“星洲”两报合并，改组为《联合早报》，并且联合出版一家英文午报，即收买自本地《海峡时报》的《Singapore Morning Post》。

新创刊的《联合早报》在3月23日报道国会审查政府开支预算的新闻里写道：“政府在华文报正处在巅峰状态，还没有走下坡的时候，要求华文报纸改组，给人一种过分干涉的印象。这种印象不管是对是错，对于政府形象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据统计，当时新加坡认识汉字的10岁以上人口为66.7万多人，只认识英文字的人口为82万多人，而既识汉字又识英文的人口为37.76万余人。华文报章总销量自1975年以来逐年增加，1975年为22.7807万份，1981年增至82.0867万份。“星洲”和“南洋”两家报纸历史悠久，各自形成了独特风格，拥有广大读者、商家和广告客户的支持，每年盈利在六七百万元以上。

因此，“星洲”和“南洋”两报改组，民间议论纷纷，颇为不满。民间的说法是，“南洋”“星洲”这两个50多岁的老人被迫成婚，而且收养了一

个花钱的红毛仔（指英文午报《Singapore Morning post》）。有人还建议说，《联合早报》应改作《商星（伤心）日报》。

“星洲”和“南洋”两个“冤家对头”自此结束了半个世纪的争争吵吵、恩恩怨怨。早已习惯了这两家华文报伴随他们生活的新加坡人，从此少了一分热闹，多了一分寂寞。

第三十八章 贱卖虎豹 服毒愧死旅途

胡清才瞒着胡氏家人，把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全盘卖了，他的姐夫李志诚联合其他股东拒绝出让股份，责骂他变卖祖业，是个败家子，当众扇了胡清才大耳光。胡清才羞愧难当，出国旅游，于旅途中服毒，辞世长眠。

由于“星洲”和“南洋”出事，胡清才担惊受怕，因为“星洲”是虎豹兄弟有限公司的台柱子。胡蚊被政治部每天传讯，“南洋”三位主将被捕，《先驱报》被勒令停刊，这一切令胡清才感到办报纸虽赚钱，可是太容易出事，前程莫测。胡清才动了念头，与其提心吊胆，不得自在，不如把虎豹兄弟有限公司全盘卖了，赚一笔大钱，从此清闲。

胡清才瞒着胡氏家人，私下作了决定。伦敦一家投资公司捡了个便宜，以每股叻币 1.5 元的价格购得胡清才的全部股票。永安堂、《星洲日报》、崇侨银行、大众保险公司因此全部改姓易主，不复为胡家的江山。

胡清才原以为把老祖宗的家业卖完，便一了百了，不再有烦心事。准知买卖刚做完，就出了问题，政府当局认为报纸不能出让给非新加坡公民，勒令胡清才把售出的股票购回。胡清才不得不照办，结果，每股 1.5 元售出的股票，花 3 块多钱一股才买回来，而且买回来也是替别人做嫁衣裳，因为胡氏家族此时已没有人有权继承遗产，或者有本事管事。

崇侨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胡文豹的女婿李志诚不肯认帐，他联合其他股东拒绝出让他们拥有的多数股，而且责骂胡清才变卖祖业，是个败家子，对不起祖宗三代，当众扇了胡清才一个大耳光。

胡清才羞愧难当，以出国旅游作逃避，在旅途中服毒，辞世长眠。

胡清才夫人陪同胡清才出国旅游周游世界时，原本有一个东山再起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胡一虎的日本太太想出来的，在新加坡办一间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由胡清才夫人担任董事长。胡清才夫人是一位受华文教育出身的知识女性。

胡一虎的日本太太聪明能干，八面玲珑。胡文虎辞世时，胡一虎尚年幼不能接管大事，而胡一虎系庶出，胡文虎的旧思想里还是有偏见的，因此胡文虎没给胡一虎留下什么遗产。胡一虎时常往来于新加坡香港之间，依靠大姐胡仙和堂兄胡清才的扶持帮助。胡一虎的日本太太在胡清才出卖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之前，曾傍住胡清才夫人，打算在新加坡租赁总统府旁侧新建的一幢大厦的底层和二层，开辟一间大规模的日本式百货公司。胡清才夫人答应出资，担任董事长。

可是谁知胡清才竟在旅途中自杀，胡清才夫人深受刺激，回到新加坡时尚神志不清，哪还有心开百货公司，董事长也不当了，答应胡一虎太太认购的股份也全部不要了。

胡一虎的太太一时乱了方阵，幸亏她平时交际广泛，到处活动，找人帮忙投资。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捷克太太给了她至关重要的支持帮助。

这位捷克太太原籍捷克，久居新加坡，战后在新加坡开了一间贵族幼稚园，经营不错，名气很大，所以收费虽然高，有钱人还是趋之若鹜把孩子往里面送，捷克太太因此结识了许多上层社会的阔太太。

捷克太太开贵族幼稚园开了 20 多年，不仅结交广泛，而且盈利不薄，在

新加坡的上流社会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捷克太太给胡一虎太太介绍了不少乐意投资的交际花、阔太太。捷克太太给胡一虎太太提出一个极好的建议，这间日本百货公司应走超级市场的路子，因为新加坡尚没有一间超级市场。

这间日本百货公司结果就把大厦底层全部用来作现代化超级市场，名为“亚欧汉”——YAOHAN，主要经营食品、中高档时装和零用物品。由于场地宽阔，交通方便，又有停车场，还有很多日本式的小食店铺，跟新加坡原有的英国人或中国人开办的百货公司相比，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而超级市场内的货品十分丰富，超过新加坡原有百货商场的水准，因此这间日本百货公司一开张，便车水马龙、生意兴旺。

胡一虎太太随后去了一趟日本，日本是她的娘家，她在那里更加如鱼得水，日本之行，她为“亚欧汉”募得了足够的发展资金，联系好了进货来源。“亚欧汉”大红大紫，又开了两家分店，生意都十分红火。

胡清才夫人的身体始终未能康复，因此也始终未能参与“亚欧汉”的经营。胡家的其他人也没有投入资本，“亚欧汉”虽然风光，却只是胡家的一个东洋媳妇开创的事业，与胡氏家族没有关系。胡清才夫人东山再起的计划，由于胡清才自杀身亡，而未能付诸实现。

胡文虎青年时代继承父亲的家业，经过艰苦努力和开拓，使永安堂事业逐步发达，到太平洋战争前看达到鼎盛。自本世纪20年代始，半个世纪当中，胡文虎的声名在中国、在世界广为传扬，特别是在散居东南亚的2000万华人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堪称一代天骄。胡文虎的家产在富豪遍地的南洋也许还不是很首屈一指，但万金油的流传却至少遍及了半个地球；而胡文虎身为富豪之外，还有一项额外的荣耀，是他一生创办了10多种报纸，成为举世瞩目的“报业大王”。尤其是他一手创办的《星洲日报》，在他故去那一年竟因为得一“神笔”，敢怒敢言，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报坛脱颖而出，成为“唯一能替华人说话，唯一能为华人社会服务”的报纸，声誉鹊起，连日本和西欧都刮目相看，认为是“稀有的、能以亚洲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有声有色的新闻纸”。

可是胡文虎辞世之后，他虽然有好几个儿子，或早亡，或不成器，或年幼未自立。胡蛟虽然一度借助李星可，把个半死不活的《星洲日报》振兴为独霸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报坛的舆论权威，在海外华文报业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但他终因贪利忘义，先出卖了胡清才的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使“虎豹”股票一出笼便马失前蹄；而他对部下刻薄寡恩，使“心腹”喷而告密，又使“台柱”怒而辞职。他心胸狭隘，欲暗箭伤敌，却反而伤害了自己。《东方太阳报》编辑部集体辞职，关门大吉，胡蛟终落得身败名裂，从此一蹶不振，销声匿迹。

胡文虎委以重任的侄子胡清才，只是一位生长于富家未经风雨的大少爷，他也曾想发扬光大父辈的事业，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几经挫折之后，曾经辉煌的永安堂在他手中变作一个烂摊子。他无力收拾，心灰意冷，算盘都没打一打，就把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的祖业全部卖光；之后又为政府当局所迫，将《星洲日报》赔钱赎回。胡清才后悔莫及，深感愧对祖先，终于服毒自尽。

胡文虎的永安堂在仰光的发祥地被当地革命政府没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大本营也土崩瓦解，栋折梁摧，眼看着他一生搏下的大业在他身后就要

尽付东流，烟消云散，却不料跟母亲胡金枝偏安香港的胡仙小姐，不但守住了父亲留下的半壁江山，并且单枪匹马，越战越勇，替胡家打出一片新天地来。这是胡文虎万万没有想到的。

当初胡文虎把“星岛”报业分给胡仙，只因为胡仙跟母亲陈金枝住在香港。那时候香港处于动荡的过渡时期，越南战事打得正热闹，香港的局面令人担忧，新加坡的胡家人没谁愿意去香港，而陈金枝却宁愿住在香港，她不愿在新加坡做二太太，而远离胡家人，是非也可避开些。

没想到香港的形势日趋好转，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又处于内地与台湾的对峙之中，左右逢源。天时大吉，为胡仙提供了海阔天空的舞台，这是她比她的兄长们幸运的地方。

第三十九章 一枝独秀 星岛飞黄腾达

头一天上班，胡仙紧张得连早餐都没能吃下去。她像一个普通职员那样，提着个文件袋，走进上班的人流。那天她特别朴素秀美，没有任何打扮装饰。她挨门挨户去见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而不是坐在经理室等他们来请示汇报。大家都议论自己的新老板，不像初出茅庐的千金小姐，而像干大事的人。

胡仙出生于1932年。她出生后3个月，被胡文虎所抱养。此时，胡氏家业已经很大，胡文虎在缅甸、泰国、新加坡、港澳、中国内地等地，到处都有商号。

胡仙是幸运的，自小到大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她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学校的高材生，尤其写得一手好文章，又擅长绘画。她是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喜爱文学艺术。在她的家庭中，她从来没缺过钱，所以她也从来没想过要赚钱。她未来的理想是要做画家和作家，从来没想过经商、办企业。

可是三兄胡好不幸早亡，父亲胡文虎过世，把胡仙一下子由幕后推到了前台。22岁的胡仙，还刚刚迈出校门，她虽然少年时代就开始写文章发表，对报纸并不陌生，但是要让她管理出版，领导一个企业，指挥公司的层层职员，就的确是太难为她了。

职员们都知道新主人对办报不熟悉，对商业一窍不通，深为报社的前途担忧、焦虑，只怕报纸办砸了，大家的饭碗也要砸了，胡仙分明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自己的成败事小，全体职员的命运都系于她一身。

头一天上班，胡仙的内心特别紧张。一想到自己往经理室的椅子上一坐，各部门干部鱼贯而入，请示汇报，她该怎么答对，怎么批示，她的心就砰砰地跳，只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早餐一口都没能吃下去。

嫂子陈秀蓉（胡好之妻）在一旁见了，为她捏一把汗。陈秀蓉对胡仙说：“今天是你第一天到经理室上班，嫂子陪你一道去吧。”

胡仙苦笑一下道：“人家见了会怎么想，经理还是孩子，要人陪着上班？”

后来，胡仙像一个普通职员那样，提着个文件袋，夹在上班的人流中走进了报社，走进了经理室。她选择了那样的时刻，那样的方式，是想让大家看到，与他们一样的一个普通人来上班了，只是彼此分工不同、同职不同罢了。她向同事们点点头，同事们也向她点点头。一切就这样自自然然地开始了。

那天见到胡仙小姐的人回忆说，胡仙小姐穿得很朴素，没有戴任何首饰，秀美的面容含着一丝淡淡的忧郁，也透着机敏、沉静。

胡仙没有坐在经理室的椅子上，等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去见面，而是主动挨门挨户到报社各科室造访大家。她的话不多，也没有任何指示，见到各部门负责人，只问：“有哪些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

和记者、编辑们见面时，胡仙说，她知道大家很辛苦，工资不高，她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把报纸办好，希望大家支持。

当时在报社工作的一位记者谈起这些，感慨他说：“人真奇怪得很，一个年轻女孩子，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我们想发泄的一肚子气不知何时就消掉了。我们觉得她虽然嫩，但很实在，她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她是一

个可以信赖的人。”

胡仙头一天上班的情形给报社员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议论自己的新老板：认为她很有涵养，很有城府，不像初出茅庐的22岁的小姐，而像是干大事的人。

胡仙接手的时候，星系报业各单位有亏有盈，整个报系平衡之后、略有盈余，每年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但是星系报业这样大一个摊子，这点盈余简直是杯水车薪，在香港买一个普通套间就要几十万，如果把这笔钱折合为报系职员的工资，也仅够支付一年。胡仙听了财务的汇报，心里不能不急。

胡仙意识到，她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尽快使“星岛”摆脱经济上的窘境。一份报纸要办好办得出色，首先需要解决生存的问题。假如生存都没有保障，一不留神就可能关门，“好”和“出色”又从何计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仙认为：“一份能赚钱的报纸，就是一份好报纸。”

胡仙上任后的第一步是从管理体制上入手。她在报系实行现代最流行的“事业部制”的管理方法，即由总公司制定一个方针和基本的业务范围，具体事情由各事业部门承包负责。

这种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管理办法立刻见效，只一年间，星岛报系各部门的利润便翻了近一番，职员们的口袋也沉实多了。大家都佩服新主人胡仙小姐的能力，说这个年纪轻轻、斯斯文文的姑娘“比她父亲还厉害”。

50年代末，香港刮起一股“共产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的传言，一时间人心惶惶，一度开始繁荣起来的市场开始变得冷清，使香港进入经济萧条状态。

“厚岛”由胡仙接手，刚有起色，便遇到这样恶劣的大气候。当时，《星岛日报》已增发欧洲航空版，报纸每天销往欧洲各大城市，同时也销往台湾。由于这个传言，海外的代理商纷纷要求尽快中止合同，他们担心一旦香港气数完了再采取行动便来不及了，每天都有代理商退回一些头天没有卖出去的报纸。报纸亏损，公司亏损，形势十分严峻。

胡仙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想方设法打探内地的“行情”。她将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转达给报社职员，“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动”。报社职员们吃了“定心丸”，安心专注于报社工作。胡仙则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台湾、美国、巴黎、澳大利亚，向各代理商、经销产阐明民势，打下保票。她同时对报纸的版面作了改革，其内容与社会生活贴得更近了。胡仙所做的一切，不仅对《星岛日报》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有效的努力，而且对稳定投资者，恢复和发展香港的繁荣也起了一定作用。

那一时期，胡仙为拓展业务，时常往来于英美等国家。有一次在旧金山，胡仙在街上偶然遇见一位陌生男子，是华人，听说胡仙来自香港，便向她打听有关香港的情况。那男子问她：“香港正发生什么事，前景如何，能告诉我吗？”

胡仙在路遇这位陌生男子之后，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里需要一份中文报纸，是的，非常需要！成千上万的华人身居异域，就像这位陌生男子，他们渴望得到自己本上的消息，而这是他们无法从异域得到的。

这件事触动胡仙，使她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很快，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和伦敦，便都有了《星岛日报》海外版，“星岛”的新闻通过卫星传讯到这些聚居着大量炎黄子孙的城市。

胡仙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海外的新一代华文报读者与

他们的上一代移民已有所不同，他们的中文水准越来越低。根据这种情况，胡仙又将海外版的某些篇幅以双语刊登。

70年代初期，香港的华人大亨为数尚有限，而且甚少为海外所熟知，但胡仙却已与不少国际上知名的报人同道保持密切关系。她和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跨国报业机构主人汤普森爵士成为莫逆之交；她与享誉世界的伦敦《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报的报人、总编辑都有广泛友好的联系。“国际新闻协会”是一个网罗世界主要新闻出版机构的组织，其会员都是非富则贵的知名人士；胡仙作为报业公主，她的出现艳光四射。

1971年，她被选为该组织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主席，同时也是第一个得以登上此座的亚洲人。

与此同时，胡仙还在华侨界领导了一个泛亚运动，成立汉语新闻学会，募集资金，致力研究现代化的植字机器。另外，为了同行的利益，她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支持当时仍在孕育阶段的亚洲新闻基金会，并成为这个团结亚洲新闻出版人及编辑的组织的创办人兼信托人。胡仙为亚洲新闻出版事业，特别是中文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赢得了同行的认可以及广泛的国际友谊和声誉。

进入60年代后，电视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体切入香港人的生活。香港电视一天24小时播放，什么新闻都有，现场、实感，绘声绘色。报纸受到了威胁和挑战。报社内部有不少人觉得“搞报纸没前途了，报纸早晚要被电视取代”，有的记者交出了记者证，到电视台去应聘；有的则干脆弃文经商。

报纸难道真的没前途了，报纸最终将被电视取代？胡仙带着这个问题开始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半年的跟踪调查，汇集在胡仙办公桌上的信息是，人们不是不需要报纸，而是越来越需要报纸，只是人们对报纸的要求更高了。人们不喜欢那些干巴的新闻，而要求报纸更具有可读性。如一位被调查读者所说：“今天的人们那么忙，就是‘寻人启事，也要写来让人读得轻松啊。’”

胡仙向总编们提议，第一要增加报纸的信，息量，加强和经济界、文化教育界、行政界的联系，以反映各界人士的要求和向各界人士提供信息；第二要增强报纸的可读性，文章力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有趣。胡仙说，我们不是要与电视抗衡，而是让报纸率先同广播、电视、电影合作，加强电视电影节目的预告、介绍和评论。

星系报业因此又经受住了一次考验，并且更上一个台阶。1973——1974年度，《星岛日报》缴税后的盈利近1500万港元，这是令欧美很多大报发行人也为之眼红的。

随着香港经济繁荣，报刊也日益增多，人口数百万的香港，报纸有100多家，报业的竞争十分激烈。胡仙在竞争中表现出非凡的魄力和见识。她彻底改变传统的发行办法，利用通讯卫星，把《星岛日报》当天在香港发行的报纸内容送达纽约、巴黎、伦敦，在当地当天印刷，当天发行。为此胡仙不惜血本，聘请了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作顾问。《星岛日报》安装了先进的电信设备，接收报社派驻世界各地记者和信息站发回的信息。

《星岛日报》的销售量突飞猛长。

1972年5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胡仙仍旧出任董事长。

星岛报业有限公司改名后的第二个月，发行上市股票，当时正值股市欣欣向荣之际，星岛报业有限公司不失时机地把它的412.5万股股票上市。

香港市民看好星岛报业的效益，尽管每股面额 2 元的股票升水卖 6 元，市民们仍然争相购买。而在股市高峰时刻，“星岛”的股票竟被炒至每股 20 余元的高价。

“星岛”上市前，胡仙本人拥有 96.7% 的股权。“星岛”上市后，胡仙本人仍持有 86.7% 的股权。如果按股市高峰期的股价计算，胡仙在“星岛”的股权就值 4.3 亿元。

到 80 年代，星岛报业已由胡仙接手时的年利润百万左右而跃至年利润 1 亿港元。“星岛”的主人也由当初文弱的千金小姐而变为世界瞩目的最有财势的女人。

而自 1974 年以来，胡仙又对地产业发生浓厚兴趣，她开了几家高档的礼品店，还在旅游业和餐馆业方面有良好的投资，她属下及联营的机构多达 37 家，遍布全球各地。据统计，她的财富不少于 10 亿港元，她排在香港十大女富豪前列，成为香港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断然是她父亲胡文虎生前所料不及的，这个貌似平常的女儿竟会有如此惊人的出息，胡文虎的死后余荣竟全仰赖着这“一枝独秀”而得以延续。

第四十章 走向国际 星岛全球第一

伊沙特博士在颁奖时确认，《星岛日报》为全球第一份国际性报章，而胡仙是第一个适合接受美国“卡尔·范·安达奖”的外国人，因为她是唯一“思想与行为国际化”的出版家，她的可敬之处正是：面向世界。

“卡尔·范·安达奖”是美国俄亥俄大学颁予对报章出版及新闻业作出长期贡献的人士的最高荣誉。该奖项自1968年创立以来，只颁予美国的出版家与新闻从业人员。但是，1988年胡仙获得“卡尔·范·安达奖”，成为首位外国获奖人，并使“卡尔·范·安达奖”从此成为国际性奖项。

“卡尔·范·安达奖”为什么对胡仙独加青睐？

“卡尔·范·安达奖”的创立，是借以纪念1904年至1925年出版《纽约时报》名闻一时的执行编辑卡尔·范·安达。他是俄亥俄大学的一名学生，被公认为是划时代的最出色的编辑，也是《纽约时报》出版人奥查斯的最得力助手。

卡尔·范·安达的才能不只局限于一名记者和编辑，他可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在他领导之下，《纽约时报》成为首份宣扬爱因斯坦学说和报道发现南北极新闻的报章，在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铁达尼号”邮船沉没后的消息上，《纽约时报》也比其他报章出色。甚至时至今日，《纽约时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铁达尼号”邮轮沉没的报道，仍可称得上是新闻界的杰作。卡尔·范·安达是少数极其用心钻研其报章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之一，当《纽约时报》报道发掘埃及古墓时，他曾对埃及的文化与历史进行研究，结果竟是他第一个发现吐特皇是被谋杀的，考古学家稍后才对此加以证实，而当《纽约时报》宣扬爱因斯坦学说时，他开始钻研数学，结果发现爱因斯坦的一篇文章在数学计算上出现错误，爱因斯坦核查之后承认自己犯错。

《星岛日报》是以中文出版及中国人所拥有的报业集团的旗舰，它是最大规模的中文报业集团，虽然与其他外国的大型报业集团比较，它还是逊色的，例如外国的汤普森报业旗下拥有97份报章，甘尼特报业拥有90份，而梅锋集团也拥有50份。

自从《星岛日报》创刊以来，它已取得华文报界历史上罕见的崇高地位和影响，虽然与某些世界知名的报业相比，它尚未达到国际水平，但在胡仙领导之下，却在某些其他报业人士未能做到或不敢勇于尝试的事情上取得成功。

胡仙将《星岛日报》发源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七个主要城市，七个地区都沿用《星岛日报》这一名称。而每个城市出版的《星岛日报》都拥有本身的印刷机、编辑部、采访记者及独立的发行与广告办事处。

《星岛日报》的不同海外版都各自刊登当地的广告，而以多伦多版最为成功，每天都出纸54页。

香港、中国及国际性的新闻都在香港的编辑部拼版，然后由人造卫星传送到不同城市的星岛海外办事处，至于地方新闻，则由当地的《星岛日报》工作人员报道。因此，在香港、三藩市、纽约、多伦多、温哥华、悉尼与伦敦等七大城市出版的《星岛日报》，都各自具有本身的特色，并在财政上取得成功。

《纽约时报》曾经试图在洛杉矶刊出西岸版，结果只维持了两年，在1964

年结束；后来又试图以同样报名发行欧洲版，结果严重亏蚀，于1967年停版。

其他报章也有用同一报名发行不同版的例子，日本的三份大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分别在日本5个城市出版，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出版4个地区版，但那都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发行，不像《星岛日报》，在海外独立出版。

唯有《国际先驱论坛报》接近《星岛日报》的模式，但这份报章却只是在全球10个大城市印刷，而没有在这些城市进行编辑、加工和出版。至于全美发行的《今日美国》，情况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的传统，报章多以出版区域或编辑方针作报章的名称，如《纽约时报》即以出版区域命名，《金融时报》则以编辑方针命名。读者也已经习惯以此分辨报章风格。这也是《纽约时报》欧洲版和西岸版最终归于失败，以及大规模的报业集团并不以同一报名在不同的城市或国家出版的原因，因为读者偏爱阅读所居地方出版的报章多于外地的报章。

但是胡仙的所作所为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取得成功，她改变了传统，显示了开创先河的魄力。俄亥俄大学的史克普斯新闻学院院长伊沙特博士在颁发奖项时确认，《星岛日报》为全球第一份国际性报章。

伊沙特博士指出，胡仙是唯一第一个适合接受“卡尔·范·安达奖”的外国人，她是唯一“思想与行为国际化”的出版家，她的可敬处正是：面向世界。

美国俄亥俄大学史克普斯新闻学院在给胡仙颁奖时，发表如下赞词：在亚洲、欧洲及北美七大城市发行《星岛日报》，使之成为第一份真正的国际性报章。

领导华文报章，特别是率先采用卫星传真出版报纸及创立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成为该会的永久名誉会长。

致力促进国际性新闻事业，加强世界各国新闻从业人员间的友谊及担任国际新闻协会两届主席全力支持新闻教育及提高新闻事业的水平。

在受约束的环境之下坚定新闻自由的原则。

胡仙的获奖，显示中文报纸受到国际重视。它无疑是中文报业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

1988年，《星岛日报》迎来了它的第50个春秋。值此大庆，美国各大城市相继宣布8月1日为“星岛日报日”。

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在以往一个多世纪以来，华裔市民与纽约所有市民分享其年盛的传统和重大的成就。

纽约星岛报业充当了华裔市民与他们故乡的桥梁，亦担任了华裔纽约市民与这个他们选择安居乐业的地方之间的连系。

本人郭德华，谨以纽约市长名义，郑重宣布1988年8月1日为“纽约市星岛日报日”。

以祝贺该份重要文化刊物50周年纪念志庆。

波士顿市长雷蒙·连在他的宣布书中道：华人社会在波士顿已有超过100年历史，对本地多元文化提供贡献；该报为波士顿的华人社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每日提供精确和客观的消息，并热心参与本地的社会公益活动；星岛报业波士顿办事处在文化、社会、教育事务上充当本地与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桥梁，已有8年余；1988年8月1日将是星岛报业的金喜志庆，本人，雷蒙·连，谨以波士顿市长名义，郑重宣布1988年8月1日星期一为“波

士顿市星岛日报日”。本人谨此呼吁全体市民向该份对我们的生活质素作出贡献的报章致意。

芝加哥市市长欧根尼·索那兹宣布说：有鉴于芝加哥的《星岛日报》作为香港的星岛报业有限公司的附属机构，为沟通华裔芝加哥人与他们家乡而服务；有鉴于《星岛日报》每日出纸 36 页，新闻内容包括国际、美国、华人社区、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有鉴于该报还提供有关国际、全美及唐人街社区方面的财经新闻、消遣旅游报道、健康与医疗专栏、娱乐电影动态以及小说及特写，所有这些使《星岛日报》作为“丰富多彩的报章”而当之无愧，对不同年龄、教育的人士均能满足其兴趣；有鉴于芝加哥的《星岛日报》将于 1988 年 8 月 1 日与其香港的，总部共庆创办 50 周年；本人芝加哥市长欧根尼·索那兹特在此宣布 1988 年 8 月 1 日为“芝加哥星岛日报日”，以祝贺该报 50 周年，并促请全体公民认识到届时安排的各种活动。

而在此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贺信贺辞雪片般飞往《星岛日报》。英国保守党主席彼得·布禄基代表撒切尔夫人，英国工党党魁甘诺克，英国外相贺维爵士，美国总统里根，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牙买加总理爱德华·沙嘉，加拿大总理莫朗尼，澳洲总理霍克，港督卫奕信爵士，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等各国各地区政要首脑都发来贺信，足见《星岛日报》在国际上的卓著声誉和良好影响。

胡仙把父亲胡文虎当初只为能省下广告钱宣传虎标良药而创办的一张普通报纸，终于推为全球第一份国际性报章，她获得“卡尔·范·安达奖”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十一章 良苦用心 重服务轻政治

“报纸跟别的生意不同。那天我和一个朋友谈到，常有人看到一份报纸办成功时，即很有兴趣去办报，但他们不知办报要经过多少年艰苦。别的生意开张后，可以知道几时不亏本，不亏本就是赚钱，可以预算出一两年之内的数。但报纸不同，你不知要亏多少年。”胡仙说。

服务社会，是《星岛日报》一贯的宗旨。早在《星岛日报》创刊伊始，胡文虎即已出钱出力，接待由广州逃避战乱来港的难童，又派人去云南，扩充云南孤儿院，造福无数儿童。

《星岛日报》最为人称道的社会服务，当为每年农历岁末的济贫运动。

“星岛”的济贫运动始于1956年，历年累积善款达数千万元，受助人士100多万人次。

“即筹即派”是“星岛”济贫运动的最大特色。“星岛”对于所筹集的善款，总是立即作最有效的分配和运用；而通过政务处协助，赶在春节前派发的“发财利是”，受惠者远及岛外与偏僻地区，使人们倍感温情。

自1976年第21届济贫运动始，又设立了“星岛基金”，积极推行各种社会福利工作。基金会济急扶危，赈助灾民，贷款赞助贫苦学生，设立工业训练奖学金，使无数清贫好学的学生，能安心学业。

1983年，济贫运动又响应联合国国际伤残人士年，拨出部分善款，发起“轮椅康复运动”，为伤残人士购买轮椅，使近百名伤残人士受惠。

每届济贫运动，不少老年人和小朋友，都亲自将善款交到“星岛”济贫本部，海外读者也自各地寄来款项，各工商机构、学校社团、专业团体，更是鼎力共倡善举，使严冬中进行的这项盛事，洋溢一派温馨春意。

此外，“星岛”主持的环岛竞步、全港烹饪比赛、业余歌唱比赛、儿童健康比赛、全港中学公开辩论比赛等，都备受市民关注。

《星岛日报》主办的“环岛竞步赛”是香港体坛和市民都注目的一项盛事。这项比赛自1956年起到1971年，共举办了13届，后因香港市区迅速发展，交通日趋繁忙，无法再进行这类大型的体育活动而停办。

首届环岛竞步赛便吸引了近500名参赛者。步行路线由香港政府球场出发，沿贡皇道至筲箕湾，上柴湾道，入石澳道及大潭道，再经赤柱入浅水湾道，经深水湾、黄竹坑、香港仔、摩星岭、西环，沿电车路返回起点，其后路线稍有变更。不少市民在晚饭后即涌出街外观看最后阶段竞逐，并以掌声鼓励参赛者，场面至为热烈。

竞步赛事中最引人注目的运动员当属苏锦棠。苏锦棠曾获六届冠军，并在“星岛”的赞助下，参加1964年的奥运会。这也是首次由商业机构赞助运动员参赛奥运会，足见“星岛”对体育运动的热心与推崇。

而《星岛日报》海外版，除了为旅居海外的同胞在侨居地提供最新而翔实的新闻外，也同样提供多元化服务。

“星岛”海外版办事处所提供的服务，许多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例如，1981年7月，加拿大邮政大罢工，香港至加拿大邮递服务中断，《星岛日报》免费增辟“加拿大读者代邮”服务，短短一周内，两地共代办函件6000多封，帮了读者的大忙。

又如在纽约，有一年农历新年下起暴风雪，冰封道路，数以千计的汽车

陷入白色世界，不能动弹，市区积雪厚达 22 寸，交通停顿，华埠全部报纸停刊。但是《星岛日报》的人造卫星传真版准时传到，一声总动员，纽约办事处全体人员冒着大风雪，气喘吁吁分头为读者送报。

温哥华也有类似情况。大雪两日，市民寸步难行。读者打来电话，说两日未出门，极想读到报纸。办事处工作人员立即将报纸送上门去。

在悉尼，有人要寻访海峡两岸音讯断绝多年的亲友，“星岛”义不容辞相助。自越战后，《星岛日报》连续多年刊登“印支难民通讯”，使许多流离失散的骨肉获得联系，别后重逢。

海外侨胞如有婚丧讯息转告香港亲友，《星岛日报》也有专栏刊登启事。三藩市曾有一位中年读者在律师陪同下来到办事处，要求找一份多年前的《星岛日报》，因为那上面有一则讣闻，可以证明他在香港的妻子果属结发之妻，以便移民。

在伦敦，新界乡亲打听故园物业市道，海外版办事处立即向香港总社传达要求，换地权益书、地产价格之类资料随传随到。

事无巨细，“星岛”只要能帮上读者的忙，总是尽力而为。《星岛日报》的海外各地酒楼餐馆介绍栏，颇得读者称道。吃惯油盐饭菜的华人出门在外，每天几顿全部西菜，胃口“淡”得发慌，能按址吃到米饭炒菜，算是幸事。

海外的华人社区都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对农历的 24 节气或许已不大留心，但对于一些重大节日仍然要隆重庆祝。“星岛”每年印制大量新旧历对照的日历，分赠海外读者，深受欢迎。而每年的农历新年，海外版增刊都要以一整版刊登“十二生肖流年分析”，更为读者喜欢。

各海外版积极参与和推动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经常举办节日联欢集会，每逢春节、端午、中秋，都设法安排一些应时节目。

“星岛”举办的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曾使澳洲当地人轰动。《星岛日报》并赞助澳洲队来香港参加国际龙舟大赛。海外版在欧美等地还举办中秋节同乐会、元宵灯会，每次盛会都吸引成千上万的华侨参加，其乐融融。

“星岛”注重服务社会，但却避免谈政治，这是自胡文虎创办“星岛”以来的一贯方针。胡文虎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从不以知识分子自居，他办的报纸因此很少提倡或鼓吹什么政治主张，这个在商言商的传统，他在世时一直努力保持。而胡仙则沿袭了这一传统。

在香港，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人们都说第四个机构就是新闻界了。

“星岛”日、晚报每天读者超过 100 万，如果胡仙存心要建立某种影响力的话，她的确可以成为香港最有权势的女人。不论是针对政府抑或针对个人，只要她的报纸穷追不舍，深究到底，对方便会弃甲而逃，难于应付，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追查“水门事件”。但是胡仙放弃了这种特权。

对此，胡仙曾回答记者说：“政治，我们不是不要碰，而是希望可以走中立路线……香港的情形不同于别的地方，在别的地方，你可以有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在香港，要有自己对政治的看法，根本行不通，不论台湾或大陆的事，我们都希望报道真正的情形，作中立的报道。”

可知，虽同样是不谈政治，胡仙已不是像父亲胡文虎似地纯粹的在商言商，而是由于处于内地与台湾海峡对峙的尴尬情势中，出于无奈的一种明智选择。

这一点，在胡仙的另一段答记者问中可以得到印证。

记者问：“假如碰到有社会上重要人物牵涉在内的话，你们是避而不谈，还是更加详细报道，采取一种不怕得罪对方的立场呢？”

胡仙答：“我们当然不怕对方，也不会因为他是要人而避开。”

记者问：“美国发生水门事件，那是《华盛顿邮报》揭发的，那家大报的老板也是女性。她受到的压力虽然大，但她始终坚持调查这件事。如果香港有同类事情，‘星岛’会不会这样做？”

胡仙答：“要是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当然也是一样做，可是我不同意《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他们应该报道，调查也是对的，但是不应该下判断（给 Opinion），更不应该在社论中说尼克松有罪，应该辞职。我觉得报纸不可以压迫人，说某人怎样怎样，报纸没权去判罪，或控诉某人；我总觉得他们的报纸这样做是不对的。”

记者问：“过去 36 年，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形，挺身而出，把不合理的现象揭发出来呢？”

胡仙答：“我们不是做过一件事吗？你们记得陈建建的事情吧？这个人也不是一个什么普通人，他被警察拘留起来，说是有政治问题，并且受拷打，我们就在‘虎报’和‘星岛’提出，加以抨击，说警察不该这样做，并替他辩论……政府说我们不对，要调查我们，我们也是很硬的和政府顶下去。最后当然还是我们吃亏的。不过我们是不怕这样做的。”

从这段答记者问，我们可以看出，胡仙所要回避的只是党派的政治，而非公正与道义，只要事关公正与道义，“星岛”是必定要坚持的，必定要打抱不平的。如果说每张成功的报纸都有其报格的活，那么公正与道义就是“星岛”的报格。

有人说，一张好报纸并不仅仅是巨大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更重要的是它“对公众所具有的优异贡献”和“言论独立”。由于种种原因和局限，“星岛”的“言论独立”也许还远远不够，但它对公众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并且，也许由于它自知“言论”不够“独立”，或设法“独立”，它在服务社会奉献公众方面便更加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以弥补其不足。

所以，谈到办报纸，胡仙深有感慨他说：“报纸跟别的生意不同。那天我和一个朋友谈到，常有人看到一份报纸办成功时，即很有兴趣去办报，但他们不知办报要经过多少年艰苦。

别的生意开张后，可以知道几时不亏本，不亏本就是赚钱，可以预算出一两年之内的数。但报纸不同，你不知要亏多少年。

我们是亏了 10 年才开始获得成功。如果有人肯出几千万，纵然肯拿几十万的话，也不知要亏多少年才可以回本，办报纸就是这样……”

第四十二章 短线出击 物业捷报频传

香港时局动荡，胡仙意欲向澳洲转移战场。悉尼英文小报对她甚为关注，称她为“神秘的唐人街皇后”。胡仙心灰意冷之际，遇上银行家宗德骅，在他游说之下，胡仙决定杀回香港。

“星岛”位于北角英皇大道 635 号的新闻大厦是一幢冷灰色的大楼。每天早晨 9 点多钟，胡仙驾着她的平治跑车去新闻大楼办公。

电梯开到顶楼，门开处，但冗鹅黄色的地毯铺满楼道，气派非凡。胡仙的会客室、办公室和经理室都设在这里。

胡仙的办公室布置得简洁明快，唯一的装饰是胡仙最喜爱的一张曾景文的水彩画。她的办公桌严如一张餐桌，不设一个抽屉，桌面上堆满信和文件，那是因为胡仙不愿把要处理的事情和工作积压在抽屉里。公司职员都知道，假如某个请示或报告 10 天之内胡仙都未给答复，那肯定就是否决掉了，胡仙的工作作风是不会拖拖拉拉、犹豫不决的。

这天下午，胡仙正埋头处理文件，秘书突然报告说她的母亲陈金枝女士来到。胡仙一愣，母亲可有什么急事，等不及她下班回家，而找到办公室来？

胡仙立即起身到会客室，但见母亲面有忧虑之色。

胡仙问母亲有何急事，母亲说她才从收音机里听到《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草签。

“香港要交回中共了。你父亲可是与中共交恶的，我们怎么办？”

陈金枝担心像仰光永安堂被仰光革命政府没收那样的悲剧发生。胡仙的忧虑并不轻于母亲，但是她性格冷静，多年来身居董事长之职，更修冻出沉着应变的能力。

胡仙告诉母亲，她已在澳洲筹备一份《星岛日报》航空版，并在悉尼的唐人街——高宾街购置了一幢楼房，开办了一间名为“福满楼”的酒楼，还开设了名为 Fonune 的房地产公司，如果香港有什么情况，他们随时可以移民澳洲。母亲陈金枝听了，这才稍稍释怀。她对澳洲这地方有好印象，风景宜人，气候温和。

从那时起，胡仙更加积极地进军澳洲。她先将“福满楼”的底层改建成一排小型的铺面房，又在后面的萨赛克街添买了一幢楼房，楼上是“星岛”的编辑部，楼下则是书店和文具店。

胡仙这一次到悉尼逗留较久，当地的英文小报对她十分关注，尊称她为神秘的“唐人街皇后”。

到 1984 年 11 月底，胡仙在澳洲悉尼的物业，除“福满楼”外，又增添了狄逊 (Dixon) 零售及办公室大楼、高本街 (CoubuTn Street) 的 PDS 大厦。胡仙还收购了一间名为“史密斯与迈尔斯”的上市公司。这一切在澳洲引起不小的轰动，市场揣测胡仙有意步怡和集团的后尘，以较低姿态撤离香港。

而这段时期，胡仙的母亲陈金枝、嫂子陈秀蓉、堂兄胡清德（胡文豹次子）等，都陆续去了悉尼，逗留了一段时日。所以，当时香港普遍认为，胡仙是安排了“太平门”，为使胡氏家业和资产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得以无损。

外界的揣测很快得到印证。1985 年 7 月，胡仙果然紧随英资怡和之后，把“星岛”迁册澳洲。

这时的胡仙不由得有些意兴阑珊，一直独身的她，在接受《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的采访时说：“我看胡氏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未来。也许每个人都会建立自己的朝代，可我不信这一套。我的父亲也建立过一个朝代，可是似乎没有人承接下去，那又有什么用呢？”

就在胡仙心灰意冷之际，她认识了受聘于澳纽银行派驻香港的上海人宗德骅（Stephen Tsung），彼此一见如故。胡仙引之为“军师”。在宗德骅的游说之下，胡仙恢复了对香港物业投资的信心。

胡仙决定杀回香港。她与具有新西兰背景的“怡胜太平洋”联手，以6.36亿港元购入广东道太阳广场的地皮；不到1年间，转售给日籍华侨孙忠利，胡仙个人和星岛集团各获利1.174亿港元，胜过报纸业务两年的盈利。胡仙因此对进军地产业雄心勃勃。

此期间，她接受一家刊物的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现柱能令我提起兴趣的，不再是长线投资，而是一些可在短时间内带来利润的交易。”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

胡仙尝到第一次甜头之后，与新西兰“怡胜太平洋”原班人马再次出击，于1986年9月组成基立实业，以两亿多港元向奔达国际购入半山Clovelly Court，以及位于山顶柯士甸道16至20号的住宅物业，准备翻新，以期增值。

不幸的是1年后出现全球性股灾，“怡胜太平洋”的母公司Ariadne资产跌价，被债权银行追讨欠款，需出卖资产解困。当时香港的股市虽然大跌。但地产市道却依旧坚挺，并且迅速回升。到1988年4月，胡仙和新西兰“怡胜太平洋”把“基立”股权出让给经营免税店的兆亚集团，“星岛”和“怡胜”不但没有损失，还略有所获，赚了2900万港元。

在“基立”出让两个月之后，胡仙再次出击，这一回她是单枪匹马。1988年6月28日，胡仙通过星岛集团以1.4亿港元购入深水湾香港道的Deepdene住宅物业；几天后，又以1.7亿港元购得中环干诺道中的三和大厦，两处合计投资3.1亿港元。

虽然胡仙起初表示欲将三和大厦作为“星岛”总部，但不出半年，她却将三和大厦以2.34亿港元出售，赚得6400亿港元。1989年5月，胡仙又将深水湾的Deepdene以1.78亿港元出售，不足1年，获利3800万港元。

胡仙屡战屡胜，4年内仅地产业共赚了3亿港元不止。可惜她对香港的前景不看好，抱有短线心态，所以几笔生意都是速战速决，见好就收，使她未能赚尽赚足。

星岛报业集团在1985年间，购入多项香港物业。当时正值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之后，香港地产仍处于低谷，物业价值是相当低的时候。胡仙这时入市，时机可谓拿捏得当。

胡仙与“怡胜”联手以6亿多港元购得的广东道太阳广场地皮，不到1年，便急急抛出。当时非常看好香港地产市道的日籍华侨孙忠利以8亿多港元买下。

孙忠利投资将这块地皮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写字楼和酒店的物业组合，现时估价在35亿港元以上。

相形之下，胡仙虽入市时间准确，但所赚得的钱相对而言只是“微利”；而孙忠利虽不是在最平的价位入市，但所赚到的却是“大头”。胡仙面对孙忠利这后来居上者，当有小巫见大巫之慨叹。

新闻大厦是星岛报业集团的旗舰大厦，胡仙在1987年将它以7000万港

元售予玉郎集团，这幢大厦在 1989 年估值达 1.4 亿多港元。

此外，“星岛”在 1987 年购人的中环三和大厦，也在 1988 年急急出售。这些都显示胡仙在 1985 年至 1987 年间所购入物业，均属短线投资，其原因便是胡仙对香港地产市道缺乏信心，因而不敢长线持有。

如果胡仙不是看淡香港，而将 1985 至 1987 年在香港的 物业一直持有至今，星岛报业的资产现时应甚为雄厚，而胡仙个人的家财也会大有进账。

第四十三章 收购玉郎 成功是福是祸

胡仙这一次胃口太大，战线拉得太长。她原本是想如前番那样闪电出击，赚钱盈利，无奈天有不测风云。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时候，胡仙居然又收购了玉郎集团。黄玉郎起先投靠钱国忠，遭到“追杀”，转而投向胡仙。

胡仙在地产上连连获胜，对于地产这一行业兴趣愈浓，也充满自信。

虽然胡仙的战果都是在香港取得，但她心中对香港的前景始终留有阴影，所以她在香港不但不敢作长线投资，而且也像不少香港人一样开始作出“走资”的部署，在海外置业。

1988年和1989年，胡仙在加拿大及英国共购入5项物业在悉尼购入一块地皮，兴建一幢名为West Side的大楼，在这项计划中，“星岛”是与其母公司“仙人掌澳洲”合作，分别占两成半及七成半权益。

在加拿大多伦多，“星岛”也以联营方式持有市中心假日酒店50%权益。这家酒店共拥有717间客房，为四星级酒店。

此外，该集团也在多伦多持有位于Ajax区的一座购物商场，名为“发现湾中心”，连同另外两个购物商场在内。星岛集团在多伦多拥有的商场而面积达10万平方尺。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星岛”也拥有位于烈治文区市中心一块面积约51.377万平方尺的土地，以及在west End的一座高层公寓大楼。

在英国伦敦，“星岛”拥有一项店铺及写字楼的物业投资组合，位于唐人街地带的西区。此外，“星岛”还在伦敦中心区拥有一幢写字楼。

除了澳洲、加拿大和伦敦，“星岛”又在1989年购入新西兰位于Karangahape大道的一项地产发展项目。这项计划是“星岛”与胡仙个人合作。各占一半权益。

与此同时，香港物业市道再度攀升，胡仙禁不住诱惑，在1989年3月的地产高峰期以7.5亿港元向“鹰君”购入北角海景商业中心（前屈臣氏中心），其中九成多资金是来自银行借贷。

胡仙这一次胃口太大，战线拉得太长，她原本是想如上几次那样闪电出击，赚钱盈利，无奈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香港地产市道急剧下跌，同时海外的地产市道也大幅度滑落，胡仙想要收也来不及。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时候，胡仙居然又收购了持有《天天日报》的玉郎集团（后改名为“文化传信”）。

这件事说来话长。

玉郎集团的创办人及前任主席是香港著名漫画家黄玉郎。

黄玉郎是将香港漫画企业化的第一人。1986年7月，以黄玉郎为首的玉郎集团公司正式成为全世界股票市场第一家上市的漫画公司。玉郎集团上市可谓轰动一时，连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称他为“画出彩虹”的神奇人物，并予以详尽报道。

当时，黄玉郎可谓春风得意，他自称为“玉郎大帝”，称手下人为“御林军”，他的集团因此而起名为“玉郎帝国”。

玉郎集团上市时，价值近3亿港元，黄玉郎个人持股75%，在玉郎帝国中稳坐钓鱼台；而且，画漫画是他的老本行，海外市场大有发展余地；加上

适逢香港股市大牛市，玉郎股价起飞，每股升到4元以上。黄玉郎身家也随之骤升4倍，进入10亿富豪之列。当其最为繁荣之时，玉郎帝国拥有20亿资产。黄玉郎原名黄振隆，祖籍广东潮汕。10岁时即首次刊出漫画，当他去报社领稿酬，报社的人都不相信那幅画是出自这小男孩之手，唯有当场叫他另画一幅，黄玉郎才得以领取到他人生中的第一笔稿酬——4元港币。

因为家境贫寒，黄玉郎13岁便到时代漫画社当学徒。其后他饱经磨砺，画漫画，办报纸，屡跌屡起。凭着天赋和勤奋，他终于以成名作《龙虎门》打破了日本漫画在香港的垄断局面。

1975年，当黄玉郎24岁时，他最终将香港漫画市场从日本人手上夺了回来。

1987年7月，玉郎帝国收购了《天天日报》，黄玉郎要办一份成功报纸的愿望得以实现。同年，他被评选为香港十大杰出商业奇才。

然而，黄玉郎时运不济，正当他的玉郎帝国蓬勃兴旺之时，不幸遇上世界性股灾，这次股灾之惨重，全世界股民都几乎无一幸免。玉郎帝国因此亏蚀了2亿多港元，令玉郎集团的创作和发展陷入停顿状态。而黄玉郎本人也因理财不当，光是炒“期指”便损失3亿港元。

黄玉郎因此被判了4年刑，锒铛入狱，他辛苦创建而曾经一度风光的玉郎帝国拱手让给了“星岛”的女老板胡仙。胡仙个人联同星岛报业收购“玉郎”，可谓处心积虑，这事始自1989年初。

1989年2月，曾为胡仙效力、后自行创办《资本杂志》的郑经翰，提出以每股8角收购玉郎集团普通股，以及分别以每股1角2仙至1角6仙收购玉郎集团1994和1998年认股证，表面上是郑经翰收购，实际操纵者是胡仙，胡仙希望通过郑经翰的收购，摸清楚黄玉郎的底牌，也即黄玉郎的持股量。

玉郎集团在1989年1月公布的1988年至1989年半年业绩，显示黄玉郎截至1988年9月底，持股量由同年3月底的53.14%下降至36.42%，这便引起了胡仙的注意。而“玉郎”公布这项业绩时已是1989年1月底，与1988年9月已相距近4个月。

郑经翰在2月11日提出收购“玉郎”，至3月21日已证实失败。胡仙这时便由幕后走到幕前，透过美国信孚亚洲在市场大举吸纳“玉郎”股份，特别是大量吸纳认股证。一时间，“玉郎”认股证成交大增。初时，市场还不知市场的大买家是胡仙，以为另有其人，以后才慢慢披露出来。

胡仙收购“玉郎”由暗而明，自然要传到黄玉郎耳朵里。显然，胡仙大量吸纳“玉郎”，是要将来运用，以摊薄他黄玉郎的四成股权，夺取玉郎集团控制权。

黄玉郎后面有债权银行，要求黄玉郎偿还用“玉郎”股份作为按揭的贷款；这时又正面受到胡仙的猛攻，挑战他的控制权，腹背受敌，情势十分危急。

黄玉郎别无他策，只有寻求外援，他搬夹钱国忠做救兵。钱国忠和林建名同意向黄玉郎提供一笔逾亿元的贷款，但条件是黄玉郎须将其所持的39.54%的玉郎集团股权按予钱国忠、林建名二人。黄玉郎因此而得到资金清还其他债款。

黄玉郎原以为与钱国忠关系良好，将股份按揭给钱国忠、林建名不会有什么问题，谁料情况不久即发生变化。

1989年4月20日开始，商业罪案调查科调查黄玉郎及其有关人士，之

后这些人被定案控以涉嫌造假帐罪名。6月2日，财政司委任笈马域会计师等调查“玉郎”财务、黄玉郎退出“玉郎”董事局，其他部分董事局成员也退出。董事局后由钱国忠出任主席，另有多名人士，如中华造船的王敏刚等也加入了董事局。

会计师在11月29日发出一份玉郎集团由1989年4月1日至8月31日的帐目，显示黄玉郎与钱国忠的关系极度恶化。由钱国忠任主席的董事局，决定尽快地终止与黄玉郎的“剩余关系”。

所谓“剩余关系”，是指玉郎集团在1989年7月与黄玉郎签署的关于保留黄玉郎管理“玉郎”出版的漫画及书刊及由其担任主要画师的协议。

同时，董事局表示将采取法律顾问所建议的需要进行的行动，其中包括进行法律诉讼，向黄玉郎及有关方面追讨董事局认为黄玉郎等欠玉郎集团的共约1020万元。

不久，玉郎集团果然向黄玉郎起诉。

1989年12月，玉郎集团致函黄玉郎，终止双方之间的雇佣合约，自合约终止之日起，黄玉郎无权占用香港浅水湾3号的Manhattan Tower 18楼A座，并要求禁止黄玉郎继续占有此物业；要求黄玉郎交回五部私家车——一部劳斯莱斯、一部保时捷、两部平治和一部宝马；交回三个俱乐部会员资格——深水湾游艇会、世界贸易中心会所、香港乡村俱乐部；交回14部流动电话和一部传呼机；以及交回全部与玉郎集团有关的文件和黄玉郎受雇玉郎集团时所创作的漫画画稿。

1990年1月初，玉郎集团就上述事项向高等法院正式提交诉状。

1990年2月，玉郎集团再次入禀高等法院，向黄玉郎追讨两笔款项共1900多万元；钱国忠、林建名二人并要求行使黄玉郎按予他们二人的39.54%的“玉郎”股抵押权，及追讨黄玉郎未能如期偿还的欠款。

在钱国忠的围追堵截之下，黄玉郎无处可遁，只有投向胡仙。

胡仙个人和“星岛”持有玉郎集团30%权益，若能获得黄玉郎的近四成权益，则胜券在握。胡仙决定支持黄玉郎。

胡仙与“星岛”和持有“玉郎”三成权益的Arbus公司，出面借给黄玉郎1.38亿元，使他能够向钱国忠、林建名赎回旧约。

根据“星岛”公布的有关贷款的条款指出，这笔贷款其中1.28亿元由银行贷款，其余则由“星岛”和胡仙等支付，贷款为期两年，于1992年底之前偿还。这笔贷款是无抵押贷款，但黄玉郎承诺将股份按给胡仙。

经过这番周旋，胡仙与“星岛”终于争得玉郎集团控制权。

表面上是胡仙成功地收购了“玉郎”，但胡仙在香港和海外地产市道对她大为不利之时，斥资2.2亿元收购“玉郎”三成权益，又向银行贷款1.4亿元转借给黄玉郎，这势必令星岛集团已经庞大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增加，负债沉重。

市场根本就不明白为何星岛报业要收购“玉郎”？“玉郎”

的资产与星岛报业有什么可以合作？胡仙收购“玉郎”是祸是福？这一切令投资界感到疑惑。

第四十四章 提前突袭 前任瓜分重利

胡仙等不及召开“玉郎”股东特别大会时才撤换前任董事局，她担心对方有充裕时间作部署，瓜分利益。胡仙决定给钱国忠一个措手不及的突袭。钱国忠等却早已料到有此一举，先吞得花红及赔偿金 1600 多万港元。

星岛报业截至 1990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业绩出现大倒退，纯亏损达 7350 万港元，与上一个年度的 9800 万元纯利相比，其差别真是天上地下。

星岛报业负债已经很重，盈利已经不济，为何胡仙仍要与“星岛”合组联营公司收购玉郎集团，玉郎集团如何有如此大的魅力？

外界的说法，都认为胡仙看中《天天日报》。

但是，一位熟悉玉郎集团事务的人士指出，玉郎集团拥有《天天日报》发行权只不过为期 10 年，并非永远拥有。短期之内，虽然《天天日报》广告收益有可观的增长，但也难望出现巨额盈利。

另外，表面上也很难看出《天天日报》与星岛报业及胡仙旗下的叫份报纸——《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和《快报》有什么可以特别配合之处。《天天日报》可提供的优点星岛集团基本上已经齐备，包括印刷设备及其他方面。

至于连环画业务，则是一项竞争十分激烈，利润却比较微薄的业务。分析家相信胡仙收购“玉郎”，志不在连环画。

胡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为何不惜血本竞争也要得之而后快呢？

一位对胡仙过去多项商业性投资颇有微词的商人银行家指出：“可能我们目前苦苦思索胡仙为何有这个收购行动，千方百计为她想一个合理的理由，可能最后发觉这也是一个不理想的投资！”

这位商人银行家说，过去几年，胡仙在经营方面显然进行了多个不智的决定。购入太阳广场现址后不久即出售给日籍商人孙忠利，目前回顾，十分可惜。1988 年出售中环三和大厦，也非理想时机。还有，胡仙念念不忘澳洲、新西兰以及在加拿大、美国进行地产投资，恰巧这些国家的地产市道因为利率上升而受到沉重打击，地产价格下跌：而在这几年地产市道蓬勃的香港，胡仙却减少对地产投资。

1990 年 9 月 28 日举行的玉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周年大会上，以钱国忠为首的“玉郎”前董事局被彻底更换，星岛报业集团成功取得“玉郎”董事会控制权，委任邓立人为主席及董事总经理。黄玉郎因有官司在身，仍不宜加入“玉郎”董事会。

但黄玉郎在这天出席文华酒店东西厅举行的股东大会的神情，以及他对记者的讲话，都充分显示出意气风发的模样。显然他因为能将钱国忠之流逐出“玉郎”董事局而感到扬眉吐气，高兴快慰。

黄玉郎指着自己的上唇对记者说：“我剃了胡须，为我带来好运，暂不打算再留胡须。”

所谓好运，当然是指能够成功赎回股票，并将钱国忠逐出“玉郎”董事局。

这之前，黄玉郎曾请教过看相先生，他听从相士之言，把留了多年的胡须剃掉。

星岛报业集团及胡仙班底人主后的新董事局，9月28日下午召开董事局会议，之后，新董事局审查玉郎集团帐目，便发觉了问题。

原来，在9月26日下午，也即新董事局入主的前两天，以钱国忠为首的前董事局曾召开董事会，出席者包括钱国忠、唐登及王敏刚等，会上通过一件议案，即董事如果离职，将获花红及赔偿金。

花红方面，前董事会通过决议，若钱国忠离职，可获花红100万港元，而唐登则可获60万元。

赔偿金方面，前董事会通过决议，如果原董事在“玉郎”的服务合约遭错误地终止，则该董事可获赔偿金，其中钱国忠可获赔560万港元，郭伟健可获266万港元，唐登可获338万港元，林建名也可获338万元。

上述的会议记录写明，“玉郎”已为准备支付这笔款项开好现金本票。新董事局遂查看“玉郎”的银行结单，发觉上述款项已经在会议后的翌日，即9月27日被过数。新董事会当即向法庭申请禁止令，禁止前董事们兑现这笔本票，如若本票已兑现，则将落在他们手上的资金冻结。

这之前，前“玉郎”董事局向收购及合并委员会提出，胡仙、星岛集团及黄玉郎是一致行动人士，应向“玉郎”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收购及合并委员会经过详细研究后，在9月19日发出声明，认为“星岛”及胡仙需要提出全面收购。

胡仙和星岛报业对此裁决深感不满，表示要争取可能的上诉，包括要求证监处重新研究，甚至寻求司法复核。

可是若要将钱国忠等逐出董事局，由“星岛”入主，就要先遵行收购合并委员会的裁决，提出全面收购“玉郎”的建议，并向股东寄发收购文件。胡仙为保障她和“星岛”拥有“玉郎”的权益，迫不得已要先提全面收购，而上诉一事只好暂且按住不表。

“星岛”和胡仙联手收购“玉郎”三成权益，共斥资2.2亿港元；又向银行贷款1.4亿港元转借给黄玉郎，以赎回股份；对玉郎集团的投资在年度内使星岛集团增加1400万港元利息的负担及其他支出；而全面收购玉郎集团，资金成本更沉重。可是“玉郎”短期内并不能提供可观的盈利，对“星岛”而言，投资于“玉郎”短期内并不划算，只能寄望于长期。

但胡仙自有她的考虑，一旦决定的事，她便要付诸果断的行动。

胡仙顾虑和担心让原有董事局有充足时间部署，给予前董事较多长期或临时好处，因此她来不及等到在10月12日将召开的“玉郎”股东特别大会上才撤换以钱国忠为首的董事局，而决定给钱国忠一个措手不及的突袭。于是，胡仙在9月27日晚发出通告，表示愿意提出全面收购，并赶着在9月28日上午10时，即“玉郎”召开股东周年大会前1小时发出收购文件，以期在当天11时举行的股东大会中，撤销钱国忠为首的前董事局。

没想到钱国忠等人也已料到有此一举，因此在股东周年大会的前两天，先行召开董事会议。商定决议各董事离职花红及赔偿金共1662万港元。

事情到此却还远远没有了结。

黄玉郎之所以跟胡仙走在一起，主要是他与钱国忠的盾激化。胡仙最初觊觎“玉郎国际”的股权，黄玉郎依靠钱国忠来对付，及后，钱国忠与黄玉郎关系恶化，钱国忠反而控告黄玉郎，黄玉郎才不得已投向胡仙，以对付钱国忠。

黄玉郎虽然依靠胡仙取回“玉郎”控制权，但是他心里岂不明白胡仙

对“玉郎”的野心？他这时想的，当然是下一步如何对付胡仙及星岛集团。

另一方面，胡仙自然知道黄玉郎未必永远依靠她。黄玉郎名下的“玉郎”权益较她持有的为多，这是胡仙的心头隐患，她打算透过这次全面收购行动，增持“玉郎”股权 35%以上，甚至四成，起码与黄玉郎旗鼓相当然而，根据联合交易所的上市条例，一间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须不少于 25%，当黄玉郎已持有“玉郎”40%权益时，作为“一致行动”的胡仙，最多只可持 35%。

胡仙想要稳坐“玉郎”董事局的宝座，有何对策？

第四十五章 玉郎出狱 被迫另起皇朝

黄玉郎出狱的日子，牵引了新闻媒介的注目，记者们视为有“猛料”可炒的日子。而其实还有一个人对黄玉郎更加关注，那就是胡仙。黄玉郎要东山再起，他面对的商场强敌，第一个便是胡仙。

黄玉郎因为炒“期指”（恒生指数期货），惨遭世界性股灾，债台高筑，把一个自己亲手创建、苦心经营起来的堂堂“玉郎帝国”，拱手让给了胡仙；又因为伪造公司账目而锒铛入狱。

黄玉郎的刑期是4年，但只吃了18个月“皇家饭”便出狱了。

据惩教署人员透露，黄玉郎是关进“大词堂”（赤柱监狱）的JBLOCK，属于A级牢房。这种牢房通常是刑期超过10年的重犯囚禁之处，单独监禁，不可与外人接触。

黄玉郎每天只有1小时的“自由时间”，其余时间他是要自个儿粘信封，为政府机构做公文袋。

黄玉郎刑期只有4年，为什么会波关入A级牢房？据说是因为他是知名人士，只恐会遭其他犯人滋扰；同时也防范他煽动其他犯人作乱。

黄玉郎由于背景显赫，同仓犯人向他作口大挑衅，他也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只当没听到。狱中监管人员久闻其大名，纷纷向他索画留念，黄玉郎电有求必应。

黄玉郎吃了18个月“皇家饭”，一共赚得1000港元，这与他1987年股灾之前日赚百万元相比，真何天壤之别。

黄玉郎出狱的日子，牵引了新闻媒介的注目，记者们视为有“猛料”可炒的日子。而其实还有一个人对黄玉郎更加关注，那就是胡仙。

原来，黄玉郎入狱之前，还拥有30%的玉郎集团股权，只是抵押在胡仙手上。他若能筹得1.6亿港元还给胡仙，即可以取回股权。

胡仙手上这时有四成多玉郎集团股权。如果黄玉郎出狱之后，在市场吸纳玉郎集团股票，则可能重掌“玉郎帝国”大权。所以，胡仙授意玉郎集团配售新股，将黄玉郎持有的股权摊薄至35%以下，这样，黄玉郎即使赎回股权，在股东会上提出全面收购，至少要耗资8亿港元，付出代价太大。

黄玉郎虽说是文化人出身，却也和香港许多富豪一样，笃信鬼神风水。有术士告诉他，他在鲷鱼涌的旧居，有一只凶猛的女鬼；他命硬，可以克制女鬼，女鬼不会害他，反使他兴旺发达。以后数年间，黄玉郎果然扶摇直上，建立了资产近20亿港元的玉郎帝国。他后来另迁新居，将旧居卖给属下一职员；该职员一家人尚未搬入，在装修期间，接二连三发生意外，儿子踢足球断了腿，女儿过马路被车撞倒，太太又被大门夹伤手指，该职员疑神疑鬼，不敢入住，将此屋转售他人。而黄玉郎自从离开旧居之后，则逐渐倒楣。有鉴于此，黄玉郎更加迷信。此次出狱，他便刻意安排了一场“行大运”。

那天，黄玉郎身穿蓝色双襟西装、小领白色毛衣，乘宝马轿车离开赤柱监狱，被一群记者围住拍照。黄玉郎打趣道：“我在市场仍然叫座！”

“宝马”驶至大潭水塘停下，黄玉郎换上丰田，由他的大徒弟祈文杰驾驶。后面有10多辆报馆采访车，逢灯过灯，见线压线，一直紧跟。车队驶至东区隧道过海，再入将军澳隧道，绕了一圈从秀茂坪下山，再经东区隧道到达杏花村。这就是所谓的“行大运”。

黄玉郎一出监狱，便面对胡仙的挑战，胡仙的妙计使黄玉郎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赎回股份，而不注资增加控制权，黄玉郎就夺不回玉郎帝国。而他欲要跟胡仙争持，手头上又没有这样大笔的资金。

实际上胡仙就是要逼黄玉郎赎回股份，然后在市场出售，除还债外尚余2亿多港元，黄玉郎可作为另起炉灶的资本。这样，胡仙就能安稳地把玉郎集团兼并了。

黄玉郎与胡仙的关系之不善，并非一日之寒。传闻，还在胡仙出售北角新闻大厦时，如果她知道买家是黄玉郎的话，断然不会将大厦出售。1987年，黄玉郎购下北角新闻大厦作为总部，依期“进驻”，完全没有理会胡仙待“星岛”新总部的装修工程竣工才搬出的请求，甚至将她的东西立刻搬离新闻大厦。

因此，无论是黄玉郎联合钱国忠、林建名对抗胡仙“入局”，抑或他联合胡仙使钱国忠、林建名二人“出局”，胡仙和黄玉郎之间从未建立过真正的友谊，他们的拍档只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和金钱或股权上的利益关系。

所以，当胡仙与她的星岛报业最终成为玉郎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时，玉郎集团的地位当然无法与星岛集团相比。星岛集团有如胡仙的亲生子，而玉郎集团只是她半道捡来的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胡仙在海外的地产投资项目，由于海外的地产市道滑落，使“星岛”出现大批坏账，“玉郎”旗下的《天天日报》和漫画刊物，势必担负起母债子还的责任。

事实上，胡仙和“星岛”后来在玉郎股票买卖上还是获利不菲的。1993年6月，黄玉郎与胡仙、“星岛”达成了协议，将2.258亿股“玉郎”（此时已改为“文化传信”）售予“星岛”全资附属公司Sing Tao Billio有限公司和胡仙、“星岛”各占一半股权的Rabone有限公司。

一个月后，这两间公司以每股1.38港元，各自购入9680万股文化传信股份。这个交易使“星岛”的文化传信总股权升至48.2%，胡仙个人则占7.3%。而同一天内，两间公司却将刚购人的全部共1.936亿股，以每股1.78港元向外界配售；于是仅在一天间，两间公司从买卖差价已赚取7744万港元，“星岛”与胡仙各自获利29%，其中1810万港元利润拨入“星岛”帐目之内。

5个月后，两间公司便进行吸纳黄玉郎手上股份的第二步行动。11月初，SingTaoBillio购入；但在半个多月之后，又以每股1.73港元分别向外界配售3600万股。在这次交易中，“星岛”赚取6220万港元，而胡仙个人则赚取6050万港元。

1993年11、12月间，当胡仙差不多把所有文化传信股份售出时，文化传信股价徘徊在1.9港元左右；但出售后两个月，股价却下跌到1.4至1.2港元之间，跌幅近一半。

因此，分析家认为，对“星岛”或胡仙而言，文化传信只是一个“壳”而已。唯一可能令黄玉郎感到安慰的是，1989年3月，玉郎集团为了应付胡仙的收购，只得壮士断臂，以1.69亿港元将玉郎中心售给丽新主席林建岳的公司，使这幢大厦不致被“星岛”及胡仙售出。而仍能够继续以“玉郎”命名黄玉郎出狱后，要另起炉灶，取回他有漫画界的一统天下。但这显然困难重重，他要面对许多商场强敌。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胡仙。

原来的玉郎集团，现在已由胡仙控制，改名为“文化传信”，以彻底清除黄玉郎的阴影。文化传信现共有主笔20人，散稿主笔6人，助理180人；

出版本地漫画 6 种，包括黄玉郎 当年的成名之作《龙虎门》、《醉拳》、《如来神掌》等；出版日本漫画超过 60 种；年销售码洋 2.4 亿港元，占全香港漫画市场的一半。

但黄玉郎到底根基深厚，实力不凡，在前玉郎集团众望所归。他一出狱，文化传信内部就发生“地震”，首批监制、主笔、助理 30 余人，同时提出辞职，重新回到“玉郎大帝”黄玉郎的麾下听令。

对此，胡仙并非没有预见，她曾经作出部署，严防人才外流。原玉郎集团黄玉郎的大弟子祁文杰和他的一班弟兄在文化传信已是高薪任职，祁文杰年薪 600 万港元，文化传信漫画部制作总监温韦伦与主笔许影深等人，年薪也有 300 万港元；胡仙却还派人另施以甘词厚币，表示大家“合作搵食”，由祁文杰与其弟兄们提供稿件，文化传信负责印制，扣除开支后的盈利，实行“八二分成”，即祁文杰等人占八成，文化传信占二成；胡仙并表示他们甚至可以与黄玉郎合作。

但是，祁文杰念及黄玉郎的知遇之恩，拒绝了胡仙的甘词厚币，并放弃了高达 600 万港元的年薪。

祁文杰说：“如果黄玉郎先生当初没有带我入行，我和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没有今天。黄先生给了我机会，也扶助过我不少，他对我恩重如山。”

温韦伦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做错事，他（指黄玉郎）只是教我应该怎样去做，还会安慰我。他对一般同事都很好，搬入玉郎中心时，全部家具都换了新的，尽量给职工一个好环境。”

由于黄玉郎所具有的感召力，1993 年 7 月，他召集漫画界 60 多位精英加盟，正式成立“玉郎朝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祁文杰辞别胡仙，任该公司总经理兼社长。

黄玉郎自此结束了“玉郎帝国”的时代，走向一个新的“皇朝”。

第四十六章 重组债务 集团加速还款

面对“星岛”的困境，胡仙不能不壮士断臂，将一些亏损的海外投资物业出售，专心发展报业及印刷。19.6亿港元的总负债额，胡仙如何甩掉？

1991年3月，星岛旅游办事处张贴出告示，宣布在4月1日开始“暂停营业”。与此同时，外界纷传《星岛晚报》将要停刊。无线电视为此大作文章。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胡仙控制的星岛集团发生了什么事？一度号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的胡仙，财政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自1989年后，香港地产市道受到打击，同时海外的地产市道也大幅度滑落，从1990年到1991年，“星岛”在物业撇帐上蒙受巨额损失，收购玉郎集团也蒙受重大的帐面亏损。到1991年3月底，“星岛”的总负债额已高达19.6亿港元，星岛集团处于崩溃的边缘。

星岛集团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5月15日，星岛集团作出公布，宣布资产重组；上市的星岛集团将分拆与胡仙合作的投资，把业务重心重新集中在报业出版和印刷方面。“星岛”的三个债主——汇丰、渣打和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州立银行，对重组表示支持。

在宣布重组后的半个多月，上市的万年置业发出通告，宣布以650万港元买入胡仙私人名下的《快报》的9成权益，并为其承担2700万港元的债项。

胡仙及星系报业一直拥有香港多份报章，《快报》和“星岛”日、晚报及《虎报》一样，均属历史悠久的报章。若非迫不得已，胡仙断不会为了筹措区区600万元资金，而将其出售。

这之后，胡仙不断出售她在海外的小型物业，以套现减债。仅在澳洲，1992年，胡仙分别以120万澳元出售位于悉尼乔治道603号的一幢280平方米的房屋；以145万澳元出售位于克拉郎道115号的一座6层楼。

同年6月，胡仙以435万澳元的价格售出座落于悉尼唐人街的大厦福满楼。该物业原本是一间酒楼，位于乔治道和高本街的交界处，是悉尼唐人街人口处的旺铺位。胡仙还以100万澳元的价格，售出她于1987年3月以215万澳元购入的位于悉尼海港道的物业。

1992年圣诞节前夕，胡仙的EVEIA控股有限公司又将她在悉尼市海港道6—12号的一处物业出售给香港投资商人Andv Yau。

面对“星岛”的困境，胡仙不能不壮士断臂，将一些亏损的海外投资物业出售，专心发展报业及印刷。

胡文虎去世后留给胡仙多份在香港的报章，以及胡仙其后不断发展的印刷业，一直十分赚钱。可是近年来胡仙与星岛集团合作，大举投资海外地产，以及投资香港地产错失了时机，导致巨额撇帐，亏损之大，连来自报业及印刷业的巨额盈利也不足以弥补。

胡仙在1985至1987年的大好时机购人的香港物业，未赚尽便急急出售，反而在高水位购人的香港资产。包括物业及玉郎权益），则被迫要作长线投资。她选择只在香港地产市场作短线投资，在海外才“放长线”，致使错过了香港的地产牛市，碰上海外的地产熊市。其得与失，一来一去，相去岂止千里。胡仙因此整整错失了中英关于香港前途达成联合声明之后香港的10

年繁荣大浪。

亡羊补牢。胡仙委任会计师邓立人做集团的执行董事，重整公司债务；委任香树辉做《星岛日报》总经理，以振作报社士气，增创收入。

香树辉早先在银行任职，后来在《壹周刊》工作，既懂经济，又有出版经验。胡仙约见香树辉时，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很合拍。

胡仙说：“我请人的原则，这个人的最大贡献必须是为了报纸，他不听老板的是另一回事，主要是他做事，对报纸有贡献最要紧。我希望你能加入‘星岛’，扛起行政大旗。”

香树辉说：“我做事也有我的原则，我秉承的是新亚精神，手空空，无一物，千斤担子两肩挑。‘星岛’虽负债累累，但物业市道总会复苏，可以慢慢出售物业还债，报纸搞好地产版，有广告就有钱赚了。”

香树辉只向胡仙提了一个要求，要找他的朋友陆锦荣主持编务。陆锦荣也是新亚毕业的，他们是同学。胡仙自然答应。

香树辉说：“我相信一件事，无论做总经理或主席，讲管理最重要一环还是人才管理。最大的挑战是保留一班好的人才，令他们各自发生作用，安心工作。有好的人才帮你，放权给他们，那么自己做总经理就会舒服点。”

香树辉刚上任的时候，报纸的编排比较松散，表现时好时坏，因为当时上层处于真空状态，总经理已辞职，总编辑也没有，只有一位副总编辑。香树辉一上任，首先把班底安排好，各部门经理、主任各就各位。

香树辉擅长财务工作，对出版以外的财政筹划、经营方针、市场策略、添置机器的预算等方面都能驾轻就熟，而这正是今时今日一个商业社会的报业舵手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星岛”自香树辉主理后，财务方面渐上轨道。报业一直是“星岛”的赚钱机器，在这雄厚的盈利的基础上，卖掉部分集团不擅长的“副业”，其负债果然逐步递减。《星岛日报》一直在物业资讯与物业广告方面居领导地位，香树辉又加强了地产版，1992年度地产广告增长显著，仅这方面的收益就比前一年增加25%。

星岛集团在1992年度创下营业利润的最高纪录4.253亿港元，比前一年急升94%，其中报业表现辉煌，占六成的营业利润。虽然集团在澳洲与加拿大的地产投资仍不理想，但凭借报业的强劲表现，1992年的可拨股东利润仍高达1.511亿港元，与前一年的亏损6430万港元相比，已扭亏为盈，同时也加快了还款速度。

1991年3月，集团欠银行15亿港元，1992年3月欠11亿港元，1993年初只欠8亿港元左右，还款的速度很快。而“星岛”股价也由1992年最低约1港元，升至最高每股5元港币以上。“星岛”重振雄风。

1992年11月23日，胡仙应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偕同她母亲陈金枝女士和堂弟胡清德等亲戚，一行共12人，直飞北京，开始了引人注目的内地访问活动。

过去20年间，新华社不断邀请胡仙返内地，胡仙都一直婉拒。这一次胡仙欣然应约，无疑显示她看好内地改革开放的形势，瞩目于开拓内地市场。此前，“星岛”已支付了3000万港元，购下一块位于深圳福田的5万平方米地皮，预计投资两亿港元，兴建一个印刷基地。而在胡仙访京的一个多月前，“星岛”已经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为“星岛”承接国内广告。

内地方面在胡仙抵达的前一天，预先安排了一件很大的见面礼——新华

社发表了一条电报，指出厦门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卜仁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战史研究室机密档案中，找到昔日胡文虎在东京与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其中并未发现文虎有卑躬屈膝的“媚敌”言行，澄清了胡文虎一度被指为“汉奸”的传闻。

内地方而主动为胡文虎“伸冤”洗脱“汉奸”之嫌，陈金枝深为快慰感激，虽年逾九旬，也要亲上北京拜谢，陈金枝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返回内地，而胡仙则是记事以来头一次踏上内地的土地。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胡仙一行。江泽民对胡仙首次回内地观光访问表示欢迎，并希望她到各地去看看。参加会见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了关根，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等。晚上，丁大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胡仙及其家属。

11月2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尤阁亲切会见胡仙一行。李鹏向客人介绍了内地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情况。他欢迎胡仙及其家属多回内地观光、游览。

在北京期间，胡仙参加了香港垦岛有限公司代表与《人民日报》所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代表关于合作出版《星光》月刊协议的签字仪式，胡仙希望通过这本经济文化类综合性刊物。给国内传递信息，同时也把国内的情况介绍给海外。李鹏总理在会见胡仙一行时，还说“要把《星光》月刊办好”。胡仙说：“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要办好《星光》月刊。”

行将结束在北京的访问之时，胡仙在钓鱼台10号楼宴会厅举行了盛大的答谢宴会。出席宴会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及夫人等近百人。

胡仙在宴会上的致辞热情洋溢，她说：“我们似乎姗姗来迟，但是，我们终于回来了！”

第四十七章 重修父业 秉承爱国之志

中川虎豹别墅奠基于40年代，落成于90年代，胡家两代人跨越近半个世纪才将它建成，胡仙终于圆了先父的还乡之梦。时隔40年，胡仙来到广州，她没有收回父亲胡文虎留给她的永安堂大厦，而将它捐赠给广州的少年儿童。

1994年9月，闽西阳光灿烂，秋风送爽。胡文虎的家乡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迎来盛大节日，来自北京和省、市、县的领导以及海内外嘉宾1万多人，云集虎豹别墅，热烈庆贺胡文虎纪念馆开馆暨胡文虎基金会成立。

9月1日，胡仙一行乘坐直升飞机经由梅州飞抵下洋镇，降落于侨钦中季操场上，万余乡亲前来迎接久违故乡的亲人。胡仙深深感动，不由泪湿双眼。

胡仙驱车往中川村虎豹别墅。

父亲胡文虎发迹之后，曾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兴建虎豹别墅。有一次，胡文虎收到一封家乡人来信，全信只有一首山歌“中川是个好地方，村头有个马山岗；村尾狮象霸水中，唯恨虎豹不归乡？”这封信不像别的家乡来信，它既不要钱，也不要物，而是委婉地批评虎豹兄弟忘了故乡。胡文虎深为触动，当即复信乡亲，照抄原信，只对山歌第四句“唯恨虎豹不归乡”改为“虎豹别墅建中央”。同时特派永安堂汕头分行经理胡兆祥携资45万港币，返乡兴建虎豹别墅；其设计图由胡文虎亲自审核，格局样式与海外的虎豹别墅一模一样。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虎豹别墅仅完成了楼房架构，来不及装修。未完工的虎豹别墅，带着胡文虎的终生遗憾，数十年伫立于中川村栉风沐雨。

1993年3月，胡仙首次返乡祭祖，看见半途而废的虎豹别墅，下决心要完成先父未竟的事业。

为此，胡仙耗资200万，委托永定县政府成立虎豹别墅维修改造小组，重修虎豹别墅。如今，这组于40年代奠基，到90年代才落成、跨越半个世纪，由胡家两代人才完成的建筑焕然一新，富丽堂皇，为古老俊秀的中川村平添风姿异彩。

胡仙望着阳光照耀下的崭新的虎豹别墅，高兴得连声称好。她终于圆了父亲的还乡之梦，她为此感到欣慰。

胡文虎纪念馆就设在虎豹别墅内。在热烈的掌声和锣鼓声中，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和福建省委副书记林开钦，为李鹏总理题写的“胡文虎纪念馆”牌匾揭幕。

林开钦在讲话中指出：“福建人民对胡文虎先生建设祖国，造福家乡的善举，是不会忘记的，今天，设立胡文虎纪念馆，就是为了弘扬他爱国爱乡的精神。”

福建省侨办主任林铭侃宣布胡文虎基金会成立，聘请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为顾问，胡仙为荣誉理事长，林铭侃和罗开洪为副理事长。胡文虎基金会的基金来源由胡仙独资捐赠。胡文虎生前在福州、厦门、广州和汕头的房产，现已由胡仙继承，总值1亿元，所有收益悉数拨给基金会。

胡仙还另捐赠360万元兴建“胡文虎小学”，以纪念父亲胡文虎逝世40周年。

时隔不到”年，在广州，1995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胡仙又将广州永安堂大厦产权交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开枝手中。按照胡仙的心意，永安堂大厦将成为少年儿童图书馆。

老广州人大概无人不知屹立于珠江之畔的永安堂大厦，解放前，它曾是仅穴于爱群大厦的广州第二高楼。在胡文虎的遗嘱里，广州永安堂大厦是划在胡仙的名下。胡文虎生前十分钟爱这个女儿，因此将永安堂大厦留给她。

永安堂地基为、200平方米，若改建为商业大厦，价值当在四五亿元之上。胡仙在收回广州永安堂之后，为什么不改建为拓展商贸业务之用，而捐赠给国家作为少年儿童图书馆呢？

胡仙在捐赠仪式上致词说：“家父生前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十分重视，我收回永安堂的产权后，感到让广州少年儿童有个良好的学习场所十分重要。图书馆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摇篮，人日报》之本名。日军曾将胡文虎和《华侨日报》社长岑维休先生二人用飞机载住东京去见日皇裕仁，裕仁命他们为“东亚共荣圈”效劳，提出许多任务，胡文虎一件也未照办。这在福建省的历史档案中已经查清。

抗战胜利之后，胡文虎聘请倾向中共的老报人林霭民先生担任《星岛日报》社长，林霭民又邀请茅盾和夏衍两位共产党作家主持副刊工作。在要闻和港闻两部也聘请了十几位支持中共反国民党的编辑记者。那时的《星岛日报》客观而公正地报道了国共内战的胜负成败，帮助中共赢取香港和海外人心贡献了力量。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星岛日报》第二天以横条大标题标出：“广州天亮了！”当时的左派报纸如《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都只是例行公事地用上“解放”

二字。

然而，广州“天亮”之后不久，即由林彪的四野部队实行军管。《星岛日报》驻广州办事处立即被封闭，一名《星岛日报》的记者即以“反革命分子”罪名被枪决，随后又继承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诬指胡文虎先生力“汉奸”。广州永安堂因此被列为“敌产”，由广东省总工会进驻作为工会大厦。

1955年，中共中南局书记陶铸向当时的中共港澳工作组新闻战线党组负责人询及时胡文虎先生和《星岛日报》的看法。该负责人将以上情况如实讲述。

陶铸听罢道，我明白了，过去我们关于胡文虎的“定性”情况要改变的话，还得经过有组织的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之后，报告中央审批和决定；但现在有一件事是马上可以做的，即我们先跨出一步，将长堤那个虎标永安堂大厦先退回给胡氏家族。这就是取消了“敌产”性质，算是事实上的赔礼道歉；作为中南局的书记，我可以先走这一步。

那位负责人回香港后即与林霭民、张思健商议，又通过李子诵社长与周鼎先生沟通，他们部分别向胡仙传达了陶铸书记的意见。

胡仙回话说，很高兴陶铸先生归还永安堂，承认了胡家人华侨的国民地位，谢谢他的心意；至于永安堂，我们现在收回来也没有什么大用；既然政府承认了我们的产权，我想还是让广东省总工会再用下去，也算是家父对祖国尽一点心意吧。

陶铸听了回话，也很高兴。他让朋友们再转告胡仙，他尊重她的意见，让省总工会继续借用下去，但不能白白占用，作为胡家的产业，我们要付房租；按照广州的租价，省总工会将房租存入人民银行，胡仙什么时候要取用

就什么时候来提取。陶铸并让人转告对胡仙的感谢，“欢迎她随时到广州来参观，看看她家的永安堂嘛，我接待！”

转眼 40 年过去，胡仙终于来了广州，她没有收回永安堂，而是把它捐赠给了广州的少年儿童。可惜陶铸先生早已含恨离开人世，不然他目睹这一幕，定然感慨万千。

贵为富豪的胡仙，像其先父胡文虎一样乐善好施，慷慨大度。她与母亲、嫂嫂所住的虎豹别墅每星期大都免费向游人开放，连小商贩都可以在里面摆摊叫卖。别墅的修缮费每年高达十几万元。华东发生大水灾时，星系报业通过报纸呼吁读者积极赈灾，所捐款项达 700 多万港元，全部捐给了华东灾区。1994 年，胡仙用内地落实政策归还的财产成立了“胡文虎基金会”，用于为贫困地区捐建小学，现已在福建、汕头捐建了四所小学，平均每所投资 30 万元人民币。1995 年还将在广州、梅州等地捐建数所小学。胡仙打算逐年捐建多所小学，完成父亲生前未竟的建于所小学的心愿。

但在个人生活方面，胡仙却是自奉甚俭，朴素无华。她衣着随便，不施脂粉，更不穿主戴银。对奢侈的生活她既无兴趣，也不在行。她的住宅布置得十分简朴，和办公室差不多。

胡仙的跨国事业散布于太平洋地区，她每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在家中她一直与母亲、嫂嫂同住虎豹别墅，出外则常带着母亲同往。一个寡母，一个未婚女儿，一个寡嫂，外界滤称为“三位一体”，可知其感情之融洽、深笃。

胡仙至今未婚，成为世人疑惑之谜。她曾经被人爱过吗？她曾经爱过别人吗？她从来没想过婚姻吗？她如何处理对异性情感的需要？这一切几乎不为人知。”从来没有报章透露过关于胡仙的桃色传闻。这个亚洲最有财势的女人，她也许真的要独自走完没有异性伴侣的人生？难怪有人这么说她：“为《第二性》一书的作者西蒙·德·波娃夫人所指出的女子在情绪上的‘不稳定、缺乏自制和脆弱，的那些特性，在她身上已减到最低程度。”

40 年前，胡仙只是一名刚迈出校门和闺阁的千金小姐，40 年后的今天，胡仙的大名在香港可谓家喻户晓。贫苦的民众从“星岛”报的济贫运动中知道了她；学生、教师和其他各阶层人士，从她主持的日、晚报知道她；妇女们从她举办的烹饪大赛中知道她；孩子们从儿童绘画比赛中知道她……香港政府授予胡仙“太平绅士”荣誉称号。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胡仙名誉博士学位，赞誉她是“非凡的女社会活动家、作家、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报业家、经济强人”。

英国女皇授予胡仙 BOE 勋衔，这是世界第一流的杰出人物才能获得的殊荣，英国女皇赞誉她是“女中豪杰”。

胡仙还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首任主席，她也被国际新闻协会推选出任主席，是荣膺此职的第一位亚洲人。

胡文虎在天有灵，一定会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

对于胡仙来说，先父胡文虎留给她的遗产，她终生受用不完，她何须如此勤奋地工作？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胡仙的回答是：

“我心爱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令我很充实。”

